

毛泽东家书钩沉

潘相陈 编著



毛泽东家书钩沉

潘相陈
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0 号

**责任编辑 张克敏
封面设计 刘志峰
版式设计 粘国新
责任校对 高 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家书钩沉/潘相陈编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9

ISBN 7-5035-1624-0A·75

I. 毛…

II. 潘…

III. 毛泽东著作研究—书信集

IV. A8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70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6.80 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49年，毛泽东和长子毛岸英（右二）、儿媳刘松林（右一）、女儿李讷在北平香山



毛泽东同长女李敏、次女李讷等在香山讲故事（1951年8月9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和李敏及其同学亲切交谈(1951年6月1日)



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香山(1949年)

毛泽东同
李讷在北戴
河海滨(19
60年7月)



毛泽东和毛岸青等在中南海家中(左起:毛岸青、张
少林、毛泽东、刘松林、邵华、杨茂之)



毛泽东同李讷在杭州五云山（1954年1月29日）



毛泽东和李锐一起看影集（1951年）



毛泽东在北京故
宫城墙上远眺（19
54年5月）



毛泽东与毛岸青、
邵华合影（1962
年春）

毛泽东和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携手同行在故乡的田间小路上(1959年)



毛泽东在双亲墓前行礼致敬





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1953年9月）



毛泽东在湘江游泳后到长沙牛头洲参观（1959年6月24日）



毛泽东在武汉（1962年6月）



毛泽东在韶山农民家中做客（1959年6月26日）



毛泽东和早年挚友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在长沙合影（1959年6月）



毛泽东同韶山农民亲切交谈（1959年6月26日）



毛泽东在武汉长江游泳（1961年9月）



毛泽东会见大小五井、李山、罗浮等地的革命老人和干部（1965年5月）



毛泽东在杭州（1954年）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1965年6月）



毛泽东在广州校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2月）



毛泽东从长沙回到离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前排左一为王任重，左二为罗瑞卿（1959年6月25日）



毛泽东在北京（1950年）



毛泽东和乡亲们愉快的交谈

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



毛泽东和早年
相识的师长、中央文
史馆馆长章士钊交谈
(1963年7月)





毛泽东在北平（1949年）



毛泽东参加李敏、孔令华的婚礼（1959年9月）

前 言

这里选编了毛泽东致亲友的书信91件。

分为妻儿篇（妻、子、女、媳）、外祖篇（舅父、表兄、表侄）、族亲篇（堂兄弟、堂侄、族亲、姻亲）和岳家篇（岳母、妻舅、妻兄妹、保姆）四部分。

毛泽东的家书，绝大部分是在戎马倥偬、繁重的军国重务中抽空书写的，除极个别者外，都极短小。因此，如果只单纯地编列家书，会使读者摸不着头脑，不得要领，不能有效地理解封封家书所蕴含的内容和丰富的感情。

本书采取这样的叙述方法：以件件家书为中心，将每份家书的背景，其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以较多的笔墨，清晰地勾出。这样，读者对每封家书的采龙去脉，其中诸人物和毛泽东的关系，家书中深刻的蕴涵，就会有清楚的把握。

毛泽东无疑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最具世界影响的风云人物，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抱负，有超乎寻常的文韬武略，有天地般地盖世功勋，晚年又出现了极为令人惋惜的历史悲剧。他一生的活动，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给世界以极大的震撼。

但正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的生生生的人。他极重夫妻之情，儿女之恋。他也极重乡情、友情和亲情。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终身奉行的最高宗旨。从本书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对家人亲友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更深深地爱着天下黎民百姓。惟其如此，他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为天下百姓的利益献出多位最亲近的人，包括爱妻和爱子；他也不惮冒亲戚的怨尤而不徇私情。

他处理亲友的件件要求，无不本着一个最高原则：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本。他从不以权谋私的高风亮节和严于律己的崇高品德，正是今天戚们各级领导应该从中汲取的最必需的营养。

本书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了叱咤风云的毛泽东的精神世界。

编者谨识

1997.3

目 录

妻 儿 篇

- 一、不要那种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
(致毛岸英) (1)
- (一)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1938.3.4) (1)
- (二)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1939.8.26) (6)
- (三)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1.1.31)
..... (7)
- (四)坚持读文章计划,很有必要(1946.12.26)
..... (15)
- (五)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1947.9.12) (16)
- (六)不要那种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
荣心(1947.10.8) (18)
- (七)我们到了石家庄(1948.4.29) (20)
- 二、要争一口气(致刘思齐) (28)
- (一)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1955.8.6)
..... (28)
- (二)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1956.2.14) ...
..... (37)
- (三)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1957.8.4) ... (38)
- (四)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1957.8.9) (39)

(五)登高壮观天地间(1959.8.6)	(40)
(六)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 轻视、仇视的人们(1961.1.15)	(41)
(七)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1961.6.15) ...	(43)
三、好生静养,以求全愈(致毛岸青)	(47)
(一)看见哥哥,好象看见你一样(1946.1.7)	(47)
(二)好生静养,以求全愈(1960)	(51)
四、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致邵华)	(54)
(一)1962.6.3	(54)
五、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致李敏)	(62)
(一)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1949)	(62)
(二)碣石诗是有名的(1954.7.23)	(70)
六、好,你不会再作河伯了(致李讷)	(77)
(一)下大雪了,你看见吗(1951.1.4)	(77)
(二)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58.2.3)	(79)
(三)由浅入深,慢慢积累(1959.12.30)	(81)
(四)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1962.1.9)	(83)
(五)接到你的信,喜慰无极(1963.1.4)	(84)
(六)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1963.1.15) ...	(85)
七、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致江青)	(89)
(一)只收集资料,不发表意见(1950.1.4)	(89)
(二)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1966.7.8)	(99)
(三)我死了,看你怎么办(1974.3.20)	(113)
(四)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1974.3.27)	(116)
(五)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1974.11.12)	(122)
(六)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1974.11.20)	(124)

外 祖 篇

一、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致文玉瑞、文玉清)	(138)
(一)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1918.8)	(138)
(二)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1919.4.28)	(144)
(三)学问无进,甚是抱愧(1922.11.11)	(151)
二、不要来此谋事,此处并无薪水(致文运昌)	(153)
(一)抱歉之至,尚希原谅(1915.1.11)	(153)
(二)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1922.11.11)	(156)
(三)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1937.11.27)	(157)
(四)地方工作缺点,尚望随时见告(1950.4.19)	(161)
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致文南松)	(167)

(一)来示读悉,极为高兴(1949.11.28) …… (167)

(二)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1950.5.12) ……
 …………… (169)

四、承告乡情,甚谢(致文润泉) …………… (171)

(一)十哥、十七哥还在否(1950.5.7) …… (171)

(二)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1953.9.8) …… (173)

五、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致文炳璋) …………… (179)

(一)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1951.10.10) …… (179)

(二)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1955.5.1) …… (181)

六、不要带任何礼物(致文九明) …………… (184)

(一)1953.10.25 …… (184)

族 亲 篇

一、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致毛宇居) …………… (188)

(一)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1938.5.26) ……
 …………… (188)

(二)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安好(1949.
 11.28) …… (194)

(三)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1950.5.15) ……
 …………… (195)

(四)轶事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1951.4.5) ……
 …………… (197)

(五)风便望将乡情赐告(1952.7.11) …… (201)

(六)以上均请费神转致(1952.10.2) …… (202)

(七)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1953.8.27)	(205)
(八)有祝兴居康吉(1956.4.20)	(206)
(九)校名两纸,请转致选用为盼(1958.9.10)	(208)
二、家境困难,将略作帮助(致毛泽连)	(210)
(一)家境困难,将略作帮助(1951.12.11) ...	(210)
(二)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1952.6.23)	(214)
三、有困难相告,替你设法解决(致毛泽荣)	(217)
(一)你有眼病,路上不便,似不必来京看我(1953.5.2)	(217)
(二)信都收到了,很高兴(1954.6.24)	(221)
(三)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以助日用(1954.12.18)	(222)
(四)顺祝健康(1956.4.20)	(226)
四、你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致毛华珠)	(236)
(一)1956.4.20	(236)
五、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致毛远悌)	(240)
(一)1950.5.12	(240)
六、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致毛远翔)	(243)
(一)1950.5.12	(243)
七、家中困难,应在生产中陆续解决(致毛照秋)	(247)
(一)1950.4.10	(247)
八、令兄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致毛爱桂)	(249)

(一)令兄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1950.5.26) (249)

(二)令郎要出来工作,可向当地机关申请
(1952.10.10) (254)

九、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的事,未便单独特殊照顾少数
地方(致毛逸民) (258)

(一)1950.5.8 (258)

十、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致毛月秋) (260)

(一)1953.10.4 (260)

十一、你母年高,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致周文楠) ...
..... (263)

(一)1950.5.12 (263)

十二、减租土改等事,弟未便直楠干与(致赵浦珠)
..... (266)

(一)1950.5.7 (266)

十三、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致贺晓我) (268)

(一)1950.4.19 (268)

十四、先生仍以现地工作为好(致周起鹗) (276)

(一)1950.5.16 (276)

十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京(致陈国生)
..... (278)

(一)1950.5.7 (278)

岳 家 篇

一、欣逢八十大寿,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致向振熙) ...
..... (284)

(一)托朱小姐前来看望你们(1949.9.11) …	(284)
(二)奉人参、鹿茸、衣料等以表祝贺(1950.4.13) …	
.....	(285)
二、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数向明卿) …	
.....	(288)
(一)1950.4.19 …	(288)
三、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致杨开智) ……	(291)
(一)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1949.8.10) ……	(291)
(二)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949.10.9) ……	(294)
(三)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1950.4.13) ……	(295)
(四)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1956.12.13) ……	
.....	(296)
(五)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1958.2.11) ……	
.....	(297)
(六)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1962.11.15) …	
.....	(297)
四、寄上一点钱,以为医药之用(数杨开英) ……	(299)
(一)如有所需,尚望告我(1956.12.16) ……	(299)
(二)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1958.2.20) ……	
.....	(300)
(三)杨老太太九十寿辰,寄上二百元(1960.4.25)	
.....	(301)
五、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现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	
好的(致陈玉英) ……	(303)

(一)有困难,告诉我,给你一些帮助(1951.12.23)	
.....	(303)
(二)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1958.2.11)	
.....	(307)
六、升学的事,我不宜向学校写信(致孙燕) (310)
(一)你们想到北京看一看,是可以的(1955.8.3) (310)
(二)升学的事,我不宜向学校写信(1957.6.8) (311)
(三)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1957.12.17) (312)
(四)望你们好,有困难告诉我(1960.12.29) (316)

一、不要那种与人民利益不相 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 ——致毛岸英

(一) 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 (1938.3.4)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毛泽东的子女不少，一生中和他前后的几位夫人共生育过10个子女。

杨开慧为他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贺子珍则生育过6个孩子，唯一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的只有女儿李敏。她是贺子珍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所生，后在苏联和妈妈一起生活学习了好多年，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至于贺子珍所生的其他5个孩子，有的因为险恶的战争环境没有成活，有的送给老乡抚

养，下落不明，一个长征途中生下的女儿，刚一落地就送给了当地的老乡。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时，已怀着身孕，到苏联不久就生下一男孩，但因婴儿适应不了寒冷的气候，仅10个月就夭折。1940年，毛泽东与江青生下女儿李讷。此后再没生育。

毛泽东的10个儿女中，在当时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只有2男2女：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

毛泽东对自己的子女既严又爱，他处处严格要求子女，又处处流露他那既丰富、又细腻，充满着温情的父爱。毛泽东对子女的态度既反映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家风，又给人类的父子关系添上了丰富生动的一章。

1922年10月，毛岸英出生于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

按照韶山毛氏家族的族谱，岸英属“远”字辈，毛泽东为其取字为“远仁”。

岸英出生在革命家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便注定了他颠沛的人生。他从1岁至5岁，不停地随父母南来北往，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

1923年4月，因毛泽东领导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军阀赵恒惕以过激派的罪名通缉他，毛泽东难以在湖南立足，遂赴上海。杨开慧则携岸英躲避到板仓乡下的娘家。

1924年6月，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领岸英和只有半岁的岸青来到上海。

同年冬，组织上批准毛泽东回湖南老家休养和工作，全家又一起返回湖南湘潭。

1925年2月6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获悉毛泽东组织农民斗争，下令逮捕，毛泽东只身离家，杨开慧则携幼子到李南村躲避。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毛泽东奔赴国共合作的基地广州。这年冬，杨开慧携两子到广州，全家住在东山庙前街39号。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奉派到上海工作，杨开慧又携一家老小回到湖南。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把妻子和3个幼小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安排送往板仓。

1927年8月，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不得不与妻子握别。从此，父子天各一方，长期不通音讯。

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姓母姓，叫杨岸英。

1930年8月，杨开慧不幸被捕，8岁的岸英随母亲和保姆孙嫂一起被关进监牢。在狱中，年少的岸英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知道了爱憎。凶残的敌人将杨开慧打得遍体鳞伤，岸英哭着用小手抚摸着母亲的伤痛，懂事地说：“妈妈，现在他们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他给受尽折磨的母亲以无限的心灵安慰。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从此，8岁的岸英永远失去了母亲和母爱。

杨开慧就义后，经熟人出面作保，毛岸英和保姆孙嫂被释放。失去母亲的岸英兄弟出狱后仍不得安宁，随着舅母来往于长沙、平江等地，东躲西藏备尝苦难艰辛。

党组织决定把他们转移到上海。

1931年初，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叔叔毛泽民来信，约定按照信上所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把3个小孩送到上海。

临行前的一天，岸英带着弟弟到母亲坟前告别，要弟弟记住这血海深仇。

1931年春节前夕，岸英兄弟3人由亲戚护送来到上海，毛泽民把岸英化名杨永福，岸青化名杨永寿，与岸龙一起送进党领

导的大同幼稚园抚养。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宁静的生活。年仅4岁的小弟弟岸龙身体很弱，晚上有时尿床，失去母爱的岸英，自己还是一个小孩，这时却要负起照顾小弟弟的责任。

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同幼稚园断了经济来源，被迫解散。当时毛泽民夫妇已赴中央苏区工作，岸英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成了孤儿。党组织把他们安排到董健吾的家中。董以牧师职务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供给。

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中断了对岸英兄弟的供给。这前后，董健吾也辞去了牧师的职务，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三兄弟生活无着落，时常流落街头，老三岸龙就在此时丢失，下落不明。

他们无处栖身，无法果腹，住在破庙里。母亲惨死，父亲不知现在何方，年幼的岸英兄弟常常以泪洗面。为了生存，他们当过报童，卖过油条，推过板车，拾过破烂，这些微薄的收入无法换来足够的常物充饥，兄弟俩饥一顿饱一顿，苦熬着辛酸的岁月。

有一次，岸青接了假票子，交不上款，换了老板的打。他一边走，一边哭，一边骂：“他们打我们，我们长大了也要打他们。”

他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恰被特务发现，小岸青遭到一顿毒打，头破血流，昏倒在地，特务又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猛击。岸青大脑严重受伤，两耳被打聋，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

然而，即使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岸英和岸青仍不忘学习。为了买到一本小学生词典学文化，兄弟俩勒紧裤带，三个月

不吃早饭，才如愿以偿。这本小小的字典，岸英一直珍藏着。

这种流浪的生活一直过了5年，解放后，有一次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岸英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

毛泽东也曾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颠沛流离中的岸英兄弟，决定送他们去苏联学习。这一年，岸英14岁，苦难的磨炼，他已经像一个青年那样的成熟。上海地下党通过白区的统战关系，利用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带他们出国。

1937年初，岸英、岸青经法国到达苏联，来到莫斯科。兄弟俩各取了一个苏联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岸英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沔沃学习俄语。不久，贺子珍来到苏联，又过了两年，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也被送到苏联。毛泽东的4位亲骨肉，第一次欢聚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1938年，有人从苏联带来了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久，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书写一信，托人带给离散了十多年的爱子。这就是前面收入本书的第一封家书。

信里充分反映了父亲思念远方的儿子的心情。这也是岸英兄弟第一次收到父亲的亲笔信，对一双自幼失去母爱的兄弟来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来鸿啊！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迫不急待”地托人捎信给儿子，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模样，还附寄了一张照片。

分别了10年之久的父子总算有了书信来往。但见面却在又

一个 10 年之后，真是分别容易重逢难。

此间毛泽东在收到儿子从苏联写来的信以后，喜不自胜。又给儿子去了一信。

(二)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1939.8.26)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能满足，不如你们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信虽不长，但情意浓浓。这一年岸英 17 岁，接近青年了。所以，毛泽东开始和自己即将成年的爱子交流思想。他不仅关注自己的爱子和所有在苏联学习的小朋友，也和儿子谈自己的心里感受。遗憾的是他这次寄的书在中途遗失了。

1938 年底，毛岸英、毛岸青搬到莫斯科市郊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继续学习。

1939年，毛岸英进入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插班学习。

1940年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孩子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了伊万诺夫城，和第一国际儿童院的2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住在一起。

岸英很快就和这些孩子们熟悉了，他们和睦相处，亲如家人。和许多国家的少年接触，岸英不仅懂俄文，也能讲一些日常的法语、英语、德语。他学习成绩好，人直爽，有魄力，号召力强，喜欢文体活动，大家都喜欢他，信任他。在这里，他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当选为团支部书记和国际儿童院所在区的区团委委员。

岸英知识丰富了，4年的学习，岸英成长很快，也有了相当的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他写了一封长信向爸爸汇报学习心得。毛泽东阅后回了一封较长的信，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儿子成长的关心。

(三) 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1941.1.31)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

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对儿子的进步，毛泽东表现了由衷的欣慰。“你们长进了，

很欢喜的。”尤其对儿子“有进取的志气”，毛泽东给以充分肯定和鼓励。百忙中，毛泽东对儿子的成长给予极大关注，连读书的先后顺序，都想到了，先以自然科学为主，社会科学为辅，将来可倒置过来。信中还谆谆告诫儿子千万不要骄傲。毛泽东对待儿子完全是一副和蔼可亲的长辈形象，以平等的态度与孩子们谈学习方法，谈处世为人的态度。

为了让革命的后代学习更多的知识，毛泽东几次寄书到苏联。这次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本。这60本书由毛泽东随信所附的一张书单中可见：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记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眉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这些书中既有哲学、经济、历史方面的书，也有古典小说、武侠传记。

毛泽东还特地注明：

“这些书赠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毛泽东选定的这些书，充分考虑到了少年的读书口味，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很受在莫斯科的这些“小同志”的欢迎。

于此可见毛泽东对孩子的殷切期望和一片苦心。

就在毛岸英收到父亲寄来的这批书不久，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闪电式的进攻。

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

这一年，毛岸英19岁。他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每次听完广播后，就把战争进展情况用小白旗、小红旗在世界大地图上标记出来，白旗表示法西斯军队，红旗表示苏联红军。苏联红军打

了胜仗，就把小白旗拿下来换上小红旗。

战争破坏了苏联人民的和平生活，儿童院的正常秩序被打破，经费缩减了，物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每天每人只能领到半公斤黑面包。

艰苦的生活考验着孩子们，为了支援前线，也为了劳动自济，岸英带领儿童院的孩子们种土豆、白菜、胡萝卜等蔬菜。他们把收获的大部分上交，支援前线。孩子们还组织起来，参加市内的保卫工作和民兵武装训练。

当时煤炭供应十分困难。为了解决儿童院燃料问题，岸英他们冒着大雪和零下 20℃ 的严寒，在森林里搭起帐篷，伐木劈柴。儿童院还办起了小作坊：男孩子有的学习打铁，自制燃烧弹，旋炮弹壳，有的做木匠，打弹药箱子；女孩子们组织起缝纫组，踩缝纫机，给前线的战士缝制内衣、手套、帽子、被了等。

战争形势十分险恶，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曾打到莫斯科郊外。伊万诺夫城也受到严重威胁，为了防备法西斯进攻城市，伊万诺夫市委号召市民挖反坦克壕。岸英和国际儿童院的小朋友冒着零下 40℃ 的严寒，加入抢修战壕的行列。他们用铁锹和钢钎一点一点地凿开冻土，手震裂了流出鲜血，也不叫苦。毛岸英还向延安的《新中华报》去信，介绍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伟大同情。

1941 年冬末，联共（布）中央建议，16 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

学校的老师动员他说，加入苏联国籍无比光荣。年已 19 周岁的毛岸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如果加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当人们无限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毛岸英不因祖国的贫

穷落后和灾难深重而失去赤子之心。但这并不表明他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象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夫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信发出后渺无音讯，他又写了第二、第三封信，都石沉大海。

正当他万般焦急时，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了。毛岸英认识这位将军，要求允许自己上前线，最后将军同意他进军校学军事。

于是，毛岸英先后来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于1943年1月加入联共（布）党（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写的鉴定是：

“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志向，可以入党。”

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毛岸英加入苏军行列。那时已处于苏德战争的后期，他担任坦克连的指导员，在苏军大反攻中，千里长驱，进入东欧。

1945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也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留念。

战后，毛岸英进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1946年1月，在苏联经过长达9年的学习和磨炼后，毛岸英满载学习成果，带着苏联人民的友谊，应祖国的召唤，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到了父亲身边。

这是他和父亲分别19年后第一次见面。与父亲分别时岸英才5岁，而现在已长成一个结实健壮的青年小伙子。

父子久别重逢，都非常高兴。19年，近8000个牵肠挂肚的日日夜夜，父子终于重逢，欢慰自非寻常。岸英归来的第一天，毛泽东特意吩咐备了几样菜，庆贺父子们苦别19年后的团聚。他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一边协助翻译，一边跟老同志学习政治理论和中文。因他俄文很好，曾帮助曹靖华同志翻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他学习刻苦用功，进步很快。岸英是个品质极为可贵的正义青年，他丝毫没有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特殊。他经常的装束是件旧军大衣，平日和普通干部、职工在一起，在机关大食堂吃饭。那时的延安，规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人，特别是高干的爱人、子女，可以吃中灶，但岸英不肯，他也和别的普通干部工人一样，举凡打扫卫生、挖粪坑等劳动，都去参加。

跟传统的中国人一样，毛泽东特别看重自己的长子，岸英的一切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儿子回到身边后，他可以亲自加以栽培了，他要使儿子成为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劳、意志顽强的人。

一天，岸英被父亲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里的槐树下交谈。毛泽东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再上一上中国的劳动大学吧！”

“劳动大学？”毛岸英一时有些不解。

“对，劳动大学。”毛泽东肯定地说。

岸英很快领会了父亲的话：“是的，我离开祖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需要好好向农民学习。”

不久，毛泽东给岸英介绍一位劳动模范，指着他对岸英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啊！”

又指着岸英对劳模说：“我现在给你这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人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劳模有几分惶恐地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

“这我还行。”劳模有信心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吧，就这样说定了，过几天就来”。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吩咐前往吴家枣园。他脱去皮鞋，换上布鞋，背上衣服、铺盖，还有一斗多小米，20多里路，他走得汗流浹背。随行的参谋几次劝他把东西放在马背上，他都拒绝了。当到达吴家枣园的时候，连里面的汗褂子也湿透了。

第二天清晨，他就拿起镢头走出窑洞随大家一块下地干活了。他时刻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拣什么活干，掏粪担粪，从不嫌脏。干得起劲时就脱下衣服，穿着短裤干，火热的太阳一晒，脊梁上蜕下几层皮。

他和乡亲们一起劳动，常常挥汗如雨，鞋子里灌满了土，就

索兴脱掉鞋子，光着脚板，手上打起血泡，他也咬牙坚持着。休息时，他还和老乡一起聊天，介绍国内外各种消息。乡亲们都非常喜欢他，乐意接近他。

他学会了犁地，还学会了种洋芋，象大家一样脖子上挂着个布袋，一手抓粪，一手点种。他把学习得来的农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

岸英不但劳动肯干，吃得苦，生活上也很俭朴吃苦。他和农民同住窑洞，睡土炕。住户吃什么，他吃什么，他很喜欢吃小米干饭熬酸白菜，南瓜煮饭，窝窝头也能啃上三四个。

每天劳动之后，不管怎样劳累，晚上他总要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写读书笔记。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因此，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

岸英在劳动大学锻炼了好几个月。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也在部署进攻延安，形势越来越紧张。经毛泽东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去。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岸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

岸英回到父亲身边，汇报了几个月的收获。父亲打量着儿子黝黑结实的膀子，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

从“劳动大学”回来以后，毛岸英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订了个庞大的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中共党史等。

毛岸英坚持作读书笔记，有问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夜晚在窑洞里请中宣部的同志给他讲历史和疑难问题。

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毛泽东53岁生日那天，

给儿子回了一信。

(四) 坚持读文章计划，很有必要 (1946.12.26)

岸英儿：

来信两封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真的，坚持读文章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947年4月，为了让儿子更深入地接触农村，了解中国农民，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到山西临县郝家坡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毛岸英受到了锻炼，获得了不少启发，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亲爱的爸爸：

……

我在郝家坡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中，学得了如下东西：

- (一) 最重要的一点，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
- (二) 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加上民主作风。

(三) 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

(四) 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必然会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哪怕这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份是很好的，人也是很好的。

(五) 只有用群众的力量，才能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政军。

信中还说：“没有下面的实际接触，在上面会上就是听一百个最好的报告，也是没有多大益处，接受不了，这好比地不耕而撒上哪怕是最好的种子，亦是徒劳无功，一阵风就吹走了。”

这封信，表现了年方 25 岁的岸英对党的群众路线有很高的见地，特别是“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岸英已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靠人的觉悟不行，成份本来很好，当了干部也会变坏，这已萌发了要依靠法治，而非人治的极端重要的思想。对照建面以来，关于党风的深刻教训，就可看出毛岸英的思想观点之可贵。

1947 年 8 月，毛岸英离开土改工作团，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二儿子、仍在苏联学习的毛岸青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是用俄文写的。毛泽东请人译出后，非常高兴，当即回复岸青一信，因为要译成俄文，毛泽东即给岸英写来一信，同时也对岸英提出了新的要求。信中永寿就是毛岸青，他在上海时曾化名杨永寿。

(五) 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 (1947.9.12)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为儿子的进步而极其高兴。望子成龙乃天下父母共同具有之心理，领袖亦不例外。当然，这个龙，有不同的含义，毛泽东希望的“龙”，乃是革命的龙，是能接过父辈为之奋斗的人民解放伟业的龙。信中，毛泽东对儿子既有鼓励，又指出学习的方向。有这样学识渊博又人情味十足的父亲，岸英感到非常幸福。

收到毛泽东的信时，毛岸英正在参加全国土地会议，他即抽空将父亲的信译好托人给岸青带去。

但就在此时，毛岸青从苏联回到中国。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极为喜悦，立即给毛岸英又写了一信。

(六) 不要那种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 (1947. 10. 8)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毛泽东这封信，充满着家庭的亲情、温情，儿子、女儿、还有江青的情况，他都谈到了。对毛岸青是：“这个孩子很久不见，

很想看见他。”；对李讷更是十分爱怜，“你给李讷写信没有？”“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

日理万机的领袖，如此关怀儿子的成长，足见毛泽东的慈父之心。这封信里，毛泽东着重强调要以人民利益为本，来作为修养自己的指导原则，只要如此，“总是会有进步的”。有一个思想和品质都超凡的父亲在旁看着你的成长，提醒着你的思想和工作，而这些都是毛泽东自身的伟大智慧和人生体验的结晶，对岸英来说不啻是滋润心田的甘露。为人民服务乃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怪不得岸英如此重视父亲的这条家训。

1984年，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从此，岸英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学习中，一直遵循着父亲对他的这一宝贵教导。岸英非常珍惜它，在他牺牲后，我在他的日记和几本笔记本的扉页上都看见过他对这一段话的摘录。这一教导已经成了他的座右铭。1949年5月，北平和平解放不久，父亲住在北平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就在绿树成荫，和风煦煦，水波荡漾的双清池畔，岸英和我再一次聆听了父亲这一教导。当时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父亲笑容可掬，语重心长，意深情切；岸英两眼熠熠闪光，聚精会神地聆听指教。我还记得，小鸟就在旁边的绿树丛中婉转啾鸣，池中红色的小鲤鱼也游上了水面，在我们的脚畔悠然地漂浮着，轻轻地摆着小尾巴，仿佛也在那里侧耳细听。后来岸英对我说：爸爸的这一教导，应该成为我们这一辈子的座右铭。”

1948年，毛岸英又去山东渤海地区阳信县沈家油塘乡张集参加土改复查工作。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解放区土改整党中，“左”的错误有蔓延的趋势，为了使党的政策全部走上正轨，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名言，年青的岸英，对这一点很好地领会了，在张集划成分时，岸英从实际出发，既

掌握政策，又注意团结。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的一次会上指出：毛岸英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岸英心情十分激动，正当他想去看看自己的父亲时，毛泽东却离开陕北，经过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转战途中，毛泽东仍不忘给长子捎去一个温馨的祝福。

(七) 我们到了石家庄 (1948.4.29)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

祝你工作顺利

你的父亲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那里和父亲相聚了。

1948年12月，根据党的安排，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入北平作准备。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弹，保证水电、交通畅通，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

3月24日，毛岸英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进驻北平。电话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颐和园，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他们忙活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刚刚把室内检查完毕。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急待完成，光沿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加上围墙外还有原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地堡、火力点……，时间只剩下半天了！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向毛岸英建议说：“我们分成5人一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毛岸英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和4名战士把手挽在一起，向着可能潜藏的死神冲去。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消除各种可能的不安全因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入北平铺平道路。

就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月，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了。当时岸英已经26岁，按照中国历来的习惯，这已经属于晚婚之列。这其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曲折。于此也可见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是何等严格。

岸英和思齐在延安就认识了，是毛泽东为他们的相识、相知提供了机会。

他们经过不断的了解和接触，1948年，在西柏坡定下了终身。热恋中的一对恋人，渴望着洞房花烛之夜。岸英和思齐也有些性急，二人双双来到毛泽东面前，提出早日完婚的打算。父亲喜欢他们，他们以为毛泽东一定会答应。

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向他们泼了冷水。毛泽东问刘思齐：“你正在学习，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吗？”

思齐说：“结婚后好好安排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

好？”

毛岸英说：“好，听爸爸的。”

二人转身离去了。但是，不大一会儿，岸英又回到毛泽东的房间。

“我今年已26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结婚呀？”

“是的。”

毛泽东当时冲岸英发了一通脾气，他说：“按照解放区的法律，女方必须满18周岁，男方必须满20周岁，思齐还不满18周岁，你们必须守法，不能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有半点特殊。”坚决不同意他立即结婚。

毛泽东的火气很盛，岸英有点不够冷静了，他也来了脾气，一转身，就气呼呼地走了出去。但是，过了不久，岸英就想通了。是呀，父亲的话，哪一点不在理呢？共产党自定的法律，岂能自己违反，失信于民，那会叫别人怎么看自己呢！

过几天，岸英向毛泽东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49年9月，思齐过了法定年龄。他俩在先征得了思齐妈妈的同意后，再次征求父亲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次高兴地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还是应该艰苦朴素。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岸英和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参加吃饭的名单，名单上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等。

毛泽东看了看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赞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1949年10月15日，婚礼在中南海里举行。

婚礼简单而热烈，天下底定，夺得政权，刚刚举办了开国大典，岸英的婚礼又为中南海增添了新的喜悦。岸英穿的是为外宾当翻译时穿的工作服。思齐穿的上衣是灯心绒布的，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晚上七八点钟时，宾客们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大家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并向毛泽东祝贺。毛泽东举杯走到思齐的妈妈张文秋的面前，对她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夹大衣，这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他风趣地笑着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在场的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新中国成立了，按中国封建传统说法，他是“太子”，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没有半点优越感，只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不少亲友给他写信，或来北京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但岸英像他父亲一样，对于违背党的原则的所谓人之常情，进行了批评

和抵制。

他的舅父杨开智托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提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针对这个不正当的要求，岸英在给表舅的回信中说：

“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人。而尤其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毛岸英在信中还写道：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爹、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

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的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我的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曾给毛岸英当过保姆，并与开慧一起坐过牢的孙嫂，这时也来信反映家庭困难。毛岸英向有关部门反映，请求组织解决，而自己则不徇半点私情，于1950年8月19日给孙嫂回了一封信。

孙嫂：

你的信我前天才看到，这是因为我自你们那里返回北京后，马上又被公家派到别处去了，前天才回来。

你在信中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然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可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污辱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众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你的身体千万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为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保持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

信末还补上一句：岸青问你好！我父亲也问候你，并望你决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把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岸英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

毛泽东便把长子交给了彭老总，让彭老总带岸英到朝鲜战场又经受一番血与火的考验。

就要赴朝鲜战场了。毛岸英匆匆赶到医院和正因手术住院的爱妻告别。分别在即，两人心里都有说不出的依恋。谁都没有料到，这竟是刚结婚一年的小夫妻的永别。

1950年11月5日，毛岸英——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带着父亲的重托和期望，怀着对爱妻的无限依恋，悲壮地离开了人间，长眠于朝鲜的国土。

在朝鲜桧昌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矗立着一块3尺高的大理石墓碑。

墓碑的正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几个大字；墓碑的背面刻着：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

年 11 月 25 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他永远地去了，年仅 28 岁，正是英姿焕发，强奋有为的年华。毛泽东又为新中国献出了一位亲骨肉！

毛岸英的名字，伴随他高尚的品德和纯真的情操，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二、要争一口气 ——致刘思齐

(一) 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1955.8.6)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祝好！

父字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这是一封很有些特别的家书。毛泽东家已长大成长的女儿只有李敏、李讷，现在又多了一个女儿：刘思齐。这是有一番特别来历的。

这一番来历，还得从头说起。

刘思齐（亦叫刘松林）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的女儿，1930年出生于上海。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早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北

京燕京大学读书，1922年，来到颇有民主气息的广州。国共合作后刘谦初加入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洪流，1926年参加北伐军，任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的社会股股长，在北伐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是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举人家庭，15岁时，她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张文秋参加了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军进驻武汉以后，刘谦初和张文秋相识。不久，两人相爱了。

刘谦初认识毛泽东，他非常敬佩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曾和毛泽东纵谈过天下大事。1927年初，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结束后，刘谦初把张文秋介绍给毛泽东：“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文秋，在京山县委工作。”

“好哇！京山县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毛泽东热情地握住她的手，笑着问。

“农会成立了，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审判斗争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高涨；不过，骂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也不少。”

毛泽东指点张文秋说：“抓香摒臭”，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来封建地方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中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我们闹革命，就要抓住“好得很”这股香，摒除“糟得很”那股臭。

自从认识毛泽东后，张文秋和杨开慧也有了来往。那时岸英只有5岁，岸育才3岁，两兄弟天真地在张文秋身边穿来穿去。张文秋也非常喜爱这两个孩子，常抱起他们亲亲，逗他们玩耍，

还经常帮杨开慧带两个孩子。同志交朋友，两家越来越亲密了。岸英和思齐的姻缘，饱含着两家革命的情谊。

1927年4月，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新婚不过3天，刘谦初就随军开赴前线了。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京山县委接到省委通知，命令县委掩埋枪枝，分散隐蔽，京山县城一片白色恐怖。张文秋在暗道夹壁里躲了三天两夜，后来还是装死人，躺在棺材里，被抬出城外脱了险。

大革命失败后，党派刘谦初到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因在九江受阻，只好撤回武汉，又转赴上海。1928年初，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年底调任山东省委书记。

1929年3月，张文秋在上海大马路参加“三八”妇女节示威游行，恰被刘谦初的好朋友发现，张文秋由此知道了丈夫的行止。刘谦初收到张文秋和朋友的来信，也惊喜异常。新婚刚刚3天，即告别离，天南地北，不通消息，兵荒马乱，白色恐怖，生死未卜，两颗心无时无刻不在互相牵念。刘谦初惊喜之余，即请示中央调张文秋到山东工作。张文秋遂化名陈孟君，来到济南，担任省委执行委员兼妇工部长。新婚3天即告离别的夫妻重逢了。

重聚不过两月，刘谦初奉中央指示去青岛组织6家纱厂总罢工，两人又分开了。

这年7月，张文秋被捕。8月，刘谦初也被捕。

在狱中，刘谦初受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张文秋被几次加刑，“坐老虎凳”，昏迷不醒，但他们始终不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由于叛徒的出卖，刘谦初完全暴露了，张文秋则继续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

这年冬天，在山东省委的多方营救下，张文秋由于怀孕获释

出狱。她把随身衣物留给同牢的女囚，只穿件灰布囚衣走了出来。她一再要求典狱长答应她和丈夫再见一面。

在男牢铁栅栏前，他们夫妻见了最后一面，张文秋紧紧握住刘谦初从铁栅栏伸出的那被铐住的双手，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你出去以后到哪儿去啊？”刘谦初问，看张文秋摇摇头，便说：“先到律师李化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到上海找妈去。”“妈”就是党。这时她才点点头。

“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刘谦初的苍白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要想念齐鲁，思念故土，就起个‘思齐’吧。”刘谦初对故乡一向一往情深。

这年春天，张文秋生下女儿思齐，她找了个保姆，自己又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

此后，刘谦初在两年时间内，通过地下组织，先后给张文秋送来 20 多封信，并通过她转给党中央。周恩来称赞说：“刘谦初在狱中是坚定的，对党是忠诚的。”他指示地下工作者设法营救。瞿秋白叮嘱张文秋：“这些书信是谦初在狱中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是真正的铁窗生活，你要编号好好保存起来，将来教育群众。”

正当地下组织开展营救工作时，山东军阀韩复榘于 1931 年将刘谦初杀害于济南。

不久，地下组织转来刘谦初给张文秋的遗书，上面写着：“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和最亲爱的兄弟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紧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母亲”指的是党。

数年后，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二人共同从事革命活动，并共同负起抚养小思齐的担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带着思齐辗转来到延安。

1938年，刘思齐在一部话剧中扮演一对被捕的地下党员的小女孩，演得非常成功、感人，引起了在场的毛泽东的注意。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张文秋的女儿，毛泽东当即认刘思齐为干女儿。从此，刘思齐经常去毛泽东的窑洞玩耍。

翌年，思齐随继父陈振亚、母亲张文秋去苏联，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扣留。1942年，陈振亚和毛泽民等被盛世才杀害。张文秋和刘思齐被关进监狱长达4年之久，直到1946年夏才返回延安。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毛泽东看望了从新疆归来的全体同志。他和每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一一握手，连连说：“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张文秋，停住脚步说：“你回来了，好不容易呀！思齐呢？怎么没有见到她？”张文秋把站到身后的思齐拉到毛泽东跟前，要她问好。毛泽东拉着思齐的手高兴地说：“七八年不见面，长成大人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还是我的干女儿呢，记得吗？”思齐点点头：“记得，记得。我们常想起你呢。”

两次见到毛泽东，都给她留下美好的回忆。事隔几十年，刘思齐撰文写道：“1937年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了主席，但可惜的是那时我的年龄太小了，只是在朦胧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和蔼可亲的伯伯的形象，他轻言细语，笑容可掬。”

第二次，在刘思齐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这次看望是与阳光、自由、欢乐融合在一起的。4年的狱中生活，使我

生疏了阳光、隔绝了自由和欢乐。我象久旱的沙漠突然遇见了甘甜的雨露，贪婪地吸吮着。我忘情地享受着这久别的阳光，难得的自由，和对我来说是梦幻般的欢乐。”

返回延安后，刘思齐有机会到义父家去探望。她和刚回国半年的毛岸英相识了。这时，岸英 24 岁，刘思齐也已是 16 岁楚楚动人的少女。他们的童年和少年，颠沛流离，受尽苦楚，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苦难的磨炼，又使二人都具有早熟、深沉、坚毅的特点。这些性格上的共同点，又兼两家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很快的接近，由接近而相互理解，由相互理解而相爱慕，两颗具有共同理想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也乐意玉成这件事。为了创造二人加深理解的机会，他不断邀请干女儿到家里来玩。心心相印的一对青年男女进入热恋中。

1947 年 3 月，胡宗南率 20 万大军进犯延安。刘思齐随部队撤离，渡过黄河到山西，毛岸英则跟随父亲转战陕北，一对热恋中的青年，被战争拆散。直到 1948 年夏，他们才重逢于河北省的西柏坡。

1949 年 3 月，他们随中央进入北平，刘思齐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就读。

1949 年 10 月 15 日，毛岸英和刘思齐结为夫妻。婚后，刘思齐继续上学。

岸英要去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了。新婚不久的夫妻就要分手。他在傍晚时，匆匆赶到北京医院看望因割除阑尾手术住院的爱人。

岸英怕思齐为自己上火线担心，没有告诉她去朝鲜，只是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出差，叮咛她要照顾好父亲和岸青，……就象一个兄长嘱咐妹妹。

而这竟是他俩的最后一次见面。望着心爱的丈夫离去的背影，年仅20的刘思齐做梦也想不到，从此她再也见不到丈夫。

“妈妈，我要出国，来向您告辞。”他对岳母是无话不说的。

“多保重，早些回来。”

“是，弟弟岸青一直是我照顾。我走了，就只好托付给您了。”

“你放心，我会照顾他。”

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您没有儿子，我和岸青没有妈妈，我兄弟俩就是您的儿子。”

临别时，毛岸英忽然说：“妈妈，我那块手表不顶用了，您那块自动表，借给我用吧。将来回国再还给您。”

张文秋的这块表，是朋友赠送的。她舍不得用，一直珍藏着。这时取了出来，深情地说：“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表需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妈妈送给你的纪念物”。

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沉重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丰富的父亲。当噩耗传来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他担心新婚仅一年的儿媳承受不了如此残酷的打击。毛泽东将这万分不幸的消息隐瞒着，以便刘思齐安心学习。

然而，儿媳刘思齐每周必到的看望对他是一场感情上的无尽灾难。刘思齐每次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几个月不来信？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慰她。

所以，对于丈夫的牺牲，开始刘思齐一无所知，她依旧在中学念书，忙于自己的功课。她依旧每周必去看望爸爸，也按岸英的嘱托尽量照顾岸青。她还深深地为自己的甜美幸福而欢快。只是，新婚仅一年丈夫就远离，她不能不常常惹动情丝。她一遍又

一遍地回味丈夫临别时对她说的话：“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接到信，可别着急呀！”她信任毛岸英，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正忙于自己的工作，不便给她写信。不过，这时她已经知道毛岸英是去朝鲜作战，在志愿军总部搞翻译工作，但不知有什么特殊使命，或许保密极强，她不能多问。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父母都是做过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不该知道的不问，这一点她懂。

然而，她有时也暗暗奇怪，何以一连3年，岸英竟没有片纸只言寄来？那么多的指战员都回国探望过，岸英怎么一次也不回来？保密性再强，难道一封问安的信也不能写吗？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老首长、战斗英雄，见了她以后都特别客气，又相当谨慎。有一次开英模代表大会，她遇见一些战斗英雄，这些英雄象是怕她似的，谈了几句话，就赶快躲开了。

刘思齐着实疑惑。她也作过不幸的推测，但那太可怕了，她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就如此不济，所以又赶紧驱走可怕的猜想。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朝鲜停战协定也已签字，岸英怎么还不回来？她越来越有些坐卧不安了。

岁月无情，毛泽东作为公公，不能也不愿一直扮演世界上最难堪的角色。到了1953年，他终于向刘思齐讲了真情。

为了使她能承受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毛泽东颇费苦心。他先谈到为革命牺牲了的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潭、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的毛福轩……刘思齐越听越不对劲，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岸英为何还不回来？难道他……她不敢想下去了，而安慰起年迈的公公。这天，她离开中南海时心慌意乱。

一周以后，刘思齐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这次周恩来也在场。

毛泽东亲自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她。她痛不欲生，哭了好久。毛泽东强忍悲痛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心潮翻滚。周恩来也难过地忙碌着，他一面安慰刘思齐，一面还要照料毛泽东。他触到毛泽东冷冰冰的手，心里一惊，急忙对刘思齐耳语：“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刘思齐一愣，转而又哭着去安慰毛泽东……

毛岸英的牺牲对刘思齐刺激太大了。她寝食难安，神经衰弱。为了不引起毛泽东的悲痛，她只有躲在屋里饮泣。可是在饭桌上，她那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却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提筷沉思，长叹一声，放下筷子，粒米未进，起身慢慢地离开了饭厅。

从此，刘思齐只有把哀伤压在心底，把眼泪咽到肚里。毛泽东当然知道她的心意。看着她日渐消瘦憔悴，他像是在安慰儿媳，又像是在安慰自己，不只一次地说：“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而牺牲。”自从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公开后，毛泽东就对她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从那时起，毛泽东格外疼爱她，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在每次通信中，总是称她为“亲爱的思齐儿。”

1954年，刘思齐高中毕业，这时她已24岁。为了进一步深造，恐怕更主要是为了让她换一个环境，以免触景生情，走出往日生活的阴影，减轻内心的痛苦，毛泽东让她去了莫斯科大学，就学于数力系。出国前夕，刘思齐患了重感冒，病中，她给爸爸去了一信，表示了学成为国效力的决心，希望能见一见爸爸。毛泽东写信要她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并说最要紧的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于是，有了前面毛泽东给刘思齐的信。

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思齐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远隔万里外的毛泽东对她各方面的成长仍然十分关注，不断有书信寄往。

(二) 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

(1956.2.14)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远在异乡他国，刘思齐不断写信给毛泽东，她思念爸爸，也深知失去爱子的父亲如何需要安慰，毛泽东也想念、疼爱不幸的女儿。这是毛泽东于刘思齐在莫斯科大学第一学期结束时写给她的信，表现了一位慈父对于自己的女儿的爱护和期望。

由于身体欠佳，在异国独处，学习吃力，刘思齐不断生病，同时还要跟上俄语授课，刘思齐感到异常的困难。1957年暑假，刘思齐回国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要求转学国内。

毛泽东理解女儿的难处，很快回了信，同意她转学。

(三) 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 (1957.8.4)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

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八月四日

毛泽东这封信是以父亲落款的。这封信，毛泽东写得有原则、有感情，既提出自己的意见，又鼓励孩子学处世独立自主，提醒她“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转学，“家长”二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疼爱女儿之心。

接到毛泽东的信，刘思齐开始办理转学手续。

但这时有人讥笑她，说她没有读好书，从国内读到国外，又从国外读回国内，没出息。因此，刘思齐很感苦恼，很快病倒了。她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人们的讥笑和自己的苦恼。毛泽东当即回信，帮助她克服犹豫不决的态度。此信和上信，前后仅相隔5天。

(四) 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 (1957.8.9)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八月九日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刘思齐坚定了转学回国的决心，在毛泽东支持下，她在暑假里办了转学手续，于这年10月进入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

这两信，时间仅间隔5天。按理，这些话都是可以当面说的，但这里偏偏都是书信往来。

这其中必有原因。

原来，事情就出在江青身上。

江青是毛岸英的继母，岸英本来很尊重她，尽管她只比岸英大8岁。岸英从苏联回国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对这位继母是很礼敬也很亲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身上的各种恶习渐渐表现了出来，而对毛岸英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

但毛岸英毕竟是毛岸英，他是毛泽东的长子，身上有着毛泽

东不屈的秉性，他虽不及江青年长，但革命资历并不比江青浅。又兼文化程度高，世面见得多了，政治上较成熟，又有志气，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和喜爱。因此，江青不敢惹毛岸英，有些毛泽东不便说出的话，毛岸英不仅能说，而且敢说。

这样，江青对毛岸英只有退避三舍，但心里怀着忌恨。

毛岸英牺牲后，江青可找到了泄愤的机会。她把对毛岸英的怨恨都倾泻到刘思齐身上。

1957年暑假，刘思齐刚从苏联回国，江青就派人收走了她出人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还放出话来：“刘思齐不是我们家的人！”

因此，刘思齐进不了中南海。这样，自1957年以后，父女俩只有书信往还了。

虽然如此，毛泽东对刘思齐仍像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询问她的情况。

1959年，刘思齐生了一场大病。毛泽东得知后，在庐山会议期间，千里迢迢，寄来一信。

(五) 登高壮观天地间 (1959.8.6)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

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书录了唐朝诗人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给刘思齐，以安慰她病中的情绪。

此时，刘思齐正在北大俄文系学习。毛泽东劝慰思齐，“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以“消愁破闷”。

刘思齐的身体状况，一直让毛泽东挂牵。作为父亲，毛泽东深知思齐身体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心情欠佳，因而在关心她的身体状况时，也尽量从心理上给女儿以鼓励和支持。

从庐山下来以后，毛泽东得知了刘思齐不时地受江青恶气的情况，便以十分关切的语气给刘思齐写了一信，鼓励她立雄心壮志，争“一口气”。

**(六) 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
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
(1961.1.15)**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

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

平安

父字

一月十五日

信里，“极为挂念”4字，表现了毛泽东对女儿无微不至的关怀。父亲十分体谅女儿的难处，从支持刘思齐出国留学，到同意她转学国内，又鼓励她不要为误解、嘲笑而动摇悲观，处处体现了一位慈父对女儿的爱心，但江青却背道而驰，时而对思齐冷言冷语，时而轻蔑排斥。毛泽东不满于江青的劣态，一再勉励女儿“要争一口气”，为死去的生父和丈夫，为毛泽东本人，也为轻视、仇视她的江青“争这口气。”怎么争气呢？毛泽东勉励她“要立雄心壮志”，制服病魔，早日投人为国效力的行列。毛泽东写此信时，距刘思齐大学毕业只有半年。信末“只是念你”，再现了对女儿的无微不至的关怀。短短百余字的家书，两次提到“挂念”、“念你”，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父亲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在鼓舞着她，刘思齐以顽强的毅力与衰弱多病的身体支持着，抗争着，终于完成了学业。1961年秋天，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门从事翻译工作。

这时岸英离世已11年了。在这10年中，思齐熬过了多少个痛苦的日日夜夜，流淌了多少眼泪。她也从青春少女步入了而立之年。身为公公的毛泽东很焦急，怎么能让她孤单地度过一生？他多次劝儿媳找个合适的男友，成个家。但心爱着岸英的思齐却不焦急。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又提笔写了一信。

(七) 你要听话，下决心结婚吧 (1961.6.13)

女儿：你好！

哪有忘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

“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说指挥员当断不断，犹豫不定，会错过战机，遭到失败。从这封信来看，毛泽东多次劝过儿媳，刘思齐也曾有过开始新的家庭生活的念头，但或因深深地思念岸英、或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一直拖了下来。“高不成低不就”一语，意在提醒儿媳，该下决心了，未必刘思齐真的是这样的心理状态。毛泽东的这封信，充满了慈爱，也洋溢着长辈的关怀。思齐被深深打动了。她下决心走出往日生活的阴影，开始全新的人生。

毛泽东为儿媳的新生活托过不少人，费了不少心思。

一天，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对主席说：“我们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有位教员，叫杨茂之，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这个人老实正派，我觉得可以，主席是不是……”

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般无二，于是毛泽东马上走出“第二步棋”，叫刘思齐与杨茂之来往一段时间，让

他们相互了解。杨茂之那时已 30 出头，是个大高个，精壮结实，父母都是海边上的渔民，他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忠厚老实的品格。在苏联，刘思齐见过杨茂之，那时杨和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等一起在苏联学习空军指挥。在留学生集会时，他们见过面，但没有交谈过。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刘思齐点头了。

爱情之花结出二度硕果。1962 年 2 月，刘思齐和杨茂之的婚礼在北京南池子刘思齐的四合院中举行。婚礼简朴而热烈，参加婚礼的前前后后足有上百人，把四合院的房子全挤满了。谢觉哉、伍修权、刘震等老一辈革命家也赶来祝贺。

毛泽东刚刚作了《咏梅》一词，亲自抄录一幅，作为新婚的贺礼，又给了 300 元钱，叫刘思齐自己购置礼品。

毛岸青的夫人、刘思齐的妹妹邵华也从大连赶来，向姐姐、姐夫祝贺。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邵华等 16 人在北大写了一张保工作组长张承先的大字报，江青公开点名批了邵华，还把邵华的整个家庭，从老母亲直到姐姐妹妹，全诬蔑到了，这对于刘思齐她们，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她们全家都预感到，江青的打击报复，立即就要开始。

刘思齐深知自己也在江青开列的黑名单之中，所以她尽量少惹事，夹紧尾巴做人，哪派战斗队都不参加，成了一个逍遥派。

那时江青大有权倾朝野之势，思齐姐妹很担忧。有一次，她姐妹俩去见主席，悄悄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明确回答道：“不会的，她不行，她是两面派！”

到 1969 年，形势对这家人越来越严峻。刘思齐的母亲已被关押起来了，罪名是“新疆叛徒集团的成员”。

刘思齐感到江青要对她下毒手了，她想去见毛泽东，但中南海进不去，江青早已下令将她与毛泽东的联系隔断。

她写信给杨茂之，问怎么办。杨茂之回信道：“你带着孩子上我这里来吧！”

刘思齐别无他法，只得拖着一儿一女，带着将降生的老三，去了江苏盐城，到了杨茂之身边。

有一次，杨茂之和同事们议论江青的时候，把刘思齐枕边的悄悄话捅了出去：“不会的，她不会接班！主席说过她不行！”

这下闯了大祸。1971年，刘思齐和杨茂之同时被投进上海的监狱。

刘思齐经常被提审，要她交待“诬蔑”江青的问题，有时是王洪文亲自提审，他拍着桌子大骂：“你敢诬蔑江青，就是诬蔑毛主席，你就是十足的反革命！”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杨开慧带着毛岸英蹲监狱，张文秋带着刘思齐蹲监狱，但那是反动派掌权的旧中国。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大儿媳、干女儿，也居然和丈夫一起坐牢！

刘思齐极为气愤。她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指名叫王洪文转。王洪文没有胆量扣押这封信。

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刘思齐和杨茂之才被释放。

刘思齐已年过半百，1985年，她又一次去朝鲜祭扫岸英的陵墓。岁月在匆匆流逝，但心灵中美好的情感永存。她也非常怀念父亲毛泽东，在毛泽东诞辰90周年之际，她在《父亲……》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尤其是在岸英牺牲后，他关心着我的思想，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健康，甚至我闲暇时阅读的书籍。到后来，他象慈母一样关心着我的婚姻……”

现在，刘思齐和杨茂之一家和睦幸福。他们有2儿2女，都已长大成人。刘思齐和普通人一样，平静地生活着，只是对父亲毛泽东和去世的丈夫毛岸英的深情，永远不能忘怀。她为大儿子

取名小英，寓含着对岸英的无限思念。

三、好生静养，以求全愈 ——致毛岸青

(一) 看见哥哥，好象看见你一样 (1946.1.7)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哥哥，好象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毛岸青是毛泽东第二个儿子。

做伟人的儿子意味着与众不同，也包含着付出。做共产党人领袖毛泽东的儿子更是如此。在共产党被压迫“围剿”的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毛泽东的儿子们颠沛流离，饱尝人间苦难。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毛泽东的子女们也仍然和普通人一样，没有特殊的地位和待遇。长子毛岸英不是安享“太子”之位，而是捐躯于异国沙场。毛岸青虽然没有为此而献身，但却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4岁离父，7岁失母，流落街头，惨遭毒打，隐患终生。后又到异国求学，一生坎坷，毛泽东对他深感内疚。

但他中年得了子，使毛泽东有了第三代传人，使千万人的心得到安慰。

1923年11月13日，毛岸青生于湖南长沙板仓乡。

岸青出生时，毛泽东刚好在长沙，中央派他来这里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帮助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区的组织，于是他得以抽空回板仓看儿子。可是儿子刚满月，毛泽东又奉命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4年间，父子们离离聚聚，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少得可怜。毛泽东为了中国这个“大家”，那里顾得上妻儿这个“小家”。岸青不能象平常人家的孩子那样得到父爱。

岸青4岁那年秋天，毛泽东奉命发动秋收起义，他匆匆告别妻儿，挥手而去，从此天各一方，20年后，父子才得重逢。因了毛泽东的关系、妈妈带着岸青3兄弟，东躲西藏，为逃避反动派的搜捕、迫害，历尽人间苦难。年仅4岁，父亲即离去，岸青对父亲的印象已很模糊，他也无机会得到父爱。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后，他又永远失去了母爱。他的童年是在哥哥岸英的细心照料下活过来的。

因为被特务毒打，岸青两耳失聪，头部时常隐隐作痛，这像一块驱不散的阴影笼罩着他，影响和干扰着他正常的思维和生活。

1937年初，党组织安排他和哥哥岸英一道去苏联。14岁的岸青结束了地狱般的流浪生活，开始了安宁的新生活。

来到苏联以后，父子之间中断多年的音讯又联系上了。岸英、岸青不断给父亲写信，表达自己的思念，并汇报离别后的情况。毛泽东每次收到来信，心情都非常激动。他喜欢这两个儿

子，对于他们受苦的经历深感内疚，尤其对曾遭反动派毒打，头部受过伤的次子，又心疼他，又同情他。解放初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很同情岸青，他很小就和岸英流落在上海街头，受尽了苦难，几次被警察打过，对他的刺激很大。”因此，他尽可能抽空给儿子写信，安慰、教育和鼓励他们。

由于岸青和哥哥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在苏联学习期间，都连跳过几级。从十年制学校毕业后，毛岸青考取了东方大学，继续深造。1946年初，毛岸英先期回国，把弟弟的情况带给了父亲。毛泽东因长期劳累，于1945年11月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1946年1月上旬虽有好转，但不能工作，仍在疗养。当时他见到岸英回国，又获悉岸青的消息，精神倍爽，病除人半，当即挥毫舞墨，给岸青写了上面的信。

毛泽东一共给毛岸青写了多少信？没法统计，目前公开的也有限。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可以看出，他是尽可能抽空给儿子写信的，以安慰、教育和鼓励他。

从这封信中可看出，毛泽东是一位细心的父亲，由于环境的影响和自己情感中的矛盾性和变迁性，他有3次婚姻，而且都留下了同父异母子女。作为父亲，他衷心希望孩子们和睦，所以常在给岸英岸青的信中提到他们可爱的小妹妹李讷。但他又非常尊重已成人的儿子们的感情，极少提到江青，即使提到也是只说我和江青都好之类极为简单的介绍，从不勉强孩子们去接受这位后母。

岸英回国后，毛泽东更加关心远在异国他乡的岸青。当时，他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工作的紧张繁忙是难以想象的，但他仍抽出空隙给儿子写信。

1947年9月，毛泽东在给毛岸英的信中特别提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

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又以欣喜的心情写信给毛岸英：“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寥寥数语，道出了父亲的思子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曾在中宣部从事翻译工作，参加翻译了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五六本书。他在苏联学习10年，俄文功底深厚，翻译能力很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

可是在婚姻问题上，却不能一帆风顺，直到37岁，他才喜结良缘。这里，不无因遭毒打而遗下后遗症的因素。

毛泽东对他说：“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1950年，哥哥牺牲的消息传来，岸青沉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他的童年和少年得到了哥哥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兄弟俩在上海滩流浪时相依为命，在异国他乡又携手共进，互相勉励。他回忆往事，悲痛难抑，加上脑部受伤留下的后遗症，身患重病，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后又去大连疗养。

经过几年疗养，岸青的病情大为好转。1957年夏，毛泽东去大连，见岸青的病情大有好转，很是兴奋。他和儿子亲切轻松地谈了很长时间，岸青也得到极大安慰。

在大连，岸青和一位医院的女护士交了朋友。但毛泽东派人去了解护士的情况后，认为不合适。便劝告岸青：“这个姑娘别谈了，找个合适的吧。”这以后，毛岸青的病情出现了波动，毛泽东对儿子更加挂牵，多次去信询问，安慰他，劝他耐心治

疗，别着急，不要自己改变治疗方案。1960年，当毛泽东再次得知他的身体大有好转后，马上写了一封较长的信。

(二) 好生静养，以求全愈 (1960)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其他同志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全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即邵华——编者注）来看你，她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他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志趣？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愉快！

父亲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见毛泽东对爱子是何等关怀。“有信，文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说明这3位女性经常穿梭般往来于北京、大连之间。他们一定是奉了毛泽东的安排去经常照顾岸青的。毛泽东自己无法经常亲自探望病情时好时坏的儿子。从这信也可知，岸青和邵华已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很满意，很高兴，“少华是个好孩子”，一句话道出了毛泽东的欣喜之情。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和邵华于同年在大连结婚。这时，岸青37岁，邵华22岁。1962年，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北京，又一同去湖南老家探望。

1970年1月，当时青云直上的邱会作急忙来见毛泽东。

“主席，邵华在医院要临产了。”邱会作急匆匆向毛泽东报告。

“快生了？”毛泽东总算看到了第三代。他很兴奋。

“难产！”邱会作补了一句。

毛泽东一惊：“为什么？”

“头胎，胎儿又大。”邱会作望了望毛泽东，吞吞吐吐地说：“主席，你说留哪个？”

“两个都留！”一句硬如铁的话从毛泽东的嘴里迸出来。他指着邱会作：“你告诉医院，想方设法，母子两安。”

果然，婴儿从妈妈破开的腹中看到了陌生的世界，邵华安详地躺在床上。

毛泽东有了长孙，高兴异常。他为孙子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毛新宇，意为开创新的天地。

对于毛新宇来说，爸爸酷爱历史、诗词、文章的形象总是留在他的脑海里，深受祖父的影响，毛新宇特别喜爱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在中学，毛新宇编过朱元璋的故事《晨昏钟》，写过《论荆

轲》，在联欢会上，他壮怀激烈地朗诵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

1988年秋，刚满18岁的毛新宇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1992年，他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谈起对爷爷的评价，毛新宇说：“始终在感情和理智之间游动”。

毛岸青爱好读书，他最喜欢读俄文，说俄语，床头、手头总离不开俄文书籍。毛岸青在苏联整整学习了11年，回国后不仅保留了苏联人的一些生活习惯，连语言习惯也难改过来，有时说普通话找不到合适的汉语词汇，就用俄语来表达。他性格内向，行动迟缓，自理能力差。江青多次想把他赶出中南海，借口是他有精神病。

他非常喜爱自己唯一的儿子毛新宇。新宇出生于1970年，这一年岸青已47岁，中年得子，得之非易，这个小生命无论按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是毛泽东的特殊历史地位，他的出世太重要了。对岸青言，仿佛完成了他作为毛泽东儿子的某种潜在的责任。对毛泽东而言，他是毛家的传人，弥补岸英牺牲时未留下孩子的缺憾。对热爱着毛泽东，感激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而言，也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岸青现在生活在宁静和睦的家庭氛围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他们一家住在远离闹市的京西一家独门独户的小院中，这里清静幽雅，花草繁茂，蜂鸣鸟啼，最宜于毛岸青这样的人修身养性。

1993年，在历史巨人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毛岸青、邵华和他们的独生子毛新宇出现在韶山毛泽东铜像揭幕仪式上。这时，毛岸青已是70古稀的老人了。他在揭幕式上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他是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儿子。

四、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 ——致邵华

(一) 1962.6.3

你好！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六月三日 上午七时

毛泽东写给邵华的这封信无上款。

邵华原名张少华，毛泽东的二儿媳，毛岸青之妻。

刘思齐首先是毛泽东的干女儿，尔后才成为毛泽东的儿媳的，而邵华则先是毛泽东的“论友”，而后才成为毛泽东的儿媳的。

邵华的童年不堪回首，监狱和马背是她成长的摇篮。她与刘思齐是一对同母异父的姐妹，刘思齐的父亲是刘谦初，邵华的父亲是陈振亚，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陈振亚原是彭德怀部下的一个连长。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后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他紧跟彭德怀转战湘赣，三次攻打长沙，五次反“围剿”，立过战功，后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历经磨难，来到延安。这时，他已经37岁了，拖着一条伤残的腿，一直没有成家。

陈振亚怎么成为邵华父亲的呢？

西安事变以后，张文秋带着女儿思齐来到延安。

来延安之前，路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经林伯渠介绍，张文秋认识了陈振亚，他们是结伴来延安的。在分手的时候，陈振亚抱起思齐，亲了亲她冻得发红的脸蛋，用温存的眼光看着张文秋。

“抗大”第三期学员帮助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挖窑洞时，张文秋和陈振亚重逢。在这次谈话中，她倾吐了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和生活上的种种不幸，也了解了陈振亚参加平江起义和转战湘赣的传奇般的战斗经历……

1937年冬天，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彭德怀很关心老部下，特地批给60块钱，为他们筹备婚后生活费用。彭德怀操着家乡话对陈振亚说：“你这个‘老光棍’总算是有个家了，也了却我一桩心事。祝你们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抗大毕业，张文秋被分配到陈振亚所在单位工作。陈振亚是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的政治部主任，张文秋在政治部编辑《生活星期刊》。

1938年，张文秋生下邵华。看着平平安安的母女俩，陈振亚触景生情，给女儿取了个乳名“安安”。他们打破传统的宗族观念，又给女儿取名张少华，后来亦称邵华。

1939年春，发生“枸邑事件”，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陈振亚参加作战，以少数兵力击退了来犯敌军，获得了军委的嘉奖。可是，他的左腿又发炎、肿痛，军委决定让他去苏联医疗，由张文秋陪同前往，思齐和少华也带在身边。不料路经迪化（乌鲁木齐）被盛世才“挽留”并被残害致死。

张文秋刚刚摆脱丧夫的痛苦，重新编织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又被凶残的敌人无情的砸毁。同那个年代献身革命的许多女性一

样，张文秋承受了沉重的痛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陈振亚死后、张文秋生下第三个女儿少林。

1943年，她带着3个幼小的女儿，又一次被投进监牢。

生活在铁窗和敌人的鞭子下，幼小的邵华已开始知道与敌人斗争。敌人搜查妈妈的革命书籍，她和姐姐一道掩护转移，和妈妈一样，与敌人进行绝食斗争……

1946年，由于党的积极营救，也由于著名的“和平将军”张治中的努力，张文秋带着3个孩子和其他被盛世才关押的百多名同志一起，回到了延安。

新中国成立时，邵华已11岁。在恶劣环境中她没有上学机会。她常随姐姐刘思齐和姐夫毛岸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姐姐、姐夫的勤奋好学，毛伯伯学识的渊博，给邵华以深刻影响。引起了邵华对学习的强烈欲望。她对毛泽东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毛泽东说：“好嘛，你愿意上学，我来帮助你。”

不久，毛泽东介绍她进了中央直属机关的育英小学。从此，邵华刻意进取，一路顺风，走出小学的门，又进中学的门。1959年秋，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和邵华成了“论友”。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从少年到老年，孜孜不倦，始终不息，是名符其实的“读书破万卷”。他生活工作的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书橱成了主要的家俱。他睡眠的大木板床，一半放着重重叠叠的书籍。他外出视察、开会，也必叫工作人员随带着书籍，每到一地，还常常叫人到图书馆去借书。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也非常关心儿女们的读书情况，经常过问、督促他们，并和他们一起交流漫谈。

由于刘思齐、邵华是文科专业的，毛泽东与她们谈文学比较多。

毛泽东同她们谈论过《西游记》。他十分称赞孙悟空不畏艰险，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搏斗的精神，善于识别正义和邪恶的洞察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可贵品格和顽强毅力，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信条，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当谈到《聊斋志异》时，他认为其中的《小谢》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他说《聊斋》中那些善良的做好事的“狐仙”要多些就好了。

邵华的《中国通史》考试取得好成绩，便兴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说，“那我来考考你，你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吧。”邵华便按照教材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笑道，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说：“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

毛泽东的知识渊博，深为邵华折服。尤其令邵华赞叹不已的是，看是死的史料、知识，一到了毛泽东那里，就都“活”了起来。在他的谈话中、著作里，常常信手拈来一些典故，阐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道理，警策凝炼，引人入胜。和毛泽东谈史谈文，邵华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见解的肤浅。她有点茫然，不知自己何时才能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合格的文科生。毛泽东安慰地道：“不要急，知识需要积累，最重要的是要把书读活，切忌读死书，死读书，要勤动脑，要善于思考。”这给邵华以深刻的启示。

毛泽东更喜欢谈古诗。有一次谈起宋人诗词，毛泽东问邵华最喜欢谁的作品，她说陆游。毛泽东问为什么，她说陆游的诗词，充满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雄浑豪放的战斗风格，

常常表现出“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很是赞同，又问她最喜欢哪几首，邵华列举了《书愤》、《示儿》、《夜游宫》等几首。

毛泽东听后兴致极浓，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桌前，铺开宣纸，饱蘸墨汁，挥笔给邵华写下《夜游宫》这首词。邵华如获至宝。十年动乱期间，她虽然东躲西藏，却始终把它带在身边，保存了下来。

又有一次，毛泽东问邵华喜欢曹操父子谁的诗。邵华说她喜欢曹植的诗，毛泽东则说他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文章诗词，直抒胸臆，豁达洒脱，应当学习。他喜欢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篇章，还把其中一些词句写出来，加以解释。

毛泽东还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风。《将进酒》是一篇好诗，《蜀道难》也有些意思。他评论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采好，描写得逼真细腻，难得的是作家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的高明之处在于此而不在他。他还谈到王昌龄、陆游、辛弃疾的一些边塞诗，并把王昌龄的《从军行》等亲笔写给在座的儿女们。

最令邵华感到兴奋不已的是那次在中南海，毛泽东同她们谈起了唐代诗人。谈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时，毛泽东说：他年轻有为，才高学博，为文光昌流丽，二十几岁的人就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可惜死得太早了。他说他喜欢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对其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很欣赏。在谈话中，他发现孩子们也十分喜欢《滕王阁序》，非常高兴，一边背诵其中佳句，一边作评论。谈到兴头时，他坐到桌前，挥动中楷羊毫，悬腕作书录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邵华双手接过，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看到过这幅墨迹的书法家评论说：这 14 字分 3 行，互相呼应，一气呵成，气势磅礴，不同凡响。就全篇整体来看，结构和谐，画面很美，细看每个字，又是谨严而有法度，笔笔不苟，没有败笔，确实是一幅十分珍贵的墨宝。

1960 年，邵华因病休学去大连疗养，毛岸青也在那里。在这之前，她已向毛岸青有过很长时间的交往了。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毛岸青和邵华在这一年结为伉俪。

1962 年春天，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北京。毛泽东见到他们风趣地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遵照父亲的嘱托，两人先到板仓祭扫妈妈杨开慧的陵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双双回到长沙。这可乐坏了 90 高龄的外婆。媳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欣喜的笑容，眼睛闪着慈祥的目光。她一手拉着岸青，一手拉着邵华，端详来，端详去，总是舍不得松手，眼里渐渐盈满了泪花。杨开智舅舅和李崇德舅妈也向他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全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欢聚中。

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家家户户，矛盾丛生。同普通人一样，毛岸青和邵华的婚后生活，也有不如意的时候。

毛泽东知道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烦恼，便给邵华发去了上面的信。

信中提到《上邪》一篇，要多读。《上邪》，是汉朝民间歌谣《铙歌十八曲》之一。全词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指天。邪，通“耶”，语气词。上邪，就是“天啊”的意思。

这是一个女子表示坚决跟她的情人相爱的誓词，毛泽东要邵华多读《上邪》并在信中写了许多鼓励的话，是希望媳坚强。

些，不要为眼前的困境所难倒，要以事业为重；同时要坚信，爱情上的忠贞不渝，足以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家庭的矛盾和烦恼，也很令人伤脑筋，往往会影响到工作、学习和事业。但如果一个事业心强的人，全身心投入工作，往往会把家庭纠纷看得很淡，这也是处理家庭矛盾的一个好办法。50年代以后，毛泽东也和江青之间不断发生矛盾，但毛泽东不会为家庭琐事所累。这也许是过来人的经验。

毛泽东嘱咐邵华多为社会作贡献，也有以此淡化家庭纠葛之意。

邵华读了这封信，深受感动，她决定按照父亲的话去做。她的开朗豁达的性情恢复了，对岸青更加关心、体贴入微了。在生活上，以她干练明快的风格，把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力争学有所成，不辜负父亲的一片厚望。以后20多年的生活实践是他们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证明，他们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始终同舟共济。

张文秋的两个女儿都成了毛泽东的儿媳，也给人世间留下一段佳话。

有一天，邵华带小妹少林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摸着少林的头，十分风趣地说：“哎呀呀，这怎么办呢？我再没有儿子了！”

隔了一会儿，他对少林说：“你的两个姐姐都做了我的儿媳妇，你就做我的干女儿吧。只要我在世，你就常到我这里来玩。”说完，又和少林合影留念。

邵华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粉碎四人帮后，发表了多篇散文、传记。她怀念、热爱公公毛泽东，其中《我爱韶山的红杜鹃》、《滚烫的回忆》等篇目脍炙人口。

1991年，邵华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她自信地出入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礼堂，参与着中国的政治。

同时，她还着手整理、收集党史资料，希望把这些珍贵的记录，留给后世。

五、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 ——致李敏

(一) 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1949)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娇娇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是毛泽东的洋宝贝，是贺子珍生活的寄托，是毛泽东与前妻沟通感情的桥梁。父母婚姻的悲剧留给她痛苦，但她得到了充足的父爱和母爱。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和江青的狭隘、恶劣，使这位红色大公主生活于中南海的高墙红门之外，但父女心灵依然息息相通。

娇娇这个名字，说起来还有些来历。

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的长征红军队伍来到保安。这是个出奇的穷县，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一个十分破烂的窑洞里。由于县城小，无法找到必需的营养食品，快要临产的贺子珍营养十分

欠佳。所以李敏生下来时十分娇小瘦弱。前去看望贺子珍母女的邓颖超抱起这个在艰苦环境中的婴儿，充满了怜爱之情，说：“真是个小可怜的小姣姣啊！”

博学多闻的毛泽东想起《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净如芙蓉”，遂取名为“姣姣”（后来也常写成“娇娇”）。

娇娇为何取名李敏？

“敏”字来源于《论语》中的一句话。《论语·里仁篇》说：“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毛泽东由此得到启发，为娇娇取名李敏，为江青所生的女儿取名李讷。这是可信的，姊妹俩的名字来源于同一句话的两个字，顺理成章。

至于为何姓李，现在有这样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为了保密的需要，毛泽东化名“李得胜”（“离得胜”的谐音）。毛泽东非常喜爱这个名字，虽然撤离了，但最后一定会胜利。事实也果然是如此，仅一年时间，人民军队不仅收复了延安，而且迎来了全国战略决战。又过了一年，辽沈、淮海、平津决战大获全胜，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所以李敏的李来自“李德胜。”

一说江青原姓李，李敏、李讷都随江青的姓。此说也有一定道理，江青是一个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较少的女性，毛泽东当然更不用说，他们打破世俗之见、叫女儿随母姓，也完全合乎情理。

但更多的人强烈否认李敏的李是随江青的姓，而主张来自“李得胜”。这恐怕带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因为江青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说李敏随江青的姓，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仔细考察史实，这种说法很难成立，请看史实：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是在1947年3月，而毛泽东1946年1月7日给毛岸青的信中已提到李讷，可见，此时李讷的名字早已取定。姐妹俩的名字都来源于《论语·里仁篇》中“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有“敏”然后才有“讷”。李敏的名字当取于李讷之先。

既然李讷、李敏的名字早已取定，李讷的名字早在1946年1月就出现于毛泽东的家书中，那她们的“李”姓来源于“李得胜”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李得胜”当时既不存在，李敏的“李”，何能来源于此。

同一父亲的姊妹，既然一个姓李，为了统一，另一个也姓李，统一姓氏，也很自然，况且，李敏之母贺子珍此时已离开毛泽东，李敏既留在毛泽东身边，随后母江青的姓，也无不可。

再印证以1954年暑期毛泽东给李敏、李讷的信，称江青是她们的“妈妈”，李敏随江青的姓，就更有了根据。

1937年，贺子珍离开毛泽东去了苏联。

1940年，为了安慰独处异国的前妻，毛泽东把4岁的娇娇送到苏联，这给贺子珍带来极大安慰。

据说，母女俩相见时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来了？”

“找妈妈来了。”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什么礼物来了？”

“把我娇娇带来了。”

贺子珍非常宠爱女儿，用微薄的收入，给女儿买漂亮的裙

子、玩具，还带她去烫头发。娇娇得到母爱，她开心极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5岁的娇娇和妈妈、哥哥一起撤到离莫斯科几百公里的伊万诺夫市。冬天，在零下30℃的严寒日子里，没有暖气，没有烧炉子的劈柴，甚至连火柴都很紧张。每天发几块黑面包，食盐也极度匮乏，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着。在这种情况下，娇娇和母亲相依为命，不仅顽强地活下来，而且还用节省下的食物尽量照顾在苏联读书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苏联人民和红军进入外线进攻后，苏联国内的条件有所好转，1943年，8岁的李敏开始上五年制小学。

大战期间娇娇得了重病，濒临死亡边缘，被推到国际儿童医院太平间的副室，是贺子珍怀着满腔的母爱把娇娇从死亡线上救出来。为了精心护养女儿，贺子珍无法完成分配给她的劳动定额，也拒绝让娇娇回国际儿童院，为此，和儿童院的领导发生了争吵。

由于至今也说不清的原因，贺子珍被送进了疯人院。

母亲走后，娇娇又回到了国际儿童院，开始了两年多孤儿般的生活。直到1947年，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她才得以见到自己的母亲。

娇娇在苏联生活了7年，她4岁就离开毛泽东，贺子珍又很少同她谈起毛泽东，她对爸爸的印象逐渐淡薄了。

在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其中有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加里宁，还有毛泽东、朱德。

儿童院的老师经常对孩子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讲述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斗争的事情，老师们也讲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娇娇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这一切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中国的伟人竟是她的爸爸。贺子珍很少同她

讲起爸爸。

有一次，毛岸青和娇娇兄妹俩坐在无人的礼堂里聊天。突然，岸青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爸爸。”

“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看着岸青说得那么肯定，娇娇有点相信了。她去问妈妈，证实了哥哥说的是真情。但是，爸爸还是太遥远了，娇娇仍然想象不出她同爸爸有些什么关系。

此后，贺子珍在娇娇面前较多地谈起爸爸来。虽然离开了毛泽东，但贺子珍的一往深情，始终不渝，娇娇毕竟也是毛泽东的女儿，贺子珍不能不叫她了解爸爸。何况，女儿也会成为沟通双方感情的纽带。不过，贺子珍的叙述很简略，很一般，她把娇娇还当作小孩子，不愿和她深谈些什么。比如，为什么她同爸爸生活在一起等等。

1948年初，贺子珍带着小娇娇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哈尔滨。这时，李敏已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了。在异国他乡生活7年之久，祖国对她来说已很陌生了。

娇娇有一件终生感到内疚的事。

贺子珍回国时不到40岁，加上她那文静秀美的外表，显得风姿绰约。她多次表示过与毛泽东的关系既已结束，她要开始新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贺子珍把娇娇叫到跟前，对她说：“娇娇，我同你商量个事，我给你找个新爸爸，好吗？”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新爸爸！”一向在妈妈面前温顺听话的娇娇，此时却大哭大叫起来。

看到娇娇这种态度，贺子珍哭了。她伏在桌上哭了好久。从这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今天娇娇回忆起这些往事，神色黯然，心情沉重。

她说，我到现在也分析不清楚，当时听了妈妈想再婚的话为何会这样冲动。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当伟人的爸爸，不想要一个不如自己爸爸的新爸爸吗？那时单纯幼稚的我，还没有那么复杂的头脑，也不会那么世故。这种近似本能的反抗，只有一个主导思想：“妈妈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不愿有人从我这里分去妈妈的爱；另外，一个妈妈对我管教够严了，再来一个爸爸，我更受不了。”

12岁的小姑娘怎么会理解妈妈的苦楚？娇娇当然不可能想到，纯真的童心却决定了妈妈今后漫长的凄凉岁月。让妈妈孤苦寂寞地度过了一生。随着娇娇长大成人，她这种内疚越发强烈。

难道贺子珍竟然会按照小孩子的意见去办吗？显然，这表现了她的举棋不定。她知道和毛泽东破镜重圆的希望很渺茫，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但她和毛泽东10年夫妻，旧情难忘。何去何从，去问一个小孩子，好似拿不定主意的人去算卦问卜。娇娇的强烈反对，增加了她在两难中作出牺牲的一方选择的份量。

1949年春夏之交，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到沈阳，决定先带娇娇回北平。

13岁的娇娇天真活泼、聪明好学，她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也能用俄语写作。相反，她的中文水平同俄文相比，却明显地逊色了。她自幼离开父亲，父亲在她的心目中是陌生的，但她见父亲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在妈妈的提醒下，她给爸爸写了这样一封“可爱”的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接信一看，是一行行歪歪扭扭的俄文字，他一个也认不出来，赶快请来人翻译。弄清信中所写的内容后，他哈哈大笑，被女儿天真、俏皮的话语感化了。马上挥起大笔写了前面那封很“俏皮”的回信。

回信写好，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赶忙寄出，但他马上又改变主意，吩咐将该信用加急电报发出。

这时，恰好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尤金也到沈阳，贺子珍就托他和贺怡一起，把娇娇和岸青带回北平。

尤金、贺怡带着娇娇和岸青来到香山双清别墅，贺怡牵着娇娇的手对毛泽东说：“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娇娇接回来了。”然后转身对娇娇说：“快叫爸爸！喏，这就是你的爸爸，赶快叫爸爸！”

娇娇看见站在面前的身材魁梧而又慈祥的爸爸，和画报上的毛主席一模一样，激动得扑上前去，叫了声：“爸爸！”就依偎在他的怀抱里。毛泽东也激动得一下把娇娇抱起来，亲了又亲，享受着亲骨肉重逢的幸福。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听说娇娇回来了，都过来看望。毛泽东乐滋滋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个洋宝贝。”然后把娇娇一一介绍给他们。

娇娇半懂半不懂地听着他们在高兴地议论着什么。她回到祖国的时间不长，中国话听不太懂，以往同母亲贺子珍说话都是讲俄语，偶尔在俄文中夹一点中文，她经不住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问这问那，一着急说了--串俄语。毛泽东拉着娇娇的手放声大笑，并说：“英文嘛，我倒会一点，俄文我是一窍不通。恩来在就好了，他会。”

娇娇的到来，给毛泽东很大慰藉。每天晚饭后，他总是牵着娇娇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询问娇娇在苏联近10年的学习情况。娇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能用中文回答爸爸提出的各种问话了，不过还要夹杂一两句俄语，但父亲已能听懂女儿讲的意思，父女之间的感情进一步沟通了。父亲常常勉励女儿要好好学习，亲自教她学古诗，几天教一首，还要她背出来听，检查她是否巩固。

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娇娇，生活习惯和当时国内一般女孩子不同。夏天，她喜欢赤着脚到香山公园的湖边拾拾卵石，出去玩也不戴草帽。毛泽东办公时，她起初不懂是不能随便打扰的，遇有不懂的地方，就闯进办公室要父亲解答。有时顽皮起来，抱着父亲的头和脸又亲又爱，还用双手遮住父亲的双眼，叫他猜猜是哪--一个。毛泽东往往高兴地放下笔，逗着女儿玩。

毛泽东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虽无法纠正历史造成的错误，减去前妻的痛苦，但他了解贺子珍孤独、寂寞凄楚的心情。为了安慰心灵遭受过巨大创伤的贺子珍，他决定派娇娇定期前去探望妈妈。在毛泽东晚年，娇娇成为他与前妻沟通感情、互问平安、互致祝福的桥梁，而这桥梁几乎成了贺子珍生活和灵魂的寄托。

李敏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渐渐长大了，毛泽东不再称她的乳名，书信往来，李敏代替了娇娇。

1954年暑假，李敏和李讷随江青来到北戴河，她们套着救生圈在海里游泳，尽情地玩耍。为了让父亲分享她们的快乐，便给父亲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毛泽东向来推崇曹操，他欣赏曹操的诗文，尤其对《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更是极为喜爱，经常吟咏。如今女儿们到了曹孟德当年观沧海的地方，便引动毛泽东议论这位三国时代大政治家、诗人的思绪。当他接到两个女儿分别写来的信以后，很想借机让她们多读一些曹操的诗篇。于是他给两个女儿回了下面的信。

(二) 碣石诗是有名的 (1954.7.23)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信里的“妈妈”是指江青。

从这封信的称谓“我的亲爱的女儿”和收笔时的“亲你们”

这些文字上，我们不难想象毛泽东在收到两个女儿来信时的喜悦之情。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等地，是曹操当年征乌桓时到过的地方，碣石诗《观沧海》就成于此时此地。1954年，毛泽东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的名篇，传颂天下，其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千古绝唱。如今见了女儿们的来信，毛泽东自然想到一世枭雄曹孟德，故而因时施教，告诉女儿道：曹操“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并让她们找江青要古诗选本，以便教读。

1954年的暑假是愉快的，李敏她们长了很多见识。

从北京师大附属女中毕业后，李敏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读化学系。随着年岁的增长，李敏的心上也有了意中人——孔令华。孔令华是李敏从东北回来以后就读的八一小学的校友，是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现在是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他们俩人相识很久，彼此了解，情投意合。李敏将这心中的秘密告诉了爸爸，毛泽东很赞同这桩婚事。

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为李敏和孔令华主持了婚礼。本来，他们结婚的日子比这还要早一些，不巧毛泽东正在庐山开会，一时不得回京。他从庐山打来两次电话，还写了信，说婚礼一定要等他回来主持，这样就拖了下来。

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参加婚礼人员的名单，除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蔡畅、邓颖超、王季范、曹轶欧、王海蓉等，又拿出400元钱在丰泽园颐年堂摆了3桌酒席。江青和李讷在庐山避暑，没有参加婚礼；江青送了一段纯毛料作为贺礼。

李敏和孔令华结婚后，同毛泽东一道住在中南海一栋大院子里，大家庭增添了欢快的气氛。毛泽东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一有空就找他们谈话。孔令华根据岳父的建议，抽了很多时间钻研

政治经济学，遇到难点就向毛泽东请教，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毛泽东经常抱抱、亲亲小外孙，享受着天伦之乐。

江青对李敏如何呢？最初，江青还作作样子，尽量显出对李敏的亲热来，一会说李敏有画画的天赋，一会又说将来在体育上会成梁，一会又主动教她弹钢琴，还送给她衣服，并声称“情同亲生母女”。但李敏总感到江青的亲热有做作的成份，初见面的半年之内，从不喊江青“妈妈”，后来在毛泽东的恳求下，李敏才开始叫江青妈妈。但不久，江青就撕去伪装。

有一次上美术课，美术老师要学生画水彩画。李敏画了一张西瓜水彩。画的一边是一只深绿色滚圆的大西瓜，另一边画了一块切下的三角状的一瓣。画的挺好，老师给这张画打了5分。李敏很高兴，给妈妈贺子珍寄信时，把这张画也随信寄去。

贺子珍见到女儿的画，不禁触景伤情。那滚圆的西瓜，不正是毛泽东美满的家庭吗？那一边切开的瓜瓣，不正是自己孤单凄凉的写照吗？悲上心头，她在画面空白处写了一首诗寄往北京。她是寄给谁的呢？是寄给毛泽东的，还是寄给李敏的呢？李敏不知道，也从没见过这首诗。这件事，她还是从江青的撒泼中得知的。

那天，江青气冲冲地走到李敏的房间，责问说：“你用西瓜拉什么线，搞什么名堂？”一番话把李敏问得如坠烟雾，莫名其妙。

“你的妈拿你画的西瓜写了一首诗，用诗来讽刺我，骂我”，江青继续吼叫，“我岂能咽下这口气，我已经将这件事向中央报告了，让组织来处理这件事，要组织处分你妈。”说到这里，江青还觉得不解恨，又加了一句：“还要处分你的舅舅和舅妈，他

们也在里头出谋划策。”

李敏竭力分辩说：“画是我的作业，是我自己寄给妈妈的，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任何人给我出主意。”她接着说：“我妈要是写了诗，这首诗也是写给我的，是你把我妈写给我的诗截留了。”

江青无言以对，恨恨地说：“你以后不要来往穿线，上窜下跳。”说完转身走了。

一幅中学生的习作，竟然惹起一场风波，江青的狭窄气量和霸道作风暴露无遗。毛泽东见过这首诗没有，李敏不得而知，毛泽东从未提起。她去上海看望母亲，曾提起过这幅画和这首诗引起的风波，并要妈妈把诗念给她听，贺子珍只是默言无语。从此以后，贺子珍再也不给李敏写信了，不论李敏写多少封信，贺子珍都不复信，只是有便才带去一些口信。

由于难以见容于江青，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的要求。

毛泽东听了，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李敏知道爸爸爱她，舍不得让她远离。她根据爸爸的意见与孔令华商量，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去住，自己动手做饭，还保持着和爸爸的往来。

住了一段时间后，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

李敏自从搬出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她要进中南海就不那么方便了。

1974年，江青企图借批林批孔阴谋篡党夺权，李敏和孔令华决定去中南海反映情况，他们一起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因担心落到江青手里，要求面交。有的人奉“四人帮”旨意，借口“主席现在领导运动，特别忙，还要接见外宾，年事又高，不见客”，将李敏、孔令华拦在中南海外。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

见爸爸？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绝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李敏回到家后，大哭一场。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3次面。第一次是在陈毅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以后就生病了。李敏去看他，他拉住女儿的手，深情地说：

“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

第二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正守候在那里的汪东兴和华国锋，看着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爸爸，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前几天。她见病体深沉的爸爸躺在床上，举手投足已很艰难，面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智尚清醒，说话很吃力。李敏强忍泪水，叫了一声“爸爸”。毛泽东拉住女儿的手说：

“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来常来看我呢？”

李敏有些哽咽了，未及回答，毛泽东又问道：“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她。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毛泽东吃力地纠正她。

毛泽东病入膏肓，还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这爱女之情该是多么深切啊！临终前的毛泽东，是非常孤寂的。一句：“你为什么不来常来看我呢？”这对女儿的埋怨，令人心碎。李敏无言以对。爸爸哪里知道，她进中南海是多么不易啊！

毛泽东艰难地打起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

李敏没有听清，她用眼睛询问旁边的服务员，听到我爸爸说什么？服务员摇了摇头，表示他也没有听清。李敏也就没有回答。

毛泽东想表达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在李敏的心中，始终是个谜。多年后，她同一个挚友谈起这件往事，这个朋友若有所思地说：“你爸爸会不会是询问你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或是嘱咐你照顾好你妈妈呢？主席用手势比了个圆圈，这圆圈是不是合上你妈妈桂圆的圆字呢？”李敏听了，觉得这个解释有道理。可惜的是，当时李敏未能理解爸爸的良苦用心，没能满足他最后的愿望，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李敏觉得这又是自己一桩终身的憾事。

当时，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眼睛，李敏就退了出来。

这就是李敏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见。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离开人世的爸爸，输氧的罩子已经撤掉。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毛泽东去世了。李敏和孔令华要求为爸爸守灵，女儿为爸爸多守几次，实在是天经地义。李敏要求多守几天，但江青不同意，轻蔑地说：“让你守一次就够照顾了。”就这样，毛泽东的大女儿和女婿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群众

进入爸爸的灵堂，向亲爱的爸爸作最后的致意、诀别。

六、好，你不会再作河伯了 ——致李讷

(一) 下大雪了，你看见吗 (1951.1.4)

小李娃：

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

下大雪了，你看见吗？

爸爸

一月四日

李讷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8月生于延安。

在毛泽东的几个子女中，她是得爱最多的一个，是真正的红色公主。她在毛泽东身边呆的时间最长，毛泽东视她为掌上明珠，疼爱有加。

因为江青原名李云鹤，李讷随母姓。

李讷降生时，毛泽东已年近半百，毛岸英、毛岸青、娇娇都去了苏联，不在身边。他需要有个儿女留在身边，以抚慰过度操劳的心灵。由此，李讷没有送进儿童保育院，而是一直跟在毛泽东、江青身边。

毛泽东非常喜欢小女儿，工作之余经常逗着她玩，带她出去散步，给她讲故事，教她认字，教她懂礼貌，尊敬阿姨、叔叔们。

在战争环境，小李讷给父亲带去了无限的欢乐。

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由于环境险恶，李讷曾一度离开父亲身边。但毛泽东极其思念可爱的小女儿，所以环境稍好，父女又相聚了。

“娃娃，我的大娃娃，乖娃娃，爸爸可想坏你了！”毛泽东常常一见到李讷，便喊起来。他抱起李讷，举到空中，颠几下，又落下来，搂在怀里，拍打着后背，在小脸上亲一下，嘴里叫一声：“大娃！乖娃娃！”

李讷则搂着父亲的脖子，拍打着毛泽东的后颈，喊着：“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有时小李讷还给爸爸表演一段“打渔杀家”。毛泽东也喜爱京剧，有时也跟着哼几声。

毛泽东办公累了，常在院子里散步。他喜欢摆动两臂，扭着腰走。

这时，李讷也悄悄地跟在毛泽东身后，模仿着扭。

也有的时候，毛泽东只是背着两只手度着步，眉微蹙，在院子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这时，李讷便一声不响，也背着两只小手学父亲的样子迈大步。她腿短，追不上，就走几步跑几步。

有时毛泽东猛一回头，做个抓人的姿势，李讷便尖叫一声，格格笑着躲藏。毛泽东说：“你和我藏猫，学我，我早发现了呢。”李讷说：“早发现了么？我跟了爸爸好久呢。”毛泽东便装糊涂：“是吗？开始就跟你了，那我可没发现。”

李讷得意了，自信地说：“我知道，爸爸扭着腰走就是不想事，背着手走就是想事情呢。对不对？”毛泽东开心大笑，一把抱起女儿：“娃，我的好娃娃，你也学会观察哩，不简单哟！”

由于战争影响，李讷到六七岁还未能上学。但毛泽东对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成长，他选了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姑娘作保姆，教李讷读书识字。毛泽东在极度繁忙之余，也

教李讷认字。直到西柏坡以后，李讷才同十几个同龄儿童一起上学。

进北平后，江山初定，毛泽东把她送到育英小学去学习，插班读四年级。育英小学是专门为高干子弟及烈士子女设立的学校，要求很严格。1953年，李讷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从此住校，开始独立生活，周末才回到中南海的家中。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仍十分关怀女儿的成长。

但是李讷自幼身体不好，这又成了毛泽东的一桩心病。

对女儿的体质和心情，毛泽东一直用慈爱的目光关注着。即便不在一起，也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安慰和开导。

1951年元旦后，李讷又病了。1月4日，毛泽东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给李讷写了如上这封短信，信虽短，但关切之情甚殷，他告诉李讷，外面“下大雪了”，以解病中小女儿的愁闷。

1958年初，李讷得了急性盲肠炎，需要住院动手术。不巧的是，此时江青不在北京，去了广州。平时李讷看病等事都是她安排照料的，这次毛泽东亲自联系，由北京医院手术。几天来，毛泽东忙于工作，又时时关心着李讷的手术，精神非常疲倦。2月3日，他又通宵未寝，中午12点时，吃了几片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临睡前，仍不放心女儿，便给李讷写了一封信。

(二) 意志可以克服病情 (1958.2.3)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摇。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

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厉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
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这封信是毛泽东给女儿的信中最长的一封，字里行间，充满了作父亲的慈爱。一开始，毛泽东分析女儿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并以自己的经验告诉她：“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这里，毛泽东还打了着重号，为的是强调意志的作用，坚定女儿克服病情的决心。接着，替女儿分析病情，“你昨夜睡了九小时”，还“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中性血球也“已恢复正常”，总之，病情是“大有好转”，而且这结论还是医生们开会得出的，“不成问题，确有把握”，甚至“很着急”的妈妈现在也“放心了”。这些不厌其烦的嘱咐，意在打消女儿的担心。继之，作父亲的以古诗相慰，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的意志相勉。最后，毛泽东又像“哄”小孩子般地告诉女儿：“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这是何等地充满了人伦亲情的一封家书呵！

信中流露出无限温柔的父女亲情，李讷收到父亲这样的信，怎能不感动呢！信中3次提及“妈妈”，可见当时毛泽东和江青的感情还是很不错的。

1959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第一学期，面对大部头的历史著作，李讷感到有些压力，便写了一封信给远在杭州的父亲。其时，毛泽东正带着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研读政治经济学，收到女儿的信后，便抽空给女儿写了一封回信。

（三）由浅入深，慢慢积累（1959.12.30）

李讷：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父亲

十二月卅日上午六时

字里行间充满了毛泽东对爱女无微不至的关怀。一方面，毛泽东循循诱导读历史书籍的方法，“由浅入深”，另一方面强调要有决心，有恒心，日积月累，“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同时，鼓励女儿一定要树立信心。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李讷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北大在北京西郊，离家几十里，天黑才能回家。一个女孩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每到周末，卫士长李银桥便瞒着毛泽东派人开车去接。这事被毛泽东知道了，严厉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分辩道：“不然我也不接，天太黑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做一个断然的手势：“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回家？”李仍不服气：“别人的孩子敌特不感兴趣，你的孩子敌特就感兴趣。”可毛泽东仍不以为然：“感兴趣又怎么样？过去不是感兴趣吗？中国革命照样胜利。”把手一挥：“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车或搭

汽车回来。”

从此，李讷再也没有坐过公车上学回家，总是骑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往返于中南海和北大之间。

1960年因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李讷大病一场，全身浮肿，情绪十分低落。1961年，在家休学一年，尔后又北大继续她的学业。或者是因为休学的原因，学习压力比较大，甚至连给父亲写信的时间都没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回家，元旦也只是给父亲寄上一张贺年片。对此，毛泽东情感上有些受不了，便给女儿写了一信相询。

(四) 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 (1962. 1. 9)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用写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此时毛泽东已年近70，进入暮年，他渴望得到儿女之爱。这封家书情真意切，令人感动。这里，毛泽东把女儿不给他写信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

心，所以如此。”读来令人落泪。

收到父亲的信，李讷懂得了，已是暮年的父亲渴望得到女儿的理解和爱。她连忙回了父亲一信，向父亲敞开了心扉，诉说自己的烦恼和痛苦。

1963年新年伊始，李讷给父亲去信，痛陈自己的一些缺点，详细反映自己通过学习后的思想变化。她谈自己读了《庄子·秋水》后的感想，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

见女儿的认识提高了。毛泽东“喜慰无极”，马上寄信表示祝贺。

毛泽东以自己成长的阅历和经验，判断出女儿在人生成熟的道路上大进了一步，所以为女儿祝贺。信里，毛泽东告诉女儿：“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从此你就有希望了”。为什么说“有希望了”呢？因为你发现了自己的缺点，知道了自己的毛病，为此而忧伤，就为克服这些缺点提供了起码的前提。从此会走到缺点的反面，所以值得祝贺。

（五）接到你的信，喜慰无极（1963.1.4）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手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

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

这是 1963 年 1 月 4 日写的信，11 天后，收到女儿的信后，毛泽东又给女儿一信。

（六）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1963.1.15)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怠，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

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月十五日

这段时间，父女俩频频以通信的方式交心，使李讷在各方面，尤其是思想品德和作风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李讷一直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她受的教育和熏陶是常人所不可及的，李讷对自己的生活各方面也严格要求。但是，李讷是江青唯一的亲孩子，与李敏、岸青、邵华、思齐相比，她无疑地位独特，所以比较任性。红墙阻隔，李讷难于和同龄的平常人交往。家庭的特殊，她不能不处处注意影响，她真的“讷子言”。可以想象，以毛泽东之尊，江青之娇，李讷在北大是个极特殊的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李讷性情清高，较自负，也孤傲，不合群，但又有极大的优越感。毛泽东深知女儿的弱点，信中切嘱她要放下架子，“学人之长，克己之短”，要“合群，开朗”。平民出身的毛泽东深知这些高干子弟常有的缺点会影响女儿的成长，所以见女儿自觉意识到了，自然心里喜慰。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她同其中的大多数高干子弟一样穿上了令世人羡慕的绿军装。但由于身体欠佳，常常有病，她的职务实际上是挂名的。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极其特殊的背景，李讷进入了政治舞台，在政治斗争的峰谷中兀起、跌落。

1966年8月初，李讷化名“萧力”，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狂澜中，不久，她实际上成了解放军报社领导运动的灵魂和首脑，她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特殊的家庭环境中，不可能不犯错误，她也曾以二十五六的年纪，“为众所推”担任过《解放军报》

总编这样显要的职务，也担任过负有特殊使命的毛泽东的联络员。

李讷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向毛泽东反映了北京各大学红卫兵和造反派不断武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制止武斗起了积极作用。

1968年，李讷曾提出参加抗美援朝的要求。她对父亲说：“我这一生真平淡，何时可以马革裹尸啊！”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她的要求。

1970年前后，毛泽东为了锻炼李讷，让她去设在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

她当时已年届30，许多人都为她的婚姻大事操心。后来，她同北戴河管理处的一位服务员小徐相爱，并得到父亲的同意结婚时，毛泽东送给李讷的唯一纪念是全套马恩全集。

可惜两人的差距太大了，李讷的学识和经历，非一般男人所能理解，当李讷和小徐有了一个孩子后，两人离了婚。

1975年前后，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但由于李讷婚姻受挫，精神不佳，毛泽东选择了侄儿毛远新，而不是李讷作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也许这也是李讷没有像毛远新那样卷进“四人帮”的阴谋中的一个原因。

1976年10月以后，李讷和普通的中国公民一样平静地生活。

她曾和普通市民一样用平板车运回按人定量供应的大白菜；和一般市民一样住在普通的单元楼内；和普通人员一样排队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父亲的遗容；也像犯人的一般家属一样去探视在秦城监狱服刑的母亲……

70年代后期，因为父亲的去世，母亲的服刑，婚姻的不幸，

身体的多病，李讷生活孤寂，心境悲凉，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通过曾担任过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的介绍，1984年李讷和昆明军区某军分区的参谋长王景清结婚。

王景清和李讷的婚姻，得到了许多熟悉他们的老同志的赞扬。许多同志夸奖王景清找了一个好妻子，李讷找了一个好丈夫。他们和大多数中国普通家庭一样，互敬互爱，平平静静地生活着。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曾是李讷的朋友，但随着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倒下，她们的友谊也就中断了。关于近十几年的李讷，陶斯亮说：她“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当我听到这些情况后，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就应该这样，挺好！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父亲所期望于她的吗？”

七、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致江青

(一) 只收集资料，不发表意见 (1950.1.4)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毛泽东的诸亲友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数百件。

这是本书选编的毛泽东在建国后致江青的第一封信。

毛泽东写这封信时，正在苏联访问。

这期间，国内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处理，毛泽东都是以电报

回复的。自然，关于江青要求到新解放区看一看的回复，也是通过电报发回的。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待江青的态度和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表示“同意”，是因为可以收集社会情况，但随即提出三条限制：（1）“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规定“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2）必须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的同意；（3）到新区后，“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且不能给当地党政带来“麻烦”。最后，毛泽东又统括一句：“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江青自1938年秋与毛泽东结婚以来，基本不涉政事。现在，全国刚刚解放，江青便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那么，这个“看一看”是否包涵了其它的要求？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来电报，与江青来了个“约法三章”。

江青原名李云鹤，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1928年江青入济南的一个戏班学戏，次年进入山东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0年底她在济南同一个姓费的商人的儿子结婚，这个婚姻只持续了几个月。离婚后，江青来到青岛，在那里结识了俞启威，1931年即同俞结婚。俞启威是中共党员，1933年被捕，江青与他的婚姻关系也随之结束。此时，江青也加入了党组织，又独身来到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10月被捕。出狱后，江青跻身话剧和电影界，因扮演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开始出名，后来又在影片《狼山喋血记》、《王老五》，话剧《雷雨》中有较出色的表演，在上海滩成为小有名气的电影、话剧演员。这期间，她又结识了评论家兼编剧的唐纳，1936年与之结婚。此后江青在上海滩掀起过几次情海风波，闹得唐纳死去

活来，几度自杀，自杀前还给江青留下长长的绝命书，一时闹得满城风雨。

江青呢？一方面，唐纳为她多次自杀，舆论沸沸扬扬，而她又“爱上了别人”（这是江青公开信中的话。这个“别人”，是话剧导演章泯。由于江青的插足，章泯的家庭破裂了），在许多人眼里自然是一个绝情无义、水性杨花的女人；再说，由于她生性持强好胜，不知谦让，在上海文艺界也没有多少朋友，当时她的心情自然是很坏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江青便离开上海滩，只身投奔延安而去……她抛弃了蓝苹这个艺名，改名为江青。江青投奔延安这一举动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江青到底以何种途径结识毛泽东的，现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说康生介绍的，有说是徐明清带她去见毛泽东的，有说是江青在延安演戏，扮相出色，引起了毛泽东注意的，也有说是毛泽东给来延安的青年作报告，江青故意表现突出，引起毛泽东注意的。

对于这一点，现在似乎没有花费力气考证的必要，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不早不晚，恰在毛泽东和第二个夫人贺子珍发生矛盾，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并夺走了贺子珍的丈夫。

江青和毛泽东相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调到那里任戏剧教师。

1938年8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江青终于来到毛泽东身边。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此举居然对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产生了绝大的影响。

这时，江青进入延安刚好一年。

现在再说那个“约法三章”。

流传很广，说有者众，怀疑者也大有人在。笔者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认为它确实存在。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正式离婚。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反对者大有人在。

其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张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跟谁结婚，纯属他毛泽东个人的私事。爱情不等于干部任免，不能以组织手段处理，领袖也是人，是人就有他个人的选择，特别是感情方面的选择，因而他人没有理由和必要加以干涉。

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中共中央专门开会研究过。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 50 年代和他极为要好的朋友周世钊曾经有过明确的叙述：

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

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鉴于对江青个人品质的担忧，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作出几条规定，以便明确江青在党内的地位。

《江青前传》（崔万秋著）称：国民党军队 1947 年进入延安时，曾获得王若飞的一个笔记本，其中记录下“约法三章”的内容：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 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王若飞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完全可能的。

既然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和江青结婚，1938 年 11 月 20 日，24 岁的江青终于和 45 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以后，20 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没有“参政”，也没有很多的“出头露面”。实事求是地说，这期间，江青对于毛泽东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

毛泽东是否对江青倾注过爱心，国内出版的众多著作都避而不谈。

其实，稍加思索，便不难了解。

当时贺子珍已离开延安，毛泽东身边没人照顾，作为有世界影响的党的领袖，自不免感到种种不便；况且江青当时年仅花信，容貌娇好，又有演戏才能，且一副进步青年态，自然惹人喜欢。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自1947年起跟随毛泽东15年）回忆道：

“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导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我们的党也不会同意自己的领袖同一个坏透了的女人结婚。所以说，江青是后来变坏，发生转变，而不是生来就坏透了的女人。

“那时的江青，是有某些吸引人的地方。

“年轻的时候江青长的比较漂亮。皮肤白皙，两眼有神。她很会打扮，带着大城市熏陶出来的一种潇洒落拓的风度。开始梳着辫子，后来将辫子在脑后盘个髻。她身材苗条，夏天喜欢穿列宁装，冬天穿棉军装，但是腰线总是清清楚楚地显出来。她常常会帮助工作人员理发梳头，经她梳理打扮之后，人会精神漂亮几分。

“她写正楷字写得好，也会写文章。毛泽东夸奖过她的字。李讷练字，毛泽东说：‘我的字不行，她妈妈的字好，叫她妈妈写字帖，照她妈妈的字练。’李讷就是以江青的字为帖，练出一笔好字。现在李讷的书法也是比较出色的。

“她骑马骑得好。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是性子凶的马她越喜欢。转战陕北时她骑的那匹大青马，就是贺老总在延安送

的，性子很烈，她驯出来了。她骑马喜欢披一斗蓬，奔驰起来呼拉拉作响，威风飒爽。

“她唱戏唱得还可以。现在文章都说她是三流演员。三流也罢，四流也罢，她在上海舞台上演过主角的，在电影中也扮演主角。电影未能放映是由于国民党的查禁。报纸上也少登她的照片文章。她到延安后，在延安还可以说得上是明星。现在一些文艺界名人，当年在延安并不比她名气大多少。她教会李讷唱戏，行军之余，为毛泽东和指战员们唱一曲，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享受。

“她的针线活好，李讷的衣服、裙子、布拉吉是她自己设计制做的，做的很漂亮。

“她有时候意志还算可以。在延安坚持下来了，转战陕北只有她一个女人，也坚持下来了。……”

应该说李银桥的这一说法是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从这些方面看，当时的江青确实有可爱之处。毛泽东爱上她也是有理由的。

但江青确是一个思想意识和作风很糟的女人。她虚荣心极强，爱出风头，心地狭窄，报复心重，极为自私，脾气暴躁，且喜怒无常。毛泽东把她的这些毛病，都归纳为“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作风”。其实，何止小资产阶级作风，是十足的资产阶级作风，还兼有封建阶级味道。

最初，为了讨毛泽东喜欢，这些毛病，她都力图加以掩饰。但结婚以后，这些毛病一个个暴露出来。这一切令毛泽东大伤脑筋，大失所望，甚至大发脾气。这是后事。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很注意分寸，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谛克，判若二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中间，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贺子珍那样具有革命资历的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婚后，江青除了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外，也担任过一些很不起眼的职务，这些职务都和她的演员经历有关，算不得从政。她担任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的指导员，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理事，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

1946年7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一架留声机送给毛泽东。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在客人面前，江青很注意身份。她绝少参加毛泽东和战友之间的谈话。来了客人，她微笑着点个头，或递枝烟，或倒杯茶，或送上一盘花生米，然后就走开，回到自己的卧室。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一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的印象时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1940年，江青生下李讷。

李讷的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欢慰的笑声，江青的“第一夫人”地位，也就更加巩固。

此后，江青日益得意起来，开始变娇变骄，动不动呵斥身边的小保姆，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干这干那。

她喜欢骑马招摇过市。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是主席的新夫人。”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噢，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在陕北，她一直称毛泽东为“老板”。个性倔强的她，不断和“老板”发生口角。

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江青一直跟随毛泽东，这成为她的一点资本。日后，她曾得意地说，解放战争期间，跟随主席转战陕北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尽管这并不符合实际，她还是这样的自我夸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毛泽东赴苏联访问。

在这个时候，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并打电报到莫斯科请示毛泽东。应该说这个要求很正常，毛泽东便予以同意。

这就出现了上面毛泽东给她的回信。

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江青按毛泽东的要求，取得了刘少奇的同意和廖鲁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区，而且确实没有给当地党政领导人带来什么“麻烦”。

在这以后的一些年月里，江青同样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活动，她只是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据毛泽东韶山和棠佳阁一些乡下亲戚回忆，在那段日子，他们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家所见到的江青，也还是一位没有什么“架子”的主妇，只要她在家也总是出来和乡亲们打个招呼，甚至亲自下厨弄几个菜招待乡下亲戚。毛泽连、毛泽嵘、文东仙、邹普勋、陈国生、文运昌、文涧泉等人，都先后吃过由江青掌勺作出的饭菜。

1966年5月，给中国造成严重破坏、混乱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时，人们才大吃一惊：江青已经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新星”，其权力之重，地位之显赫，连一向对政治并不敏感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在动乱的十年里，她成为中国政坛上一个极为特殊、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1965年秋冬之际起，到1966年7月18日，半年多的时间，毛泽东除了偶尔的外事活动外，其余时间都在外地渡过。杭州、上海、长沙、韶山、武汉，毛泽东这半年中都涉足过。他在南方策划了一场对中国影响至为严重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台风。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初起，在“滴水洞”里深思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极不寻常的信。

(二)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1966.7.8)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编者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十山洞（编者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编者注：指武汉），又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讲话（编者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政变”和“天才”问题的长篇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编者注：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

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编者注：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编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

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吧？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话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罢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

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

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

这是一封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也可说是“文化大革命”又一纲领性文件。

写此信的时间是在1966年6月16日至27日之间，但只是一个草稿，还不准备发出。6月28日毛泽东到达武汉，次日收到江青从上海发来的信以后，毛泽东几经思索，把信稿加以修改，于7月8日发给江青。

毛泽东此信，纵论20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一切写在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这封信里，毛泽东的所思、所虑、所阐发的感慨，无一不是严肃得可以听见枪炮声的问题。毛泽东向江青全面敞开心扉，将“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的话，都无任何保留地告诉了她。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下？因为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的太过分。

毛泽东同意了。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已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在林彪阅过此信后，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不过，保留了一份抄件。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集团罪行，此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

毛泽东选择在“九·一三”事件后公布“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给江青的信，是有其特别用心的，是在极为难堪的处境中用以证明毛泽东始终是“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英明领袖，从而继续维护个人崇拜，尽可能缩小“九·一三”事件给现代造神运动带来的消极作用，企图维持客观上宣告破产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主要倚重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即枪杆子和笔杆子，特别是林彪集团。林彪集团的主要干将在中共九大时都进了政治局，林彪又被作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

和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党章。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

林彪所以受到毛泽东如此高度的信用，是和林彪狂热地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等等现代造神运动的狂风，吹遍了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

但就是这样——一个对毛泽东崇拜得似乎五体投地的林彪，在被尊为“副统帅”、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以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企图抢班夺权，并极为凶残地企图以杀害毛泽东来达到其罪恶目的。

正如当时中央文件中所说，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险的两面派、野心家。

1971 年“九·一三”林彪的自我爆炸，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图谋杀害毛泽东，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出国；林彪集团中的 6 名新政治局委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竟然一同跟随林彪从事阴谋活动。这些具有极大讽刺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推翻了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了极为反常的情况，会出现如此惊心动魄的后果吗？个人崇拜的狂热鼓吹者，不是包藏着最险恶的用心吗？“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究竟是不是所谓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有没有合理性？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达到天下大治？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究竟是来自所谓的“走资派”还是

来自林彪这一类两面派、阴谋家和野心家？“文化大革命”究竟能否给中国人民带来利益和希望？

“九·一三”事件促使广大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清醒。毛泽东本人也陷入极大的痛苦、失望和极为难堪的境地，既要维护英明领袖“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形象，又无法逃避错看了林彪、受林彪欺骗的现实。这以后，毛泽东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精神状态也非常不佳。

可惜，毛泽东并没有利用“九·一三”事件提供的机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反而仍然固执地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为此，毛泽东势必产生一种强烈欲望，在深入揭批林彪集团的同时，还须尽可能地缩小和消除“九·一三”事件给“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用当时毛泽东的话说：“要消消毒”。

这就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国公布 1966 年 7 月 8 日给江青信的背景。

读了上信，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毛泽东是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当时不得不违心地赞同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只好违心地当了 20 世纪 60 年代“共产党的钟馗”了。他对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狂热的目的，早有察觉，并未被林彪“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所蒙蔽。不能因为“九·一三”事件动摇对领袖的崇敬和信赖。

而且，林彪的得势，是和制造个人崇拜的狂热紧紧联在一起的。没有个人崇拜就没有林彪的擢升。现在，为了揭批林彪集团的目的，也需要对个人崇拜降温。此时公布这封信，也有助于起到降温的作用。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从这封信里人们会强烈感到当时毛泽东

对江青的高度信任。信里，毛泽东几乎没有任何保留地把“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以及每隔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长远战略部署，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江青。

显然，这样高度机密的话，是不能随便向不信任的人讲的。

当时，毛泽东为何如此信任江青？显然不是由于夫妻关系，而是彼此政治观点上的相通。或者说，是江青迎合了毛泽东晚年“左”的严重失误。

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随着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她便跃跃欲试，企图染指政治。

她从文化领域入手，不断搜寻突击的方向，迎合毛泽东“左”的胃口，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从新中国刚刚成立起，便掀起一次次的政治批判风浪。

她特别把京剧改革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

她的最初尝试，便是批判1951年上演的电影《清宫秘史》。

她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她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后来并曾用此作为打击刘少奇的武器，因为江青硬说刘少奇曾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但江青的打算，被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胡乔木所否定。

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在另一部电影《武训传》上大作文章，展开了火力猛烈的批判。这一次她得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武训，清东山东堂邑人。家境贫穷，幼年丧父丧母，给地主当长工，因不识字受地主的愚弄欺骗，立下了行乞兴学的志向。后用乞讨方式积下了一笔钱，办了小学，吸收穷孩子就读，因

而，受到清政府嘉奖。

教育家陶行知赞赏武训精神，建议电影编导孙瑜拍武训传。

194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开拍《武训传》，孙瑜导演，赵丹饰武训。

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上海昆仑影片公司续拍此片，1950年12月完成，1951年初上映。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对《武训传》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批判。为支持江青，毛泽东特为《人民日报》写了批《武训传》的社论。

于是，编者、演员、称赞过影片者都受到了冲击，最初提议拍《武训传》的陶行知，也因为“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而被批判。

这是新中国文艺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在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中，江青初“露峥嵘”。

1954年，由江青发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批判运动，给俞平伯扣上了“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大帽子。

对俞平伯的批判，以雷霆万钧之力、震撼着中国的知识界，开了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其是非最后由党来裁决的恶例。

此后，由俞平伯又牵涉到了胡适，全国又掀起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这几次批判，是江青参与政治的尝试。

1963年，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绝诗：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即江青，还在批《武训传》时，江青就化名李进，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团”。那次调查，以先有结论后找材料的法子，给武训带上了“大地主、大流氓、大债主”几顶帽子。

这首诗的公开发表，已预示江青将要堂堂正正地登上政治舞台了。

1962年9月，她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4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时候，她听到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这与她不谋而合，于是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把柯庆施找来，而柯庆施则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长张春桥。

“我支持‘大写十三的’！”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于是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江青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如今，人们一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却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

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观看了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认为它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大毒草”，决定组织第二篇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于是便有了经过毛泽东赞许，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泡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从而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时间是1965年11月10日。

紧接着，江青又亲自泡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杀气腾腾地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作了十几处重要修改，于1964年4月1日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

《纪要》成了江青“出山”的宣言书，预示她即将担任要职！一场祸国殃民的政治大风暴，马上就要来临！

因为这一时期江青和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如此相通，所以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从这封极不寻常的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显然把江青看做“第一知己”，否则，就无法理解“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的“黑话”，只能对她一个人说。

以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左”的观点，急剧升级，在打倒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以后，决心发动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揪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为此，毛泽东决定首先起草一份“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

件。毛泽东指定了起草的组成人员，其中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等 10 人，以陈伯达为组长。

1966 年 4 月 16 日，起草小组成员聚合于上海锦江饭店。由于一开始陈伯达、康生就奉毛泽东之召去了杭州，所以起草工作由江青主持。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送回上海。尽管整个文件起草期间，陈伯达、康生都在毛泽东那里，但毛泽东修改的地方，他们这两位“大秀才”也不知道。

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才从杭州匆匆赶回参加。所以，整个文件的起草自始至终是由江青亲自挂帅。

这个文件就是读了让人惊心动魄的《五·一六通知》。它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这一天，1966 年 5 月 16 日，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日子。

江青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试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地位。

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 长：陈伯达

顾 问：康 生

副组长：江青 王任重 刘志坚 张春桥

……

在副组长中，江青排名第一。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事实上，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不论江青是否代理组长一职，陈伯达都事事退让三分，江青一直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实际上的组长。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这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100余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

1967年2月以后，“中央文革”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或通告，往往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俨然成了中国4个最高领导机构之一，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了。于是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中南海、毛家湾（林彪宅）便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因此，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名义上只是那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

1968年10月，“中央文革”又扩充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5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进来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12人。“碰头会”虽然由周恩来主持，但在“左派”们的包围中，他根本无法实行自己的正确主

张。

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除了前面提到“中央文革”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布指示，通告、决定外，自1968年1月起，凡新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书。可见“中央文革”权力之大。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江青就是凭借手中的权力，肆虐了10年，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三) 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1974.3.20)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大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年三月二十日

把此信和上信相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前后真有

天壤之别。

从1966年7月8日极不寻常的长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给予充分的信任，无保留地向她敞开了心扉，说明他们夫妻关系处于感情融洽的良好时期。由于毛泽东的信任，江青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高峰，成为中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这封信里，毛泽东对江青已十分厌烦，连面都不愿见了，干脆将她拒之门外。

态度何以发生如此出人意料的变化？

这其中的诸因素，说来非常复杂。江青在十年动乱中政治野心极度膨胀，飞扬跋扈、横行无忌、祸国殃民的罪行罄竹难书，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物。她心地狭隘，报复心极强，浅薄无知而又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任性，喜欢自吹自擂，说起话来没遮没挡，吹起牛来没完没了，这些都不能不令毛泽东深感失望。她又经常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胡作非为，以致毛泽东不得不申明“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

特别是中共十大以后，江青的地位得到加强，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处心积虑地想窃取最高权力，这使考虑任何问题都是从全国人民利益出发的毛泽东不能不有所忧虑。他深知如果由江青来掌握国家政权将会出现怎样的恶果，因此，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必须对江青加以遏制。

况且，这时江青对毛泽东的感情已很淡薄，对毛泽东的病情，也不关心，这不能不令毛泽东伤心。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张玉凤回忆道：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人

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泽东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苦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江青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帽子。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的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后的一些天，突然休克！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还回忆起1973年江青向毛泽东要钱的情景。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里拨给她3万元。江青走后，毛泽东流着眼泪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便与江青分居。毛泽东住中南海（不过已不是丰泽园，而是被称为“游泳池”的地方），

江青住钓鱼台。一分便是 10 年，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开始，据毛泽东说，是“为了避嫌”。但后来，江青的种种劣迹，令毛泽东十分反感，分居就不再是“避嫌”，而赋予了它实实在在的意义。

于是出现了 1974 年 3 月 20 日毛泽东拒不会见江青的情景。

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凡江青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许可，方能见面。

那一天，通报之后，江青即在毛泽东居处最外面的那道铁门外边等候。过了好一会儿，工作人员返回，给江青送来了载于前面的信。

没过几天，政治局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的人选问题。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派邓小平去。江青坚决反对。

毛泽东得知开会的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下面的信。

(四) 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1974.3.27)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信里，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警告江青要“小心”！“不要反对我的意见”！这无疑对江青是一声棒喝。

重新起用邓小平，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项重大而英明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并于1969年10月下旬发往江西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那时邓小平已65岁，住在原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座小院子里。

在那里，每日上午，要去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走出一条“邓小平之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林彪的倒台，给“左”派们沉重地一击。

邓小平是坐在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中间听了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传达的。回到那个小院后，邓小平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九·一三”事件是一个重大转机。毛泽东不能不重新思考许多重大问题。

1972年1月10日的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提及邓小平，说他“人才难得”，“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以锐敏的眼光注意到这一重要信息。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那座小院子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

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是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重要信号。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结束了3年零4个月的“流放”生活，回到北京。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这是他在销声匿迹了近7年之后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公开亮相。这件事令全国、全世界为之震惊，成为这天晚上在北京的外国记者抢发的头条重大新闻。

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主席台上，人们又见到了邓小平沉稳的身影。随即，邓小平当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

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这些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就这样，毛泽东成了邓小平最有力的支持者。在政治局讨论派谁去联合国参加大会时，毛泽东权衡再三，提出了邓小平。江青自不量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唱反调，毛泽东不得不写信予以警告。

于是，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指示：“谁当第一副总理？邓。”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人选做安排。

7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形势的发展，显然对江青一伙十分不利。特别是江青，她认为四届人大是一次重要机会，是实现“女皇梦”的一步重要台阶，必须抢到组阁权力。

于是，江青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达到由她组阁的目的。

一是借古喻今，制造舆论。

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10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若把刘邦、吕后、晁错、张汤、桑弘羊分别换成毛泽东、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二是借机发难，企图搞臭对手。

1974年10月17日晚，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攻击邓小平，企图抢到组阁权力。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1974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做了许多文章。

10月13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

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的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不理。

江青厉声追问：“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极为义愤，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的气息。”

三是恶人先告状。

当日晚，四人帮在钓鱼台 17 号楼密谋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以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第二天，背着周恩来和政治局，王洪文奉命急飞长沙。在毛泽东面前，诬称“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特别攻击了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

结果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四是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公开要组阁的权力。江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她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王洪文作委员长，张春桥当总理，她自己当党的主席，她的亲信党羽则分占各路要津。

对于江青的这封来信，毛泽东作了如下回答。

(五) 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1974.11.12)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由于毛泽东不动摇地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江青的组阁阴谋完全失败。

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面见毛泽东。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的“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江青不甘心就此罢休，11月29日，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权力：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个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一天，毛泽东就复一短函，拒绝了江青的要求。

(六)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 (1974.11.20)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囑。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在这封短信里，毛泽东明确指出，江青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动态，这就意味着警告她不要插手别的工作，可以说是对江青的一种明确的限制。

从1974年3月到1975年夏，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毛泽东对江青作过多次严厉的批评。

197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警告江青，不要形成“四人小宗派”。

这之前，毛泽东给江青留面子，只在信中批评她。这次，毛泽东毫不留情面了，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了江青。

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看得出，江青说这话是极不情愿的，而且还包含着一种不满，不仅对毛，而且对邓。邓小平这个人，表面上话不多，但硬得很，在她面前很少退让。难怪毛泽东说他“内部是钢铁公司”。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跟一句道。

“说了算！”江青也紧跟着回答。

“孔老二讲，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不开就好。”

夫妇二人展开了对话。

钢铁工厂不开了，至于帽子店，江青说：

“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

其实，江青完全知道拍这部电影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是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江青的真正用意不是批这个外国人，而是要打击周恩来。现在她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很明显一是向毛泽东告状，二是说给在座的周恩来听。

“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接着说了一句。

其他人都不说话。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从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有几个人的气色很不好，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毛泽东今天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一邓体制”。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疗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内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批示：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的政治局会议。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最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

恩来说道：“人家快一年没见到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7月17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上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已“阔别”10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编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编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

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 200 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象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所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27日、6月3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

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了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廿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

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28/6 1975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但过了不久，对于江青来说，居然又出现了“柳暗花明”。

其原因，就是毛泽东又改变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和支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魄力，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并且迅速收到成效。

全国人民从长期的混乱中看到了希望，人心大振。

但是，全面的整顿，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纠正，这就必然呈现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向。

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视为自己一生的两大业绩之一，不容许对它的任何否定。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被毛泽东视为“右倾翻案”。

毛泽东决定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11月，华国锋受毛泽东指示，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议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以此为发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展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江青狂喜，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斗争到底！”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为“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

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转好弯子”。

他说：

“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

“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从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

邓小平又一次被打下去，江青们笑了。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1976年3月2日，召集12省、区负责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编者按：指江青），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师，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

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我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 75 年 1 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

已经持续近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激起广大下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邓小平的整顿，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来，他又被打了下去。人民的希望破灭了。

人民群众强烈的怒火，终于在 1976 年清明节前后象火一样地爆发出来。人们把它称为“四五运动”。

这场群众运动，实质是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

它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可惜，毛泽东又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他根据“四人帮”、毛远新歪曲的报告，把四五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并作出了武力镇压的决定。

在武力镇压群众抗议运动的同时，4月7日毛泽东还作了两项决定：

一是关于任命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二是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这个决议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邓小平又一次悲壮而不屈地下台了。天安门为中心的群众抗议怒火也似乎被熄灭了。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智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

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样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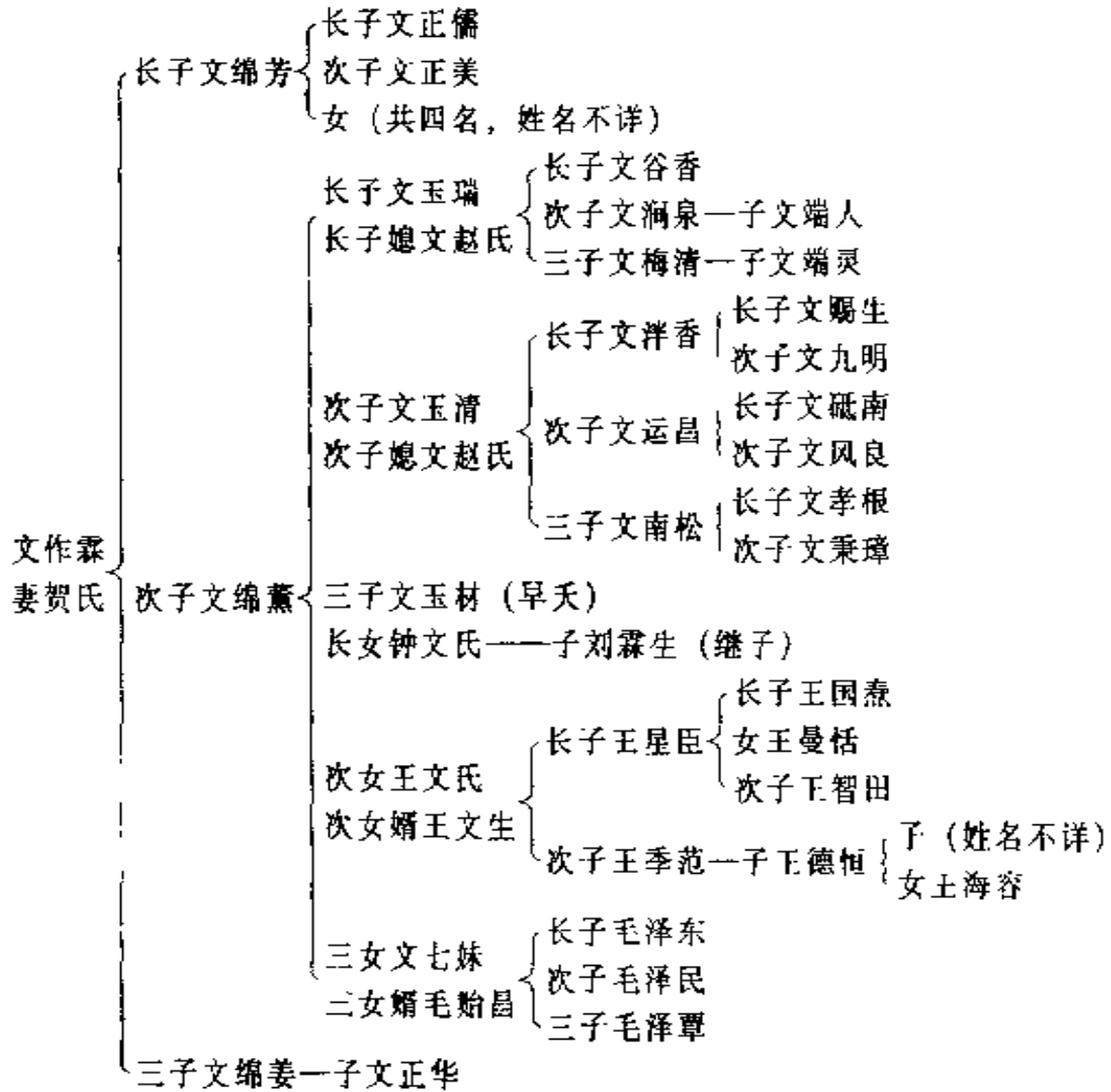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咐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以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从这个临终嘱咐式的谈话来看，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又恢复了对江青的信任。

但是，自1973年以来，毛泽东对江青的多次严厉批评，毕竟为华国锋、叶剑英等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维持国家的稳定和彻底粉碎江青集团的帮派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在个人崇拜和长期“左”的观念还严重束缚着人们头脑的那段时间里，毛泽东为华国锋、叶剑英提供的这些武器，是别的武器不能替代的。

文作霖（毛泽东外曾祖父） 直系、旁系亲属世系图



一、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 ——致文玉瑞、文玉清

(一) 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 (1918.8)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愈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毛泽东这封信称的七舅、八舅，是指文玉瑞、文玉清。这是按文氏家族的排行称呼的，按毛泽东的外祖父文绵薰所生子辈称呼，文玉瑞是毛泽东的大舅，文玉清是毛泽东的二舅。

此信无日期，但根据信中所言并结合其它有关毛泽东的早期生平资料断定，这封信当写于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

年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之前。

从这封信看，毛泽东对唐家托舅父家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乡中有句俗话，“父亲叔大，娘亲舅大”。在毛泽东心中，舅家是最亲的人。因为毛泽东从小就是在舅舅家长大的。

毛泽东的外祖家，世居湘乡县大坪乡唐家托，距韶山冲仅10多里。毛泽东的母亲名叫文七妹。斯诺在《西行漫记》记作“文其美”，是根据“七妹”的音误记。实际上，“七妹”也不是她的名字，只是按家族排行的习惯称呼罢了。在封建礼教的阴雾下，她没有正式的名字。

毛泽东的外曾祖母贺氏是一位非常精细、能干又极能吃苦的女性。她14岁嫁到文家时，婆婆已经谢世，家务就全靠她一人辛苦维持。丈夫文作霖（即毛泽东的外曾祖父）是一位纯朴的农民，家里很穷，没有田产，小两口靠租种人家几亩薄田，“先鸡鸣而起，后斗转而休”，勉强维持生计。5年后，公公去世。又过了五六年，由于不堪生活的重压，文作霖也不幸病故，年仅27岁。这一年，是公历1797年，距毛泽东出生还有近百年的时间。其时，毛泽东的外祖父文绵薰才3岁。

年轻丧夫，这是人生的一大不幸，然而，贺氏并没有被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和落在身上的重担压垮。她精明能干，勤俭持家，节衣缩食到了几近苛刻的程度。她仍艰难地佃种着原来的那几亩薄田，并先让10岁的大儿子替人家放牛，每年只图攒得几担谷的收入。大儿子稍大以后，她就安排他改打月工，让二儿子接替大儿子看牛。后来三儿子也大了，便让他接替二儿子的活儿，又让二儿子打月工，大儿子做长工。在3个儿子都年轻力壮后，她便安排他们佃田耕作，每年竟也有30多担稻谷的血汗收入。

贺氏的节俭持家传遍戚里，遐迩闻名。她深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绝不浪费每一粒粮食，规定家里每天只准吃两顿饭，从来不吃晚饭，并且，在农闲季节，只能吃上一顿硬饭，一顿只喝稀饭。

就是靠这样的辛勤劳作和节衣缩食，文家日积月累，后来居然购得些田地，并买下了唐家坵房屋一栋，家境渐渐殷实起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毛泽东外祖父这一代，文家已经发展成有20多口人，拥有房屋90多间，田地140亩的大户人家。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于清同治六年正月初八（1867年2月12日）在湘乡唐家坵降生。

毛泽东的外祖文绵薰，字芝仪，系文作霖次子，生于1821年，卒于1888年。生有子、女各3，长子文玉瑞（1853—1921）排行第七，次子文玉清（1859—1929）排行第八，三子文玉材（夭亡）。长女适钟，次女适王，三女适毛，即韶山冲的毛顺生。

毛泽东出生前，文氏生过两个孩子，都夭亡了。当毛泽东1893年降生时，文氏已经26岁。她生怕毛泽东又像前两个孩子一样养不大，所以毛泽东满月之后，文氏抱着毛泽东回到了外婆家，以为外婆家儿女众多福气大，可托其福、沾其佻，使儿子容易养活成人。

外婆自然把小外孙看得十分宝贵。为了外孙平安长大，她将毛泽东寄拜其七舅文玉瑞为干爹。距离唐家坵约一公里远的龙潭坵山脚下，有一块拔地而起的天然巨石，石高两丈八，宽一丈余。石后，有一股终年不涸、长流不断的泉水从山洞中潺潺流出。

据传说，曾有一条作恶多端的妖龙卧于洞中，它经常兴风作

浪，淹没良田，为害乡民。为了使妖龙“安分守己”，不兴风作浪，人们除了每年杀猪宰羊供祭之外，还在石头上修建庙宇立“杨四将军”，以镇妖孽。从此，妖龙不再作祟，人们将这块巨石称为“神石”，远近的善男信女纷纷前往敬香朝拜。

深信“八字”和命运的毛泽东之外婆、母亲，自然看中了这块“神石”，决定让毛泽东拜其为“干娘”。因为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名之曰：“石三”。

此后，一直到毛泽东离开韶山之前，都管他叫“石三伢子”，而不叫他毛泽东。

毛泽东由于喜欢石头坚硬的性格，自然喜欢“石三伢子”这个乳名。

1923年9月，他在写给在广州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特意指出：“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51年2月的一天，彭大将军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同是两块石头。”彭德怀觉得自己不能同主席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于是谦虚地说：“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

毛泽东接过话头强调：“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扔向麦克阿瑟。”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宾馆松山餐厅与父老乡亲共进晚餐时，还诙谐地说：“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只有我的石头干娘还没有来，是不是等一等。”

文玉瑞是一位非常忠厚的农民，在乡中颇有些人望。他教育子女严格，对七妹的孩子毛泽东更是关怀和器重，视若己出。他

还将毛泽东与文家的子侄们并行排列，毛泽东为廿二。

在文家，二舅文玉清对毛泽东的成长也极为关注。文玉清是一位性格温和的乡中儒士，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子侄。文玉清养有3子，长子文泮香、次子文运昌、三子文南松，家中人口已是不少，但对毛泽东仍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文玉清开蒙馆为业，毛泽东也随众童受业。舅父督其习字读书，要求很严。聪颖的毛泽东跟随舅父读了不少古文，很多篇课文都能背得下来，其天赋出于众童之上，深得舅父喜爱。毛泽东在舅父家呆到8岁，直到1902年，才回到韶山冲。但只要有空，他都会去唐家坨看望外婆、舅父舅母。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文家度过的，所以至今唐家坨留下了很多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兹举一例，可见其聪慧出众之处——

有一天，毛泽东在外婆家同一些伙伴去放牛，割草。

一位先生模样的田梗主人给他们出了一个谜语：“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似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小伙伴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猜了起来：“是唐刀石”，“是铁钉”，“是豆腐”……然而，那位先生却连连摇头说“都不对。”

毛泽东却从容地说：“我猜着了，是邹家冲石灰窑里烧成的东西——石灰。”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那位先生连连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说：“不错，不错，还是文家的外孙聪明些。”

毛泽东得到了外婆家的长辈们的关怀和温暖，特别是文玉瑞、文玉清两个舅舅，更是倾尽了心血。说服毛顺生同意毛泽东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也全靠了两位舅父。他们还常接济毛泽东的学费。因此，外祖家给毛泽东留下极深的印象，终生难忘。

对二位舅父，他非常的尊敬。

毛泽东给舅父写此信时，是他即将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前夕。这一年，他联合了校内外一些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立志改造社会，改造国家。8月，他准备欢送一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前往北京，并和他们一起北上。这便是信中所言“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

此时，毛泽东的母亲患病在唐家托疗养。即将远行，远离故乡，母亲的病久治不愈，而游子在外，无以尽孝，全靠了二位舅父的照料，毛泽东心中对于舅父是十分感激。怀着这样的心情，他给两位舅舅写了上面的信。

毛泽东是个讲究孝道的人，他爱他的母亲，而今她病倒了，作为儿子，却又要远她而去，他心里真是万分的惦念呵。“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毛泽东虽在长沙，也到处求医问药，希望能减轻母亲的病苦。毛泽东还谈了下一步打算，“如尚不愈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

毛泽东将这信寄走不久，于8月15日与张昆弟、罗学瓚、罗章龙、李维汉等24名青年，离开湖南前往北京。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这座北方名城。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虽是个被人瞧不起且薪水每月只有8元钱的职业，但它解决了毛泽东必须的生活费用问题。而且通过管理和阅读报纸，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也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

转眼到了第二年。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人办好了出国手续，便离京南下，取道上海，准备乘船驰往欧洲。毛泽东也随这批人于3月14日来到上海。到上海的第二天即参加了中国学生会组

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29日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

毛泽东组织了一大批青年出国，自己却留在国内，这是为什么？过去流行的说法是青年毛泽东认为自己对国内状况了解得不够，应该把主要精力用来研究本国问题。这应该说符合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从毛泽东一生来看，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国内问题，因此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极深刻的研究和极精辟的结论，也才能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是还有一个人人们忽视的原因。我们只要读一读这时期毛泽东写给舅舅的另一封信就知道了。

信文于后：

(二) 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 (1919.4.28)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曝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痲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

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
旬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
药，未尝废离，足纾履念。肃颂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朱另。

愚甥 毛泽东 稟

四月二十八

从这封信可知，毛泽东没有和这些青年人一同去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母亲的病势。“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亲侍汤药，未尝废离”。作为长子，母亲病成那个样子，在慈母面前尽孝道，乃是人之常情。何况，在家中，许多方面毛泽东都和母亲心心相印，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母亲。毛泽东和斯诺谈话中就说过，少年时代，他的家庭分成两派，母亲和他及弟弟们是一派，父亲是一派。当然这并非说的政治派别，而是对家庭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态度。

这信和前一信，对母亲的病，用了大部分篇幅去叙述。前一信，对二位舅父照顾母亲的病，表示了万分感激之情，虽不在母亲身边，也到处求医问药，还准备把母亲接来省城治疗。这封信，则详细介绍了“亲侍汤药”的情况，以免去两位舅父的惦念。

这一年多来，毛泽东为医治母亲的病而焦虑劳顿，不仅未能出国，连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之差事，都辞掉了。1918年至

1919年，毛泽东还只是一个进步的、具有新民主主义意识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还是以后的事。即使当时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对母亲的爱予以回报，也是人性范围内的事，是很正常的。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他对当时正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好友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不久，经周世钊的引荐，到修业小学担任了历史课教员。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毛泽东的母亲已送来省城治病。他一面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开展爱国运动；另一方面，尽量抽出时间陪伴母亲，送汤送药，尽人子之责。毛泽东觉得母亲难得来长沙一次，又正值泽民、泽覃均在长沙（毛泽覃当时正在长沙修业小学读书），便一起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母亲坐中间，毛泽东站左边，毛泽民、毛泽覃站右边。这是后来毛泽东最喜欢的那张照片。

由于医学不发达，毛泽东的母亲在省城医治，效果并不见佳，不久便由毛泽民护送回了韶山。

时光一天天在流逝，文氏的病情一天天在加重。到了民国八年八月二十日（1919年10月5日）的这一天，这位操劳一生，俭省一世的贤良女人，躺在病榻上流着眼泪，拉着丈夫的手，望着守护在身旁的儿子毛泽民，一声轻似一声地呼喊着：“石三伢子”，声音逐渐消逝在她上屋场的卧室里……她只在人世走过52个春秋。

毛泽东、毛泽覃兄弟俩日夜兼程，赶回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上屋场。然而，毛泽东再也见不到母亲那慈祥可亲的面容了，见

到的只是她老人家长眠于其中的那副灵柩。临终没有见上母亲一面，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遗憾。几天来，他一直守护在母亲灵柩的跟前，面对慈母英灵，思绪万千。在10月8日的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黯淡的油灯光下，含泪痛作《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

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
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
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
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悌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
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

五德萃萃，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
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病时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思，或多劳瘁。
大小亲疏，均待报贲。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
必秉恫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
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霏。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
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

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并挥泪作灵联两幅：

其一曰：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曰：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祭母文高度赞扬了母亲那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劳俭朴、慷慨厚道的高尚品德。

1919年农历十二月初一（阳历1920年1月23日），即文氏过世后仅仅3个半月，毛泽东的父亲，50岁的毛顺生老人，又追随他的妻子去了。

他临终也未能合上双眼——他年岁不大，发家之梦才实现一半；两个儿子没有送终，只有二儿子泽民守在身旁。

毛顺生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一生备历艰辛，照料了妻子和3个儿子；但长子老是不合他的心意。晚年，他已感受到了苍凉，妻子的去世给了他最大的打击——他们自1880年前后一起生活，至1919年已40年了！

妻子灵柩尚在坪上，似乎在等着他。

毛泽东既未送终，又未奔丧，此时他正奔走于长沙、武汉和北京之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找到革命的新途径，他心系天下，家庭、情亲，只能服从改造国家的需要。毛泽东的目光和胸怀，更远大更宽广了。1921年春节，他才带着泽覃，走到父母坟前。在父母坟上祭扫之后，他便将他父亲33年艰辛创下的家业散给了穷苦乡亲，把弟妹们全部带出

了韶山。

1927年秋，毛泽东奉中共中央指示发动秋收起义，他匆匆安顿了妻儿，又一次来到父母坟墓前，默默地向父母告别。从此，一别就是32年。直到1959年，毛泽东才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写下了那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安息于九泉之下父母亲的怀念之情，回到了韶山。这位66岁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在父母双亲合葬墓前，献上了用松枝扎成的“花圈”，三鞠躬，口中念叨着：“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父母亲卧室里，他深情地端详着双亲大人当年留下的照片，对随同人员说：“我母亲的颈上长了一个包，穿一个孔，只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要是现在就不会死了。”他的话语讲得很轻，也很沉重，饱含着对二老双亲的缅怀深情。

1920年，毛泽东已经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这年冬天，他和湖南一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创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月30日，他随何叔衡一起，离长沙去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尔后，他主持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的工作，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工作十分繁忙。工作虽忙，但是，对于唐家坵的亲友们，他仍是十分的惦念，特别是对于早满花甲之年又长期对于自己的母亲病苦照拂了的八舅父母，更是常挂于心。1922年11月，在长沙主持中共湘区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工作的毛泽东，趁刘先生回家之便，特地修书一封，带给表兄文运昌，并托他转一函给八舅父母，请安问好。

(三) 学问无进，甚是抱愧（1922.11.11）

舅父母大人：

尊前，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
谅都人好，合家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
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
便，托带片纸，藉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
临赐教诲为禱！敬颂

德安！

甥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的父母去世后，七舅文玉瑞也于1920年去世，可以说，他的至亲长辈，就只有八舅父母了。又由于童年时代，八舅父对他的学习要求很严，这么多年了，毛泽东一直未敢忘记舅父的严教，特地汇报自己的“学问”之事，可见舅父对他的影响之深。此后，只要有机会，他就前去看望舅父母。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借妻子杨开慧以养病为名，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并创建韶山党支部。期间，多次看望八舅父母。1927年元月，毛泽东再次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在八舅父家中歇宿。把表兄表嫂表侄叫到一处，讲办农会的好处，讲革命的形势。他动员说：“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在他的动员下，文家的很多亲戚都参加农民运动，投身到革命的队

伍中。

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形势急转直下。3个月后，汪精卫又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奉命于1927年9月发动秋收起义，从此他再也没有到过舅父家。

新中国成立后，文家的两位表兄应毛泽东之邀到北京作客。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实现拜访外婆家的愿望。

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时，因韶山冲和唐家坵间公路不通，爬山间小路毛泽东又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作为中共主席，实在是太忙了。萦绕心怀几十年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

但作为情感上的补偿，他把外婆家的亲人接来韶山，和他们叙亲情、话离别，纵谈天下形势，又和他们合影留念。舅父的子孙们深知，毛泽东是永远惦记着他们的。

二、不要来此谋事，此处并无薪水 ——致文运昌

(一) 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1915.1.11)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一封信，只是个还书便条。倒是这张“便条”后提及有“信一封”，可惜不存，甚憾。

文运昌（1884~1961），又名咏昌、润昌，在湘乡县唐家托文家排行十六，是毛泽东的舅父文玉清（名正莹）的次子。

毛泽东与文运昌的交情极深。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反复提到的“我的表兄”，就是文运昌。

文运昌比毛泽东长9岁，早年毕业于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他给少年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读了5年私塾以后，父亲便不让他继续读书了，准备送他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米店老板与毛泽东的父亲是同

房族兄。

但毛泽东强烈要求继续读书。

恰在这时，表兄文运昌来到韶山冲上屋场，他理解毛泽东的志趣，告诉表弟，湘乡县城那边有一所中西合璧式的学堂——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设的课程很丰富，很新颖，中西文化，包罗颇广，老师中还有留过洋的，去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知识，这些新鲜知识不同于私塾里的经书，今后会大大地用得上的。

文运昌的一席话，坚定了毛泽东投奔新学的决心。

毛泽东说服了二位舅舅，由他们出面，请来两位教师、一位堂叔，加上二位表兄，又请了一位新派人物，在酒席筵上共同劝说毛顺生。

尽管毛顺生生性执拗，但这次寡不敌众，经过客人们酒筵上的一番番劝说，他终于不得不作出让步，改变初衷。众人的开导，使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便当众答应了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小读书。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对小家庭束缚的最终解脱，争得了自己自由意志的发展。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人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表明他与父亲给他安排的那种经商赚钱道路的最终决裂。诗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发现了这首诗，惊讶不已，并将此事告诉了文家。这样，毛泽东改写的赠父诗得以留传。建国初期，文运昌上交的革

命文物中，有这首诗。

原诗为日人西乡隆盛所作。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期的政治活动家，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青年时代砺志好学，习文练武，具有远大抱负；明治维新时期主张改革，是尊王倒幕派的主要代表者。他写的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诗歌，是在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的。

这一原作诗篇，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只是为了适合自己的情况，稍加改动，将原诗的“男儿”改成“孩儿”，“学不成名死不还”的“死”字改为“誓”字，其他未作变动。

1910年秋，毛泽东挑着行李和书籍，依依惜别了养育他的生身父母，去50里外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这一年，毛泽东17岁，离开韶山迈出了他伟大革命家一生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在东山小学，文运昌借给他两本书，一本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本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这两本书（其实后一本是杂志）对少年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在东山高小只读了半年书，便去了长沙。先后在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就读。后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即进入一师。

虽然学校换了几所，但文运昌处所借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两书却始终携带在身，不时翻阅。1915年寒假期间，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家向舅父舅母拜年，顺便带来了《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由于文运昌不在，又因为两书借阅太久，有所损毁，便留下了这张《还书条》，以示歉意。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文运昌在湘乡任教，但两人书信往还颇多。这期间，毛泽东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年9月，毛泽东的七舅病逝，他曾回乡送终。

1922年秋，毛泽东主持中共湘区委员会。这时，文运昌托一位刘姓同乡带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要求表弟毛泽东为这位同乡找一份工作。毛泽东四处为这位刘先生寻找“位置”，但终因无力玉成其事，只好嘱其返乡。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文运昌的，一封是给舅父母文玉清、文赵氏的。其给文运昌的信如后：

(二) 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 (1922.11.11)

运昌姻兄：

来示接读。刘君实在无法位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景，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

舅父母一函请面呈。各位表兄嫂同此问候。有暇盼兄时赐教言。即颂乡祺！

弟 泽东上

十一月十一号

“生活奇窘”，道出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奔走而甘守贫困的伟大精神。无产者一生奋斗求解放，四海为家，贫苦生活几十年，甚至还要冒生命危险，而乐此不疲者，只为一个最崇高的宗旨：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对此毛泽东一生坚持不懈，包括他晚年出现

了严重失误，他的动机仍然是纯美的。虽则如此穷窘，但毛泽东仍十分记挂着他的舅父舅母，修书问安，十分礼节。

1924年冬天，毛泽东回到韶山，以“养病”为名，发动农民开展斗争，

在毛泽东的带领、教育下，他的全家都走上革命道路、亲友们也纷纷加入农民运动。文运昌曾担任农会秘书。一天，毛泽东和文运昌正围炉向火叙别离之情时，反动武装突然来捕人，毛泽东机警脱险，但文运昌被捕去，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

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湖南，文运昌被迫出走广东，供职于粤军第3军第1师，担任谘议之职。又在广东揭阳县枫口警察所任所长。1929年回到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此后10年间，关山远隔，行所无定，战事频仍，音讯难继，毛泽东和表兄断了联系。

1937年，文运昌听说毛泽东和红军到了延安，便趁长沙学生莫立本投奔延安之机，托他给毛泽东带去一信。

毛泽东终于与家乡取得了联系。

激动之余，他立即给表兄回了封热情洋溢极富情理的长信。

(三) 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1937.11.27)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

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有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农民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

虽然如此，侄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生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

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坵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润墨挥毫，一气写了5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韶山、唐家坵的眷恋，“快慰莫名”、“十分敬爱”、“十分眷念”、“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很欢喜的”。500多字的信中，不厌其烦，反复表达极度思念之情。人生谁不恋故乡？何况毛泽东自幼在舅家长大，能不怀念吗？自1927年一别，整整10年了，天南地北，音书断绝，毛泽东不知熬过多少乡思。现在，骤得亲友来书，能不雀跃吗？毛泽东在信中也向表兄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队伍：“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专为国家民族劳苦农民做事”，“牺牲个人私利”，“人人平等”，以此劝告表兄，如为谋薪水而来，则定会失望而去。

信里提到的刘霖生是毛泽东和文运昌的表兄，是毛泽东的大姑母的儿子。

身处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记挂着这位表兄呢？

刘霖生是湘乡县南薰乡祝赞桥人，中过秀才，早年崇拜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很大的同情。他

还积极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子侄等参加农民运动。

刘霖生擅长诗文、联语，文思敏捷，且生性刚毅耿直，不畏权势，好打抱不平，在乡民中颇孚众望。刘霖生与毛泽东家往来密切。1920年1月，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去世时，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请来刘霖生，作丧事礼主。文运昌的母亲、毛泽东的八舅母文赵氏去世，因毛泽东兄弟均在外从事革命活动，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便委托刘霖生代写挽联。

刘霖生代毛泽东写的挽联中有“问到旧栽桃李，已成大树将军”之句，寓意极是深刻。

当然，这些情况，都是从文运昌托莫立本带去的信中得到的，毛泽东因此对刘霖生充满了感激之情，故有此一问。

文运昌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深受鼓舞。

1938年底，日军进犯湖南。文运昌从此携儿子儿媳流落湖滨，在华容耕田度日，后又从华容迁往南县白蚌口。直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才回到了湘乡原籍。

此后10多年间，毛泽东一直挂念家乡的亲友，只要有机会，他就对他们表达问候之意。1949年10月，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除了详细询问唐家坵外婆家亲友的情况外，特别关心文运昌的情况，并让毛泽连回韶山后务必去唐家坵一转，代向文家亲友及文运昌致问候之意。

毛泽连回乡后，即转达了毛泽东对文家的关怀。文运昌自然十分的激动和骄傲，一连给毛泽东写了多封信，将家中情况及乡政现状悉数相告，同时还打听毛泽民、毛泽覃等的情况。毛泽东于百忙之中，复信一封寄南县白蚌口。

(四) 地方工作缺点，尚望随时见告 (1950.4.19)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

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但信寄走后，毛泽东一直放心不下。在同年5月7日写信给唐家托的表兄文涧泉时询问道：“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封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又在5月12日致表兄文南松的信中再一次询问道：“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直到文运昌复信给他，他才放下心来。

自1925年以后，毛泽东再没有见到过文运昌。因此毛泽东十分想念这位对他帮助很大的表兄。

1951年4月，毛泽东邀请文运昌和其他两位亲戚进京叙旧。4月24日，文运昌等来到北京。

关于这一次相见，1992年第4期《记者文学》有详细的记述：

毛泽东几步迎上前来，一双柔厚的大手伸向每一个客人。毛泽东显得非常的高兴，他拉着文运昌的手，好一阵地握着，有些激动难抑地说道：“几十年不见，表兄你好呀！表嫂子她们都好吧？”

“好，都好，都好！”文运昌连连地说着。

这时毛泽东将站在旁边浅笑的江青拉了过来，介绍说：“这一位就是当年为我读书作担保人的运昌兄。”接着又对其他两位亲戚作了介绍。

江青礼貌而友好地点了点头，并安排主宾各位都落座。

拉不完的话题，道不完的乡情。

他们从农业生产谈到农民生活，从龙潭坵的巨石谈到石砚冲的茶籽，毛泽东仿佛回到了儿时忘情过的那片山水……

几人谈笑着，不觉就到了晚饭时分。

毛泽东站了起来，热情地说：“今天我请客，好菜谈不上，好酒还有几瓶，要让你们几位尝尝鲜。”

文运昌是个爱酒如命的人，听说有好酒，那脸上溢满了笑意。

毛泽东从身边桌旁取来一瓶葡萄酒，逐一给大家倒酒，并特意问三位客人：“你们都说一说这是什么酒。”

几位都未见识过这酒，胡猜了一气，不得要领。毛泽东摇摇头说：“这是葡萄酒，你们原来是吃不到的。”

文运昌痛快地喝了一大口，连连夸赞道：“好酒，真是好酒。”说完，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毛泽东又给他满满地斟上一杯。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原来都因我受了苦，受了牵连，现在我也要让你享受享受。来，满上，干杯！”

毛泽东一般不大喝酒，但今天却例外了。干完杯，毛泽东又为每人的酒杯里倒满了酒。

吃完晚饭，毛泽东继续与客人叙谈。毛泽东讲了很多儿时的笑话，还讲到了他那“石三伢子”乳名的来历。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有板有眼地说：“那时候，我母亲信迷信，请人算八字，说是我的八字太大，不拜个石干娘怕是性命难保。这样，我娘就去龙潭坵山脚那块人形石边带我下跪，认拜了石头干娘。又因为我是他生的第三个儿子，所以给我取了个石三伢子的名字。现在看来，拜石头干娘虽然是迷信，但也反映了我母亲的一片爱心啊！”

文运昌说：“只可惜七姑母死得太早了，不然，她就会看到当初她养的‘石三’如今作了国家主席了呐。”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从这次接见的形势看，毛泽东与文运昌的关系确属非同一般。但就是这样的亲戚，毛泽东也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给以特殊照顾。

毛泽东处理亲友关系，本着三原则：亲亲但不为亲徇私，念亲但不为亲谋利；济亲但不为亲撑腰。总之，“亲者严，疏者宽。”

对文运昌如此，对其他亲戚也如此。

1949年，文运昌曾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过信，随信开了份14人名单，都是毛泽东外祖家的亲戚，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

毛泽东说：“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

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奋斗。”他在文运昌开列的名单上批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民会要说话的。”

1950年正月初，毛泽东的另一个表兄文南松也写信为文运昌求情。毛泽东也没答应，回信给文南松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文运昌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后来他通过“在人民中的表现”，光荣地当上了湘乡县人大代表，1951年参加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这一年，文运昌向人民政府交出了不少珍藏几十年的毛泽东的一些文物，其中有本书的第一封信（“还书便条”），毛泽东去东山高小前写的那首“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以及一本毛泽东亲笔签名的书和一张相片。这些文物，成了研究毛泽东早期活动的珍贵资料。1953年起，文运昌改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从解放起一直到1961年，文运昌一共6次去北京。开始，毛泽东都热情接待，但是后来的情况就不同了。

毛泽东对亲属严格要求，包括过去对他有很大帮助的文运昌也不例外。但是，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爱喝酒，好讲大话，外号“酒疯子”，喝起酒来醉醺醺的，讲话不免失口。就是有时到中南海毛泽东家里作客，也时常喝醉。对于这些，连文运昌的侄儿文炳璋都看不惯，他曾向毛泽东反映这位阿伯与招待所女服务员的暧昧关系。这些毛泽东是不满意的。在毛泽东心中，文运昌属于不检点，“不大老实的人”。为此，他多次写信给当地党组织、政府和党政领导人，请求当地党政对文家亲戚严格要求，帮助教育他们勤耕守法，不搞特殊。

1954年秋，文运昌到北京中南海去看望毛泽东，住了一段时间后，仍舍不得离开。恰逢韶山毛泽连、邹普勋几位乡亲去北京，他们见了毛泽东后，打算回韶山，毛泽东便叫他与乡亲们一同回乡。文运昌不高兴，说：“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呀！”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文运昌没奈何，只好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回湖南。

毛泽东一向主张“亲者严，疏者宽”，但是再严，对他的亲属这么生气的似乎不多，特别是这样下“逐客令”式的，而且又发生在文运昌身上，这就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了。

如果说第一次文运昌作客于丰泽园，是以“乡下人”身份出现的，那时候，文运昌赋闲在家，十足一介平民。对这样一个农民身份的客人，毛泽东是不会也不愿提出什么要求的，更何况文运昌还是在分别几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但是到1954年，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这时的文运昌已经是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了。这一职务，在毛泽东看来，已经是一位有着相当地位的公职人员了，而公职人员是应该自律的。毛泽东不希望看到自己至亲的不是处，总希望他们进步，希望他们完善，希望他们的行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

然而文运昌没有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变化，没有能朝着毛泽东所希望的方向前进，这就不能不叫毛泽东失望。

由于文运昌生活不够检点，毛泽东有些难过地说：“我的亲戚，过去为了我受了苦。现在有缺点，应该批评。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了，他们有意见，但不管也不行，我还得要管。”

但毛泽东毕竟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主席，无力去关注表兄的一言一行。对于文运昌的一段历史，毛泽东也曾有微词，认为他在旧政府里做过事，供过职，身上沾染的不良习惯难改。1955

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外甥陈国生时，曾谈到文运昌过去的这段历史。他颇有感慨地说：“文十六阿公（运昌）是摇鹅毛扇的。”

陈国生不解其意，问“什么是摇鹅毛扇的？”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两面派嘛”。

文运昌1961年12月11日撒手人间。15年后，毛泽东也离我们而去。这一对有着半个世纪交往的表兄弟由开初的互相赏识到后来的互为不满，这中间的是非曲直，世人自会实事求是的评论。遗憾的是，生前，他们终于未能谅解。

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 ——致文南松

(一) 来示读悉，极为高兴 (1949.11.28)

南松兄：

来示读悉，极为高兴。

祝你健康！

祝各表嫂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大革命失败后，文南松仍然向往革命，他相信表弟的事业是正义的，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充满信心。他冒着生命危险宝藏着毛泽东兄弟3人和母亲在长沙合影的照片。当人民解放军进入湖南省境时，文南松积极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并鼓励儿子文炳璋参加地下武装，配合大军解放湖南。这一切毛泽东深为赞许，常说：“文廿阿公是个老实人，我最敬重他。”

文南松是毛泽东舅父文玉清的第三子，是两舅父家6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比毛泽东大3岁。他生于1890年10月10日，按文氏大家族的排行，排在第二十。因此建国后，毛泽东谈起文南松时，称他“文廿阿公”。

文南松是新中国诞生后唐家坨毛泽东诸亲戚中来信最早的

一个。因此，毛泽东给他的回信，也就最早。

毛泽东的童年是在舅家度过的。在那里，他和几位表兄结下了深厚情谊，情同手足。他们经常同桌共餐，同床共被，白天一起放牛、种菜，晚上则在桐油灯下一起读书、认字、讲故事。

文南松读书不多，长大后在家务农。1921年，毛泽东动员全家出去干革命，是文南松将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和继妹毛泽建护送去长沙的。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期间也到唐家坨作了动员。文南松听从表弟毛泽东的话，毅然投身于农民运动。

湖南刚刚宣布和平解放，文南松从路过的解放军口中得知表弟毛泽东已经是“主席”了，兴奋得彻夜难眠，在煤油灯下向表弟毛泽东写信。他也不知道毛泽东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如今到了北平城里，便写了个“北平城里/毛泽东主席亲启”的信皮，将信寄走了。由于当时邮路不通，这封信在路上走了一两个月之久，到11月份才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接信后，即挥笔复了上面这封信，时间是11月28日。这时，在北京住了将近两月的毛泽连打算回乡，毛泽东将这封信和一张他的全身近照交给毛泽连，并嘱咐道：“一定要亲手交给文廿阿公。”

1950年的春节，对于文家来说，是个真正大团圆的节日，毛泽连捎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流落华容、南县多年的二哥文运昌也回到了唐家坨。历尽劫波兄弟在，畅叙别情，欢笑与唏嘘杂伴。

文南松自己读书不多，但是他尊重读书人。在他的心目中，二哥运昌是应该有作为有出息的，如今表弟当了国家主席，应该会为运昌兄找一个工作罢，即使推荐一下也行。于是，他提笔向毛泽东写了信，信中还提到乡下缺粮的事，也希望表弟能够过问

过问。

毛泽东收到文南松的来信后，亲笔作了回复：

(二)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

(1950.5.12)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文南松是个纯朴农民，他具有农民的质朴、诚实、正直的品质，但他也未免有农民落后意识的一面，那就是表弟既已经是一国之上，为自己的至亲谋个一官半职似乎顺理成章，何况他不是为自己谋差事，而是为有文化有能力的“落魄文人”运昌胞兄谋差事。他不了解共产党是不容许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私利的，所以，对文南松来信要求推荐文运昌参加工作一事，毛泽东婉拒了，“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但对于文南松反映的另一个问题，他却是非常的重视，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亿万群众吃饭的大问题，毛泽东关切地一连问了三句“现在怎么样了？”“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最后要求文南松“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毛泽东对于文家诸表兄的挂念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这封信里，毛泽东问了两位表兄的情况，“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并对十一哥（即文润泉）尚健在表示“甚慰。”这以后，毛泽东多次带口信给文南松，邀请他到北京来作客。遗憾的是，文南松体弱多病，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未能晋京与表弟毛泽东相见。1952年2月，这位一生勤劳的表兄病逝于家乡，享年61岁。毛泽东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难过，托人带了几百万元旧币作为安葬费用。1953年，文南松的妻子文刘氏受毛泽东之邀，赴京叙旧。期间饱览了首都的名胜风光，离开北京时，还与毛泽东一起合了影。

四、承告乡情，甚谢 ——致文润泉

(一) 十哥、十七哥还在否 (1950.5.7)

润泉表兄大鉴：

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坵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文润泉，毛泽东的七舅文玉瑞的次子，也是毛泽东的表兄，生于1881年，长毛泽东12岁。

由于七舅家困难，人口多，文润泉只读了两年书，一辈子在家种田。1924年毛泽东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文润泉受到鼓舞，

加入了打击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行列。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去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从此文润泉和表弟失去联系，但他崇敬这位不寻常的表弟，相信他从事的事业是为受苦人谋利益，他热望毛泽东的事业成功。

文润泉有一位族兄名叫文凯，毕业于日本东京警官大学，担任过旧政权的县警察局长，他要求文润泉出面写个信，让当了国家主席的表弟照顾照顾，给安排个职业。

文润泉认为对于“一国之主”，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他毫不犹豫地替这位族兄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于是，毛泽东回了上面的信。

毛泽东虽然明确拒绝了为文凯安置工作的要求，但从信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深深怀念着外祖家的舅舅和表兄的。

文润泉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感到极大慰藉。那些日子，他几乎逢人就告：“表弟给我来信啦！”“主席给我来信啦！”“主席还惦记我们哪！”

第二年，毛泽东在邀请文运昌来北京时也邀请文润泉同来。

20多年不见了，兄弟都老了。文润泉拉着表弟的一双大手，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文润泉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走，和表弟合影留念。毛泽东又安排了很多礼物，叫文润泉带回。文润泉推谢，毛泽东说：“表兄到北京空手而归，岂不叫人笑话！”

此后，文润泉多次去北京，往往一住就许多天，花销都是毛泽东从稿费中支付。

文润泉一生务农，极少离开乡里，也从来没有到过大城市。现在，多次去北京看望表弟之后，便产生一些非分之想。他向毛泽东提出，到上海等大城市游览一番。正在此时，文润泉外婆家

一位亲戚，想到北京读书，那位亲戚要求文润泉出面给毛泽东写个信，介绍。文润泉觉得读书不是介绍工作，该不至于被拒绝，便给毛泽东写了替亲戚说情的信。

不久，便收到毛泽东的回信。

(二) 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 (1953.9.8)

润泉兄：

惠书收到。

承告乡情，甚谢。

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此复

顺祝康吉，并候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三的九月八日

毛泽东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明朗。不是正当的要求，他决不迁就，一概回绝。他决不滥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就是对最敬重的“十一阿公”，也是如此。进京看望，是表兄弟至情，毛泽东可以自己出钱解决所需花销，但对文润泉要到上海等大城市游览，就超出了表兄弟情亲之外，是非分之想，毛泽东明确表示“有所不便”，也“不便介绍”亲戚求学的事，因为这和介绍职业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以权谋私，是和共产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有一次文润泉来北京看毛泽东，想坐飞机回去，开开眼界，毛泽东没有同意，说：“现在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主席更应带头啊！”

但为了安慰文润泉，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300元，作为他返家的路费。

文润泉是毛泽东的诸表兄中进京最多的一个，从1951年到1962年，共有7次，有6次和毛泽东合影留念。可见毛泽东对这位“十一阿公”的深厚感情。

不过，文润泉1959年那次进北京见毛泽东，却吃了一些苦头。

话题得从“大跃进”说起。

1958年，为了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党中央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主观意志决定论取代了科学态度。为了追求“高速度”、“大跃进”，各种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

韶山，湘乡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一些人不顾客观事实和效果，要求地翻三尺。为了追求“高产”，大力提倡密植，插秧要插四六寸，甚至四四寸，还说这是“科学种田”。不接受这种安排的，就是反对“大跃进”运动，就是反对新成立的人民公社，也就是反党，反对毛主席。

文润泉接受不了这一种“种田经”。这位几十年来一直在田间耕作，并摸索了丰富的作田经验的老农，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种方法会“科学”到哪里去。在一些公共的场合，他以作为一个老农的经验，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水稻可以密植，但只有合理密植才会增产。他向干部们说：“正像一个家庭，就是那么一缸子米，儿女多了就吃不饱。稻秧也是一样，太密了，禾苗子

争肥、争水、争阳光，又不好除草，怎么可能增产呢？”

文润泉的话，显然不符合当时的要求，他的观点被斥为“经验主义”并受到批判。文润泉因此还被插了白旗，戴上了“保守”、“落后”的帽子。

文润泉哪里受得住这口气。问我表弟去，到底是毛泽东让这么搞的，还是下边这么搞的，不相信问不出个水落石出。文润泉踏上了去北京的道路。那是1959年的3月。

虽然劳动一生，身体还很硬朗，但毕竟是78岁的老人了。文润泉好不容易来到北京，住在一家招待所里。当然，他住招待所是不成问题的，说一声是“毛主席的亲戚”，比什么介绍信都灵。要住招待所容易，要见主席就难了，因为他这次来京，毛泽东并没有约他，也不知道他来了。至于新华门那些站岗的战士，可不是凭一句“我是毛主席的亲戚”就能放行的，所以每次去中南海，都在新华门给挡了驾。

文润泉很有心眼，人进不了新华门，电话总能进去，他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但里面回答：“毛主席在外视察，不在家。”

文润泉是个犟性子，不行，还是要等，一定要等到毛泽东回来了，把情况反映给他听，让他批评那些瞎指挥的人才能回去。

有一天，文润泉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说是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一位外宾。他虽然文化很低，但这个标题，还能看懂。

文润泉立即跳了起来：“好呀，他原来在北京！”

“我要见毛泽东，他是我表弟”。文润泉急忙来到新华门，希望能说服卫兵。

还是不让进。事有凑巧，正交涉间，一辆轿车从里面开了出来，轿车里正坐着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让停车，走下来把文润泉接了上去，并掉过车

头，往丰泽园菊香书屋开去。

文润泉对毛泽东说：“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毛泽东认真地听着。

“我认为，政府有的政策不行。”文润泉一付告状的严肃劲。“种田搞密植，我不反对，但要合理密植，如今搞什么四六寸、四四寸，甚至板板寸，我作了一辈子的田，还冒看到如今这个密法。下面有人说，这是你让搞的，我不信。如果是你让搞的，你这样搞就错了；如果不是你让搞的，你就要纠正，不能再这么搞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毛泽东就喜欢家乡客人能提实实在在的意见。

“我文润泉也不是要摆狠，但是我就是不同意这么个密法。这下好了，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是“经验主义”，插了白旗不说，还要组织批判我。我就是来告状的，让你也评评理看。”

毛泽东仍是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心里显得有些沉重。

“说我‘保守’我就保守，作田这种事要不得花架子的，至于说我是保守派，我怕什么？我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还可以扯秧，但这么密植，是要减产的，今后可要出大祸事的。”

文润泉一气说到这里，这才注意到毛泽东的反应。见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便接着把最后几句“厉害”的话端了出来：

“我来北京已经这么久了，但还要住下去，要等到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了，我才回去！”

毛泽东知道文润泉心直口快的脾气，也知道他一辈子种田的经历和那来自实践中的经验。他对密植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从他自己的性格出发，佩服表哥的这种倔劲，能理解他的这

腔怨气。

“密植问题，我会过问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合理密植才是科学的态度。”毛泽东肯定了文涧泉的意见。

几天后，他来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我打算回去了，来北京也太久了。”

毛泽东知道他的火气全消了，便开玩笑说：“怎么，孙子来信了？”

文涧泉有些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没写信来要是政府的态度还没有改怎么办呢？”毛泽东情绪很好，继续打趣道。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文涧泉回乡下不久，毛泽东就在《党内通信》中对密植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各地农村改变硬性规定密植幅度的办法。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显然吸取了广大农民，其中也包括文涧泉的意见。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从1959年起，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各地不时有饿死了人的消息传来。党中央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纠正前一时期的“左”倾错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毛泽东邀请表兄文涧泉进京，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他文涧泉不敢讲的话，而此刻的毛泽东，最需要了解的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实情。

1961年的7月6日，文涧泉再一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自知反映的问题重大，恐怕水平有限，讲不全，特地请了他的外侄（也是毛泽覃原配赵先桂的继子）赵迎一起来京。当时，赵迎是学校的一位教师。

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农村群众生活，他询问了许多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文涧泉和赵迎都一一地作了回答。毛泽东还要秘书

认真地作好记录，整理出来有大用。

在讲到农民的生活状况时，文涧泉说：“老百姓骂点娘在其次，饿死了人可是大事呀，今后有的事，硬不能稀里糊涂了。下面有些干部对下压服，对上糊弄，尽拣好听的话讲，那是花架子，是要误事的呀！”

毛泽东点头表示肯定。过了会，他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暂时有困难，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患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在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你们回去后，要及时给我写信，把农村的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点头应允。

毛泽东见这次来的赵迎讲话也很大胆，很直率，便说：“赵老师，你今后就做我的通讯员，把乡下的情况都写信告诉我，好吗？”

赵迎忙说：“好！”

从北京回来后，文涧泉和赵迎经常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下的一些情况，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62年，文涧泉又去过一次北京，毛泽东亦亲切地接见了。此后，由于年纪老迈，他再未去过北京。1967年1月29日，文涧泉仙逝家乡，享年86岁。

这是一位极为质朴，令毛泽东深深怀念，也令群众深深尊敬的老人。

五、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 ——致文炳璋

(一) 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 (1951.10.10)

炳璋同志：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此复

顺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文炳璋是毛泽东的表侄，文南松的次子。1919年10月25日生。少年文炳璋最崇拜的人物就是表叔毛泽东，虽然那时这样公开地说是担极大风险的，但文炳璋不害怕。

1949年6月，湖南和平解放前夕，文炳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活跃在湘潭、湘乡一带，保护乡里，迎接解放。

湖南和平解放后，文炳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下广州，在中南军区服役。

文炳璋参军服役，文南松重病在身，家中生活比较困难。文炳璋收到家里来信，希望寄些钱来，解决困难。

文炳璋当时也无能为力，苦闷之余，把家里的困难用信告诉了毛泽东，希望表叔能有所接济。

收到文炳璋的来信，毛泽东很挂心。

这时，恰好毛泽东的族兄毛宇居和毛泽东的表兄文梅清来京。毛泽东问及文南松家的情况，知道政府对军属已经有了一些照顾，文南松家的困难有所缓解。

毛泽东以此稍稍放心。于是抽空给在广州服役的表侄写了上面的信。

1954年初，文炳璋由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担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之职。他到职后，发现在他的亲属里，确有一些因为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而说大话，有的人还很骄傲，不大听从地方干部的管理。文炳璋感到这是一种不正的风气，他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文家中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文炳璋的信后，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毛泽东从来就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种封建陋习，他不能容许他的亲友因为他面骄傲特殊。作为一国的领袖，他时刻记住“人民会要说话的”，把自己置身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不谋私利，于是他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长信：

石城乡支部 诸同志：
石城乡政府

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

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托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信中提到的毛月秋，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父。

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肯定了文炳璋的做法。看来毛泽东很喜欢这位坚持原则的表侄，所以，在收到文炳璋要求来京晋见的信后，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

(二) 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 (1955.5.1)

炳璋同志：

二月十五日的来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逸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

一行，即持信为证。其它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先把信里提到的几个人物交待一下。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毛仙梅，毛新梅烈士之弟，毛泽东的族兄弟。文梅清，毛泽东的表兄。文东仙、文运昌的嫡亲堂弟，在文氏家族中排行二十五，人称“廿五阿公”，与毛泽东关系亲密。

毛泽东写完此信，觉得意犹未尽，便在信的天头部位添写了“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几个字。

通过这封信，再次看到了毛泽东在至亲面前坚持原则的可贵品质。文梅清是毛泽东亲舅文玉瑞的三子，他的亲表兄。文东仙和他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当他们提出了毛泽东不便插手的要求时，毛泽东断然拒绝“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原则问题，就是在至亲面前，也不稍通融。

湘乡唐家坵外祖家，毛泽东有 8 个表兄弟，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很密切。毛泽东十分关心他们，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们写过

20多封书信，并多次接他们上北京作客，寄钱赠衣物。但当他们提出要毛泽东推荐介绍到北京或家乡工作时，毛泽东都未答应。

这里，表现了毛泽东不徇私情，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的伟大作风。

六、不要带任何礼物 ——致文九明

(一) 1953.10.25

九明同志：

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回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能于十一月月上旬到京为好。

文九明，生于1913年7月，是文泮香的次子，毛泽东的表

侄。一直在家中种田。

解放初，文九明积极配合政府的各项工作，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时期，他曾任过初级社社长之职。

1953年毛泽东写给文九明的这封信，在“不要带任何礼物”一句下，特地加了一排着重号，以示强调。说起来，这中间有它的来历。

1951年深秋，文九明应毛泽东表叔之邀，与另外几位乡亲去了北京。临去之前，文九明想，几十年不见表叔了，带点什么东西作为见面礼呢？

说来也真让人难堪，才解放，乡下还真的拿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一带地方也没有什么特产，能数得出名字的就是酸豆角和火焙鱼。不能说到北京城里去见主席表叔就带一把酸豆角吧（还有人真带了这东西），真正能带的便只有火焙鱼。但妻子却反对，人家北京城里的一个主席，用老话说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皇帝，什么东西没有吃过，还吃你这寸把长的小鱼？要带，就带一个大鱼。

于是，文九明带了一条大薰腊鱼作为礼物。

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当这条大鱼摆在中南海客厅里时，毛泽东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他让秘书收起了这份礼物，他能理解客人的心情。乡下人本来就有这种讲究，出外作客不带些礼物是不成样子的。

便餐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问：“这次土改，你们家划了什么成份？”

“贫农”。

“贫农好呵。”毛泽东夹了一筷子菜放在文九明的碗中说：“贫农是我们依靠的主要对象。你这个贫农可要带头呵！”

毛泽东这一说，文九明可来劲了。“怎么没带头呢？49年刚

“解放，我就当上了乡支前委员，负责几个片的征粮工作呢！”

“好呀，你可是为国家作了贡献的呢，不过——”毛泽东故意拖了一下时间后说：“看来你这个征粮委员，怕是通过征粮，征肥了一点吧？”

文九明不解其意，停住了筷子，直直的望着毛泽东。

“如果不是捞了点什么好处，你怎有钱买了一条这么大的鱼带给我呢？”

文九明一愣，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知道这是主席在开玩笑（也是善意的批评），便说道：“天地良心，我文九明要是拿了一粒粮食回家，那就要遭天谴了。不过，这鱼可不是花钱买的，而是自家塘里养的。”

“韶山和唐家坵，都是火焙鱼出名，我说九明呵，下次来可莫带这么大的鱼了，顶多带一包火焙鱼就行了。其实，你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带，要带就带点乡下的材料来。你回去后，要多收集一些农村情况的材料，写了给我寄来也行，带来也行。”毛泽东嘱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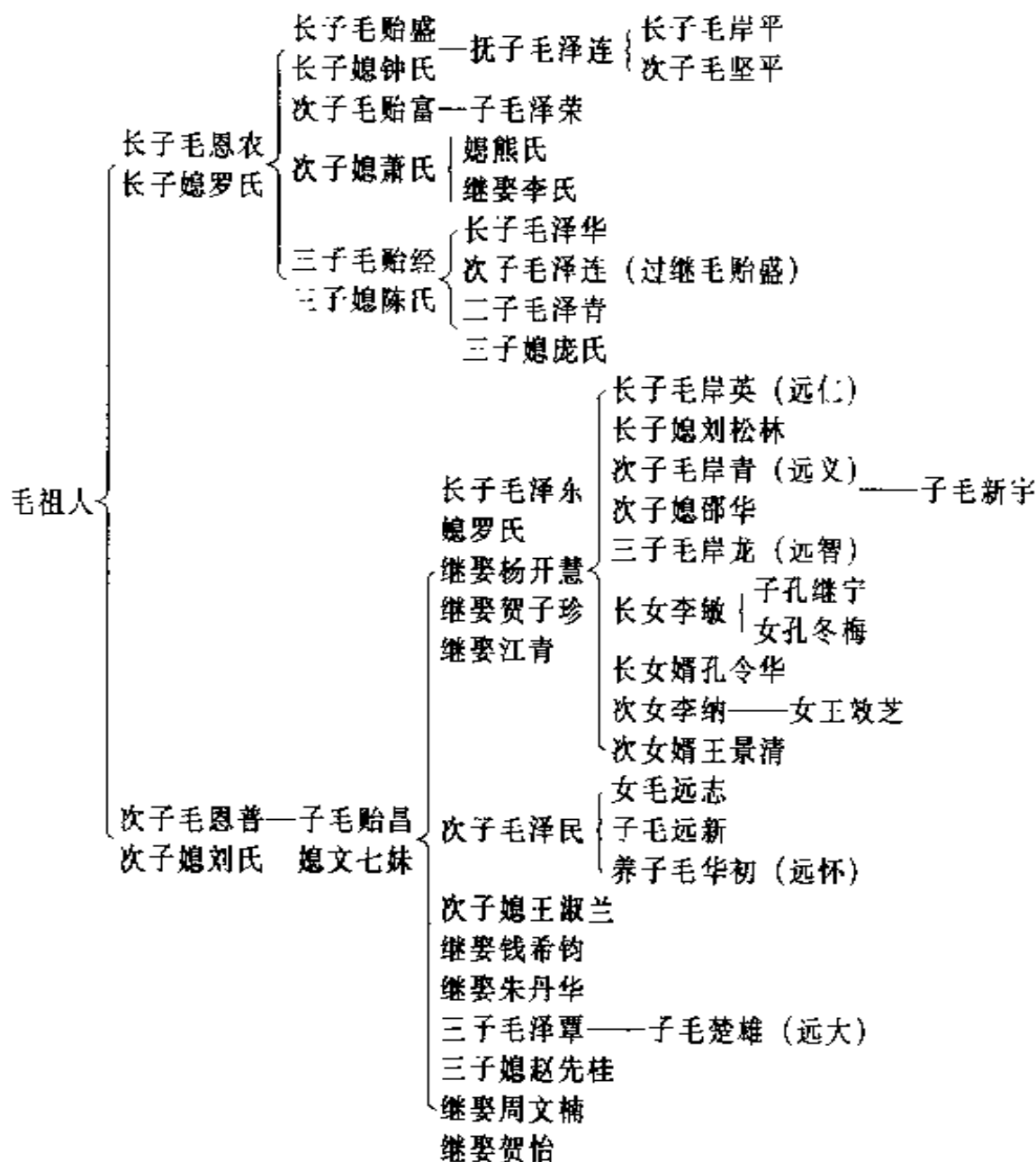
文九明连连点头。

从北京回来以后，文九明便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多方收集乡情民情、向毛泽东反映。1953年10月2日，文九明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来北京面述乡情。毛泽东收到信后，表示同意，便写了如上这封信。想到上一次文九明携带礼物的事，毛泽东特地写了“不要带任何礼物”一句，并加上着重号以示强调。

1953年11月上旬，文九明陪同毛泽荣来到北京，按着毛泽东的要求，他如实地谈了自己对粮食征购、牲猪喂养等问题的看法，并直率地批评了下面搞形式主义的作法。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来自最基层的意见，是难得一听的真话。”又说：“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实话，今后你来，还希望是这样。”

毛泽东直系、旁系亲属世系图



一、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 ——致毛宇居

(一) 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 (1938.5.26)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时绥！

弟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远耀等在此甚好

毛泽东和父老乡亲的交往中，外祖家要数表兄文运昌，族亲方面，则莫过于堂兄兼塾师毛宇居。

毛泽东和毛宇居系五代堂兄弟，也就是说，他们共一个大高祖。

虽然血隔几代，但两家的祖辈、父辈一直过从甚密。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宇居的父亲毛福生过去都住在茅塘。毛顺生结婚时，还是毛福生帮助操办的婚事。后来，毛顺生的祖父毛四瑞在南岸买了上屋场的房子，两家才别地面居。虽地隔数里，但仍互相照顾，往来不断。

毛宇居长毛泽东 12 岁，1881 年生。

毛宇居的曾祖父毛南方，清朝时曾任过县丞，酷爱诗书，收藏过不少古籍并留之于后世。这些，无疑对少年毛宇居有很大的影响。毛宇居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从童年到青年，他把家藏的两柜子书都读完了，又借读了不少，他从这里汲取了丰富的文化素养。他对书法兴趣极浓，又爱吟诗作赋，是个典型的儒士。冲里人常常请他代笔写信，时年节令，冲里的一些对联之类，几乎全出于他的手笔，因此后来竟有“韶山一枝笔”的美称。

青年毛宇居在家里办起了私塾，招收本地本族的一些子弟入学，教授《幼学》、《三字经》之类的课程。

1906 年秋，刚从桥头湾私塾结业的毛泽东即投奔他的门下就读，为时将近一年。

少年毛泽东的聪慧，在韶山冲是很有些名气的，但同时他的“顽皮”，也使在这之前的几位塾师大伤脑筋。因此当毛顺生将毛泽东送到毛宇居手下时，特别嘱其“严加管教”。

毛宇居对学生要求颇严，甚至近乎苛刻。学生淘气不听话，一旦被他发现，轻则批评，打手板，重则呵责，罚站罚跪，弟子们因此十分惧怕他的责罚。

可毛泽东却有些不以为然，并且时常有“作对”的举动。

毛宇居读了许多书、学识渊博，但受旧思想的影响，虽然科举考试制度这时已经废止了，但他仍然认为只有四书五经才是最有用的学问，其余都是没有用的“杂书”，特别是毛泽东最喜欢读的古典小说和戏曲，他认为更是误人子弟的东西，严禁学生阅读。他又最崇拜孔夫子，对西学则一无所知。加之教学方法仍村师，这些都令毛泽东大为不满。毛宇居仅比毛泽东大 12 岁，父亲一走，毛泽东便开口闭口叫毛宇居“大哥”，从不叫先生，全无师道尊严，这样一来，毛宇居感到很不满意。

有一次，毛宇居要学生们温习功课，不授新课。生性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却提出：如果大哥今天不授新课，他将到屋后一僻静而阴凉的大树下，在那里读书记性好。先生没有答应，但等先生稍一外出，毛泽东即刻便溜了出去。

几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不仅背会了课文，而且还看了一些自己最喜欢看的书，还顺手牵羊摘回来一些野果。他先给每个同学分了一份，然后给“大哥”也留了一份。毛宇居很生气，厉声责问道：

“谁叫你到处乱跑？”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背书囫圇吞枣，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毛泽东不以为然，从容答道。

“放肆！”毛宇居大怒。“那您听我背书好了。”毛泽东赌气道。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倒毛泽东，便把他唤到教室外，指着天井说：“我要你给我赞井，赞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

毛泽东一边环绕着天井转圈，一边构思诗句。但见层层青砖砌的天井里，清水一汪，卵石片片，几条同学们从溪沟里抓来的鱼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来来回回游动。他觉得大哥太不近情理，自己被父亲送到这里，真如这些被同学们送到井里的小鱼，没有半点自由。他沉思片刻，一首打油诗即从口中吟出：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圈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同学们听了，都拍手叫好。

毛宇居意识到自己的教学确实存在着弊端。他暗自佩服这位才思如此敏捷的学生，便放毛泽东走开。

据当时一起在毛宇居手下读书的郭梓材回忆说：“学生除了泽东以外，我，我哥哥梓阁，义兄耿侯，堂弟桂五（又叫桂五麻

纱)，等等……泽东同学从小异常聪慧，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既不喜欢读《三字经》，也不喜欢读《四书》。老师要惩罚他，他就和老师‘捣蛋’。他喜欢看各种小说。那时候，他是一个仅十多岁的小孩子，但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公认的领导者了。他不但带我们和老师造反，反对那种旧传统，而且打游戏仗，他也起着一种组织作用，由他当指挥，发号施令，叫我们冲锋。”同学刘洪授回忆说：“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作。他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常帮别人作。他待人很有礼貌，但敢作敢为，他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怕，逢善就莫欺。’”

毛宇居也回忆说：“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子集，他最爱的是那些《精忠传》、《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

毛泽东在毛宇居门下读书的最大收获是读了《左传》。这本由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著的史书，是一部反映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活动，总结各国兴亡和战争胜败教训的编年史，这是毛泽东在经书类中相对感兴趣的一本。由于他学得扎实并能融汇贯通，受益非浅，并由此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有增无减，终生不衰。通过对中国史书的广泛涉猎，毛泽东熟悉了古代不少战史战例，为他后来的战略战术思想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毛泽东在毛宇居门下一年，不仅从这位族兄兼塾师那里汲取了文史养料，也为先生的人品所折服。更重要者，由此开始了漫长岁月中的特殊关系。毛宇居虽然是宗奉四书五经的儒士，但向往光明，向往真理，并不固执。他如千千万万普通的知识分子那样，有强烈的爱国心，拥护革命事业，甚至肯为革命事业牺牲自我。所以，毛泽东和本族诸亲友的关系中，对毛宇居的信赖超过其他人，事情托他去办，毛泽东放心。1911年，毛泽东进入省城长沙求学，每当寒暑假，回韶山总要到蔡家塘去看望毛宇居，

切磋诗书学问，有时竟至天明。以后，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仍没有忘记这位兄长兼老师。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还携夫人杨开慧一道，前去看望毛宇居，并在他家吃了饭。毛宇居积极支持毛泽东从事的革命斗争，还教育自己的侄儿毛远耀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在毛震公祠，受到韶山群众的热烈欢迎。毛宇居主持了欢迎会并致词，他热情洋溢地道：“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说完，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走上讲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报告，热情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

毛泽东曾将一大网篮书籍和读书札记、信件等交给族人保管。反动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等地。族人怕这些东西落到反动派之手而遭祸，拿到韶山后山上焚烧。毛宇居得知了，深为痛惜，他急忙赶到后山，从火堆里抢出两本。一本是毛泽东在省立第一师范作的课堂记录（《讲堂录》），一本是他写了1.5万余字批语的《伦理学原理》。毛宇居将其珍藏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献给了国家，成了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珍贵文物。

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想挖掉毛泽东的祖坟，以断其“龙脉”。他们抓了毛宇居，还拷打他，让他指认毛泽东的祖坟。毛宇居虚与周旋，领大兵们到滴水洞龙头山上掘掉一座毛姓财主的祖坟，骗过了敌人，毛泽东的祖坟得以保存下来。

十年内战中，毛宇居和毛泽东失去联系，仍以教书为生。但他同情革命、关注毛泽东安危的思绪始终不移。他虽然无法和毛泽东联系，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国民党的报纸，仍能大体了解革命的形势。他的喜和忧，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挫折而交替着。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实现，他和毛泽东取得联系有了可

能。恰在此时，文运昌接到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信。毛宇居得知，兴奋异常。他终于可以和“年少英雄”的毛泽东通信了。1938年5月，毛宇居给毛泽东写信，特别提到毛泽东的至亲如弟媳周文楠、她的孩子毛楚雄以及孩子的外祖家在白色恐怖中躲西藏的艰险处境和生活的困难，也询问了侄儿毛远耀的情况。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信后，很是感激，很快给毛楚雄寄去一笔钱作生活费，并给毛宇居回了如上那封信。

毛宇居收到这封寄自延安的信后，自视珍贵。抗战胜利后，国共分裂，为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将其藏之于墙壁隙缝之中，得以保存下来，也是在解放后才上交给国家的。

1949年10月，毛宇居得知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心潮澎湃，高兴万分，以《导师颂》为题，作七律古诗10首，其中两首诗云：

其一

一领青山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
拔山立海翻天浪，斩草除根解逆流。
饥溺为心能得众，黔黎请命失同仇。
最难主义坚金石，百折不回气逾遒。

其二

思想行为自得师，开诚领导广推为。
成军百万皆精炼，立法三章更剑奇。
人道信心遵马列，谁知济众媲牟尼。
一腔铁血开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

毛宇居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连同诗作一起寄给毛泽东，以示祝贺。其时，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正在北京作客，毛泽东多次向他询问到毛宇居的情况。收到毛宇居的来信并诗，毛泽东满有兴趣地读完了那些诗后，便挥笔作复。

(二) 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安好 (1949.11.28)

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
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
辈人们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禹居，就是毛宇居。族名毛泽启，字先申，号宇居，亦作蕊珠、禹居，别号宋一子。在毛泽东的书信中，几名杂用。

这封信本来拟由毛泽连带回的，同一天因为毛泽东还给文南松写了一封信，便改由邮局寄发了。毛泽东在信封上写了“湖南湘潭黄龙区/清田乡韶山东茅塘/毛禹居先生/毛泽东”等字样。

这是解放后毛泽东写信给毛宇居的第一封信。从此以后，北京——韶山，书信往来，极是频繁。

毛泽东少年时有一同学兼好友邹普勋，邹的父亲邹春培，是一位塾师，毛泽东在其塾里受业。40多年了，毛泽东常常想起这位少年时代的好伙伴。毛泽连到北京时，毛泽东反复问及邹普勋的情况。毛泽连回到韶山后，将这些细节告诉了毛宇居。毛宇居听后，觉得主席如此关心乡民的生活，应该将乡中情况，如实告诉他，同时，毛宇居还特地了解了邹普勋的困难状况，一并写给毛泽东。

1950年5月28日，毛宇居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来信，毛宇

居一看就知道此信出于谁人之手：

(三) 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 (1950.5.15)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荷。即颂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

另纸，指毛泽东同时写给邹普勋的信，全文是：

普勋兄：

五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

按说，毛泽东在听取毛泽连的介绍和毛宇居来信的说明后，

是知道邹普勋的通讯地址的。可他写给邹普勋的信，却让毛宇居转交。事实上，毛泽东也知道毛宇居的住地蔡家塘与邹普勋的住地南岸的距离，但他信任毛宇居，让他代理其事。并且像委托代理人似的，“邹普勋如十分困难”请其代为接济，“容后由弟归还。”

这里有一句话必须一提，在此后毛泽东与毛宇居的交往中，毛宇居事实上成了毛泽东在韶山的代理人。

但亦有例外，即后面谈到的 1953 年 8 月 27 日，毛泽东给毛宇居的信，是由邹普勋代转的，这从毛泽东给邹普勋的信中可以反映出来：

普勋兄：

前后数信，均已收到。

托件办妥，甚慰。

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

致李漱清、毛禹居两位的信，烦便时转交为盼！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这是因为，给邹普勋写信时，恰好也给李、毛二位写了信，所以一并发去。从后面的事实看，毛泽东委托的事，还是主要由毛宇居来办。

毛宇居确实如信上所要求的这么作了。他即刻拿出自己不多的钱物接济邹普勋，并将毛泽东的信面交邹普勋，使邹普勋一家非常感激。

毛宇居忠实地履行了毛泽东在韶山代理人的义务。如 1951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托毛宇居一次就带给韶山故友谭熙春 200

万元（旧币），邹普勋 100 万元，堂叔母六婶 100 万元，邻居张四维和毛华珠衣料各 4 丈。

这些，毛宇居都不厌其烦一一送到。

毛泽东还嘱托毛宇居，把亲友的情况特别是遇到的困难，及时信告他。毛宇居不负重托，不到一年时间，就多次寄信给毛泽东介绍亲友的情况。

1951 年春，毛宇居又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

（四）轶事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1951.4.5）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

复颂

兴居佳胜！

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四月五日

从信的内容可见，毛泽东拒绝了毛宇居出版一本书的愿望。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作为堂兄和塾师，毛宇居对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学生生活和成长过程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他以满腔的热情搜集整理毛泽东青

少年时代的故事，仔细向韶山参观的中外友人介绍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事迹。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曾来韶山收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事迹，毛宇居向他提供了大量的口头资料，对他后来撰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帮助很大。

这期间，经湖南省委统战部介绍，毛宇居与唐家坵的文运昌一起，被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又改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毛宇居在向他人介绍毛泽东青少年事迹的同时，自己也动笔整理。1953年3月，毛宇居将他整理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轶事一文寄给毛泽东，请求发表。解放初期毛泽东对这一类宣传都非常谨慎。他看了毛宇居整理的文章后，将其退还，并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这就有了上面的信。

1951年9月，毛泽东派人到韶山，接塾师和堂兄毛宇居进京。应邀同行的还有外祖家老表文梅清、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张有成。9月23日抵达北京时，毛泽东已派车在火车站迎候。当晚，毛泽东留家乡客人在他住处共进晚餐，还将儿子岸青、女儿李敏、李讷叫到跟前，一一给他们介绍，说：“这是从韶山家乡来的，是你们的伯父，快行礼。”

毛泽东搀着毛宇居走进饭厅，歉意地说：“没有好菜吃，很是对不起。”毛宇居笑着说了句韶山俚语：“人意好，水也甜嘛。”

毛泽东请毛宇居坐上席。“不合适，不合适”，毛宇居连连摆手，诚惶诚恐地说：“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天地君亲师’，我乃一介百姓，使不得。”

毛泽东笑道：“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坐上席，是应该的。”“岂敢，岂敢！我愧为人师，主席主席，当然应该坐上席。”毛宇居还是不肯。

“那是在平日开会或出席重要宴会，今天是在我家里，我们都是韶山冲的。”毛泽东坚持要让毛宇居坐上席，说：“这里没有

外人，数你年纪最大，你应该坐上席。”

几番推让，毛泽东硬是让毛宇居坐了上席，他还念叨着《增广贤文》上的两句：“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毛泽东一边与客人拉家常，一连斟酒敬菜，询问家乡的有关情况。

毛泽东虽日理万机，仍不时抽出很多晚间和毛宇居叙谈，谈家乡和一些老人们过去发生的事情，谈他自己的读书生活，谈国民党挖他的祖坟……宾主谈笑自若，难舍难分，有时竟不知不觉到天明。

10月1日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毛宇居等人送去观礼证，请他们参加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出席国宴。随后，又派人陪他们游览北京名胜，还特意安排他们到天津等地参观。

天气渐冷，毛泽东还给每人买了一件皮大衣，一双皮鞋。他看到毛宇居牙齿不好，吃饭不便，便派秘书陪毛宇居到医院装了假牙。此外，又赠给毛宇居布料、眼镜、枕头、枕巾、衬衣、夹衣等，又送人民币150万元（旧币），并在含和堂前合影留念。还安排他们游览长城。毛宇居受到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

关于这次去北京的情况，在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58岁寿辰之日，毛宇居应韶山学校邀请，向全体师生作了旅京见闻报告，这里不妨引述于后：

“今后9月，我受毛主席邀请，曾去北京旅行，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感到格外的荣幸……此次我游北京，是毛主席亲自派员来接的。与我一道去的，还有主席的老表文梅清、幼年时的朋友张有成。我们三人同行，于9月18日从韶山招待所出发，到长沙乘火车，23日到达北京。初到北京站，主席即派人派车来迎接。我们随着接待人员到了中南海含和堂。片刻，主席由含和堂门内出来了。当时我们见了主席，真是无比欢欣和快慰。分别几十年了，我们有许多心里话要跟主席说，可千言万语不知从哪里说起。主席满面笑容，向我们走来，同我们握握手，问问安，

令人感到格外亲切。主席话语谦和，举止儒雅，那种谦恭的态度，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

“是晚，主席留我们在他的住处晚餐。席间主席很高兴地同我们拉家常，给我们斟酒，询问家乡的土改和干部情况，我们逐一告诉了主席。主席的记忆力很强，对家乡的许多老人和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还记得很清楚。主席身体健康，精神焕发。他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很朴素。他穿的还是一件旧外套，吃的也不尚鲜味。作为人民的领袖，生活如此俭朴，主席的品格真是无比崇高、伟大。

“我们见过主席后，就住在外面的招待所里。主席是日理万机，仍不时派汽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去，百忙中抽出时间同我们叙谈，为时多在晚间。至则谈笑自若，难舍难分，竟至天明。叙谈历年来的事务，谈到国民党政府没收他家的产业，挖掘他家的祖坟，主席都是宽大为怀，毫不计及，且曰：‘咯辈（方言，即他们）又奈我何？’可见主席的气量从容于一斑。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主席派人给我们送来观礼证，叫我们去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面笑容地向众人频频招手致意……我们在北京，主席还派人领我们游览故宫、天坛、博物馆、文化宫、颐和园等名胜地，游览万里长城。主席还安排我们参观了天津市容及天津物资交流市场……我们返湘时，主席叮嘱我们，要把这些材料带回去，把家乡建设好……”

1952年，毛泽连的母亲病故，这之前，他自己在一次垦荒中也从山坎上跌了下来，成了重伤，毛泽连将这些情况都写信告诉了“主席三哥”。另外，张有成从北京回来后，也写了封信给毛泽东，反映乡下“粮亏猪贱”，而且还禁酒，连酒都喝不上一口。这些不大不小的事，都让毛泽东十分记挂。掌握情况是制定政策的依据，要掌握情况就必须进行社会调查，亲朋故旧的来信

来访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一个社会调查的途径。性其因为是亲友，讲起话来往往少顾虑，言一般人之不能言，不敢言。毛泽东连的困难，从国家来说，算不得大事，但从他一人一家来说，又是天大的事。况且群众有难，作为族兄的“主席三哥”，也无袖手旁观之理。把人民的冷暖挂在心间，是毛泽东一贯的作风。至于张有成反映的“粮亏猪贱”禁酒等问题就属于农业政策等方面的大问题了，它直接牵扯到数亿农民的利益。为了弄清情况毛泽东特致信毛宇居，请他代为调查。

(五) 风便望将乡情赐告 (1952.7.11)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邵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东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邵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主席的信任，毛宇居岂能辜负？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毛宇居去东茅塘了解了毛泽连一家的生活情况，将实情告诉了毛泽东。同时，这一年，毛泽东的另一位堂弟毛泽荣多次写信给“主席三哥”，反映家中情况，并要求晋京。对于这些乡中琐务，毛泽东又写了封信给毛宇居，让他代为处理。

(六)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 (1952.10.2)

宇居兄：

李邵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诉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逸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信里提到的“李邹”，李即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老师，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邹即前面提到的邹普勋，和毛泽东幼时既是同窗，又是邻居。上信已经谈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可见毛泽东对了解乡间情况的重视。书信再长，反映的情况终究有限。所以，毛泽东除委托毛宇居经常反映情况外，又特别邀请两位亲友专门进京。东十分关注。

毛宇居代毛泽东办理的椿椿乡亲事务，很得乡亲们欢迎，也深为乡亲们敬重。在韶山一传十，十传百，毛宇居家成了“乡务代办站”。亲友们都想托毛宇居给毛泽东捎个信，办点事，就连当地政府亦是如此。

1952年冬，韶山村第三村校准备迁址扩建。

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建好韶山小学，不仅仅是韶山村清田乡的大事，甚至也是湖南省的一件大事。为此，湖南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以为资助。正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韶山人民希望毛泽东主席能给这所学校题写校名。

这个任务自然落在毛宇居身上。

1952年11月10日，毛宇居风尘仆仆来到北京。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接待了这位第二次来京的韶山“代理人”。就韶山建校一事，毛宇居作了详细汇报。

“学校建在哪里？”

“建在张家山，规模比原来要大，新校舍是请有关专家设计的，又大又美观。”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连连说：“那里好，那里好，以后学校规模可以扩大。”

毛宇居见主席谈兴甚好，心里对所要办的事情有了很大的把握，不觉喜上眉梢，便趁着兴致，提出请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欣然应允。

“写什么好呢？”毛泽东问毛宇居。

毛宇居说：“我们只是办小学，就写‘韶山小学’吧！”

“为什么硬要叫小学呢？将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嘛！还是叫‘韶山学校’好，这样一次不就写全了？”

于是染墨挥笔，一气写就几张“韶山学校”校名，供毛宇居选择。

毛宇居这次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设宴招待，这在毛泽东的客人中，是不多见的，或者这中间也有答谢这位“宇居大哥”平日代理之劳的成分在内。有一次，毛泽东陪毛宇居吃饭，饭食颇为丰盛。饭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毛宇居说：“今晚，我们回韶山去。”

“回韶山？今晚？”毛宇居以为听错了，既惊且喜地问着毛泽东。

“嗯，回韶山。”毛泽东笑着说：“回韶山看看你自己吧。”

毛宇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思量了半天，仍不解其意。他随着毛泽东来到住处的大厅里，里面已拉起了银幕。

毛泽东和毛宇居坐下不久，电影放映机就转动了。在欢乐的音乐声中，银幕上跳出几个字：《解放了的中国》。

毛宇居认真地观看。不久，韶山出现了，他自己也在银幕上说笑。毛宇居的那种紧张、兴奋、幸福，是无以言状的。他这才明白主席刚才说的那些话，不禁笑出了声。

“怎么样，看到你自己了吧？”毛泽东笑着问毛宇居。

“不但看到了，我们也回到了韶山哩。”

两人会心地笑了。

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是与苏联合拍的，影片的大部分外景拍自韶山，里面毛宇居的镜头也有不少。

回到招待所，毛宇居兴奋之情不减，遂作诗一首：

银幕一开画来传，老大笑貌及苏联。

从今四海为家日，几度观光及壮然。

由于《解放了的中国》在全国放映，毛宇居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不少客人来韶山后，都想见一见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老师，听听他对毛泽东的介绍。对于这些来访的中外客人，毛宇居特别的欣慰、高兴，并热情而详细地向客人们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1953年，在他72岁高龄的寿诞时，特地写了两首诗：

南岸茅庐主席家，风光犹是朴无华。

往来过客人言籍，此地频开革命花。

有询先世事如何，木石居今击壤歌。

积越流光越时代，发扬光大起山河。

韶山的一些乡亲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民生活和公粮收购等方面的问题。“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影响人民生活、国家建设、社会稳定的大问题。1952和1953两年，粮食形势非常严峻，虽然粮食增产，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但粮食需求量大幅度上升。这只能用多收购的办法解决。农民手里留粮少了，意见很大。

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尽管毛宇居已72岁，而且从北京回来后还病过两场，毛泽东还是委托他代为了了解粮食问题上发生的矛盾，1953年8月27日，给毛宇居写来一信。

(七) 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1953.8.27)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

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

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
望告一二。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毛宇居接信后，作了十分认真的了解工作，然后将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调查地方上的各种情况，不是直接插手地方政府的事务。而是“收集资料以供参考”，他说：“地方事，我只愿收集资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理。”这次根据对乡村粮食问题的调查，中央很快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虽然这不是理想的措施，但却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1956年春天，毛宇居的堂弟毛纯珠（泽田）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临行前，毛宇居修书一封，托毛纯珠转交主席。毛泽东看了信，知道毛宇居的美意，遂回信一封，请毛纯珠带回。不过，这次毛泽东再也没有托办什么事情了，只是问好祝福。因为此时毛宇居已经75岁，且身体不佳，时有病痛缠身，毛泽东不便再托他进行乡请调查等颇费力劳神的事。

（八）有祝兴居康吉（1956.4.20）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今借纯珠之便，敬致问候之意。有祝兴居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会见毛纯珠时，详细询问了毛宇居的身体状况，听完毛纯珠的介绍，毛泽东很是感慨。仍然生活在韶山乡下的诸亲友中，毛宇居是文化素养最高也最具政治头脑的兄长，且有师生之谊。现在，这位族兄塾师早已是古稀之年，且身体欠佳，毛泽东如何能不感慨。

不过，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1958年的9月初，77岁高龄的毛宇居又出现在毛泽东的客厅里。

此年正值“大跃进”，湘潭大学在全县人民的支持下即将创办。毛宇居受中共湘潭县委的委托，再次专程赴京，请毛泽东为大学题写校名。

“大学办在哪里？”毛泽东关切地问。

“办在杨家桥原湘江煤矿旧址。”

毛泽东好像知道这个地方，说：“那是一个山冲里，哪来的学生呢？”

接着，毛宇居便详细地向主席汇报了办校的筹备情况和来意。毛泽东也询问了筹备中的有关许多问题后，说：“近年来，许多人求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给你们写了，他们不会有意见吗？”

毛宇居笑着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东山学校那一张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没有意见了吗？”

毛泽东笑了笑，答应了。

几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毛宇居下榻的和平宾馆看望先生，并送来一封信。

(九) 校名两纸，请转致选用为盼 (1958.9.10)

宇居兄：

遵照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两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烦转致。

毛泽东

九月十日

信后面附的是几纸校牌题字，毛泽东在他自认为写得还满意的右角打了个小圈，供其选用时参考。而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宇居兄”的最后一封。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了32年之久的故乡韶山。他一回到韶山，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要把我大哥接来。”在韶山松山宾馆一号楼，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毛宇居夫妇，并与他们夫妇及女儿一起照了相。毛泽东还挽着毛宇居的手，并肩走在田间小路上，察看水稻长势。年近80的毛宇居手执蒲扇，皓然长须，颇有乡间文士风度。晚上，毛泽东设便宴招待父老乡亲，特意将毛宇居安排在自己一桌。大家坐定后，不大喝酒的毛泽东端起满满一杯酒，走到毛宇居身边敬酒。毛宇居连忙起身相迎，并感激地说道：“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爽朗地答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这敬酒的事，而今已成一则佳话。

5年之后，毛宇居在故土仙逝，享年83岁。

二、家境困难，将略作帮助 ——致毛泽连

(一) 家境困难、将略作帮助 (1951.12.11)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

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长沙住得太久。

泽连家境困难，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

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毛泽东的堂兄弟、族兄弟有几十人之多，从血缘关系来说，毛泽东和毛泽连以及下面提到的毛泽荣关系最近。他们的曾祖父都是毛祖人；他们的祖父（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毛泽连、毛泽

荣的祖父毛恩农)是同胞兄弟。

其中毛泽连和毛泽东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即毛泽连的胞姐毛泽建过继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作女儿,是毛泽东的继妹。毛泽连称毛泽东为三哥,毛泽东称毛泽连为九弟。

毛泽建 1929 年牺牲后,毛泽东非常关心烈士的家人。

信里提到的“慰生六婶”是毛泽连的母亲。毛远悌是毛泽东的远房侄儿,其祖父毛贻训,是毛泽东少年时的塾师,对毛泽东非常器重。

毛泽连是毛泽东所有的亲戚(外祖家、本族、姻亲、岳母家)中最先到北京看望毛泽东的一位。

原因很偶然。

湘潭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138 师师长任昌辉派人去韶山打听毛泽东亲属的下落,首先见到了毛泽连。当任昌辉得知毛泽连是毛泽东的堂弟后,高兴地安排他去北京。

于是毛泽连和毛泽东的表弟李轲成了韶山第一批去北京的客人。他俩由四野派人护送专程到北京看望 20 多年没见过面的哥哥。

当秘书叶子龙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批阅文件的毛泽东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

“来客人了?韶山来的?”毛泽东有几分惊喜的问道:“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都谁来了?”毛泽东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几十年了,他一直没有回过韶山,他也想念家乡,想念那里的亲人呵!

叶子龙回答说:“客人是昨天到北京的,据介绍,一个是您的堂弟毛泽连,一个是您的堂表弟,姓李。”

“呵,是九弟润发(毛泽连字润发)来了!”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太好了。”他随即起身,在屋内高兴地来回走着,似乎几天来的疲倦一扫而光。

分隔 20 多年的兄弟相见，那情景是无需赘述的。毛泽东是主席，是领袖，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对于故乡的眷恋，对于亲人的思念，他和普通人不会有两样。

“好啊，你们来了，几十年不见面了，我想你们，也想念家乡啊！”

“主席三哥，我这次和表弟一同来京，是代表家乡人民来看望您的。”“好！好！你们是什么时候从韶山动身的？”

“9 月份就动身了，在路上走了 20 多天呐。”李轲说。

毛泽东听后有几分诧异：“怎么走了这么久？”

毛泽连就从四野派人寻找开始，将来京的前前后后情况告诉了毛泽东。

听着毛泽连的叙述，毛泽东总是乐呵呵的，对“四野”的同志也多有谢词。但还是有几分解地问道：“不应该走这么久吧？”

原来，毛泽连一行到达武汉后，湖北省委的同志说：“只有几天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主席肯定很忙，这时不便去打扰他。你们先在武汉住下，等开国大典一过，再送你们去北京。”

于是，他们就在武汉住下，过了开国大典，才来北京。

毛泽连在 30 年代就患眼疾，由于穷困，没钱医治，久而久之，几乎完全失明。

一见面，毛泽东就发现了，谈话中几次关切地问毛泽连视力的情况。因为他几近失明，所以在中南海的那些日子，毛泽东专门派人照顾他的起居饮食。李敏、李纳虽然年纪还小，也由爸爸吩咐，经常扶持这位叔父。

毛泽东还派毛岸英、秘书田家英送他到北京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去治眼疾。

因为眼疾严重，需要手术，住院时间一长，毛泽连就着急了，他这个辛劳了大半辈子的朴实农民享不了这份“清福”，待

病情稍有好转，就急着要出院。医生不同意，转告毛泽东。毛泽东打来电话劝阻，毛泽连只好耐着性子住下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毛泽连的视力有了恢复。

毛泽连和李轲在北京住了将近两个月，兄弟们多次相聚谈心，感情非常融洽。

临别，毛泽东叮嘱：“九弟，回去以后，如有困难，不要去麻烦政府，你的困难我知道，我今后如能帮你接济点就接济一点。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带个好头，不能大事小事都去找政府。”

毛泽连牢记主席三哥的话。

毛泽连去北京的事，轰动了韶山，中共湘潭县委也很快知道了。县委主动上门，将毛泽连的母亲送往县医院，后又转往著名的长沙湘雅医院。但老人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

为母医病心切，毛泽连便与在长沙工作的远房侄儿毛远悌商量，由毛远悌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将母亲送北京治病，毛远悌也顺便提出上北京学习的要求。

没过多久，毛泽连、毛远悌就收到了上面的回信。

从回信看，毛泽东对亲属的要求十分严格。

不仅“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完病立即回韶山为好。理由是“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

严格是严格，但毛泽东绝不是坐视亲友的困难而不顾，信中明确表示“设法略作帮助。”

不久，毛泽东就从稿费中拿出200万元（旧币）寄给毛泽连助他母亲治病。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当“慰生六婶”知道钱是毛泽东寄来的，感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连听从主席三哥的话，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韶山。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母亲病情有所好转时，毛泽连因为视力

不佳，在一次垦荒时，从山坡上跌落下来，摔伤腿脚躺在床上，连动弹都很困难。

他是全家唯一的壮劳力，当时几个孩子尚小。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1952年5月8日，毛泽连又给主席三哥写了信，诉说了自己的困难处境，要求进京诊病。

毛泽连的处境值得同情，因为他是毛泽东诸亲友中最困难的一个。

还在1950年，表兄文梅清等进京看望毛泽东，叙谈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到毛泽连的困难，当时，他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3个孩子，眼睛又不好，家底又薄，大家认为毛泽东的亲属中要数毛泽连最困难。毛泽东听了，亲切而认真地说：“泽连的困难我晓得，也不光只泽连一个人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会尽力资助点。”

毛泽东收到来信，很快写了回信。

（二）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1952.6.23）

润发贤弟：

五月八日的信收到。

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诊得好。

此复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毛泽连读罢来信，将它悄悄藏了起来。他能理解作为领袖的主席三哥。

不久，毛泽连的母亲病故。毛泽连的父亲早逝，是母亲含辛茹苦，带大了这一家人。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如今连下葬的费用都没有，自己又重伤在床，真有点走投无路了。

万般无奈，毛泽连又给主席三哥写了封信，告诉他母亲病故等艰难情形。

很快，毛泽东寄来 300 万元（旧币），是托毛宇居转交的。说明“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

在毛泽连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不要他去找政府，为国家增加负担，但自己却送来了及时雨。

毛泽连就用这些主席三哥个人拿出来的钱，安葬了母亲，医好了腿伤。在困难的时候，他挺过来了，没有去麻烦政府。

对于堂弟的行为，毛泽东很是赞赏：“泽连要算带了好头，我的亲戚们都应该向他看齐。”

毛泽东对亲友们既有严格要求，也有亲切关怀。他不让亲友们享受特权，不要他们去增加政府的负担，但却不断地把温暖送到他们那里。

就以毛泽连为例，毛泽东对他的困难处境极为关心和同情。此后，他经常了解毛泽连的情况，并从自己的稿费中开支，委托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连续 10 年给毛泽连寄钱，每次 200 万元、300 万元不等，帮助他渡过困难，直到湘潭县民政局把毛泽连作为烈属予以抚恤为止。

到了 70 年代，毛泽东年纪大了，各方面开支都很大，在接济亲友这一点上，有些力不从心了。在给亲友的信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一点吧！”

毛泽东这句缺少力度的话，包含了几十年对亲友的何等深厚

情谊！

几十年来，毛泽东从个人的收人中周济的亲戚、师友、同学以及师友的后代，多得难以计数。

封封书信，笔笔款项，件件赠品，形成一条强大的纽带，把领袖和亲友的真情紧紧连在一起。乡亲们的一切都萦系在这位韶山赤子的心头，他向亲友们献出了全部的爱。

如果不是到了说“我老了”这样的最后时候，毛泽东是绝不会这么说的，他会一如往昔地自己掏腰包为亲友们排忧解难。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他的故乡韶山，并在松山宾馆设宴招待父老乡亲们。毛泽连也接到了通知。宴会后，毛泽东与毛泽连夫妇以及乡亲们合影留念。

在毛泽东的亲友中，毛泽连是去北京次数最多的一个，共11次。毛泽东十分挂念这位堂兄弟，但又不利用手中权力为他解决个人问题。

三、有困难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致毛泽荣

(一) 你有眼病，路上不便，似不必来京看我
(1953.5.2)

泽荣贤弟：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

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前面说过，毛泽东的堂兄弟中，要数毛泽连和毛泽荣的血缘关系最近。

毛泽荣，有时也作泽嵘，小名逊五，有时也写作宋五，胜五，生于1897年5月26日，比毛泽东小4岁。两人从小经常在一起放牛打柴。毛泽荣的勤劳、活泼、梗直的性格，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正是血气方刚之

年的毛泽荣在三哥毛泽东的动员下，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抓土豪，开展平粜活动，并担任农民协会通讯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追捕。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被迫逃到华容、沅江等地，改名毛冬青，在湖区种田谋生。这种苦熬苦度的生活，一共有10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合作，毛泽荣虽然得以回到老家韶山，但他家原在韶山的房子已被他人变卖，无家可归了。毛泽荣无奈，只好投奔杨林外祖父家。以种田为生，艰难度日，直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

9月，毛泽荣的堂兄“九弟”毛泽连和姨表弟李轲到北京后，毛泽东向他们询问毛泽荣一家的情况，毛泽连即将毛泽荣的家庭困境如实相告：

“主席三哥，五哥的情况真是蛮不好呀，他和堂客李顺芝的眼睛都不太好，身边只有一个养女，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连饭都吃不饱，苦不堪言哩。”

毛泽东听了介绍，很同情这位性子耿直的五弟，便备了衣料，托毛泽连和李轲转交。怕有误，毛泽东单独写了个便条：

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毛泽东

时间是1949年11月28日。

毛泽荣收到衣料和毛泽连带来的问候之意，激动万分。

毛泽荣一家如此艰难，很希望得到主席三哥的照顾，也热切希望见见分别了20多年的哥哥。于是一连给毛泽东写了好几封信。

毛泽东知道了毛泽荣的困难，于1952年10月给他寄来200万元（旧币）。

毛泽东的赠款，无疑是雪中送炭。感激之中，毛泽荣托人给毛泽东带去茶叶、火焙鱼等家乡特产，并又一次提出进京的要求。

于是，毛泽东有了上面的回信。

那边毛泽荣迫不及待地要求进京相见，这边毛泽东也是手足情长，对于毛泽荣的困难以及他的心境也是十分关切和理解。他虽然在5月2日回信给五弟“不必来京”，其实他更主要是担心五弟“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不久，当毛泽东得知路上有人陪伴照顾这位族弟时，他便改变了主意。

1953年10月2日，表侄文九明要求进京面陈乡情。毛泽东同意了他来京。毛泽东在1953年10月25日给文九明回信时，特别提到了毛泽荣进京的事，要文九明找毛泽荣一路同来。

文九明收到来信，来到杨林，通知毛泽荣作好进京的准备。

毛泽荣盼望多年的心愿快要实现了，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

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毛泽荣和文九明于11月上旬到达北京。

当一身风尘满脸喜悦的毛泽荣出现在中南海丰泽园客厅时，毛泽东紧紧握着毛泽荣的手说：

“你好呀，逊五老弟！”

“还好还好，三哥你好吧？几十年不见了，这世道真难啊！”毛泽荣说着，泪水从眼眶中掉下来。

毛泽东很动情，他安慰这位逊五弟：

“这不又见面了，世道今后会慢慢好起来的。”

毛泽东招待客人吃饭。

是个普通的餐厅，餐桌上放着一碟花生米、一碗青菜、一个汤，最好的一个菜是腊肉。看来毛泽荣是无法吃到山珍海味了。坐在饭桌上，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地问：“三哥，你当了堂堂一国主席，平时就吃这么一点菜？”

毛泽东有几分新奇地说：“怎么？你怀疑我不把好吃的拿出

来？”

“那倒不是，”毛泽荣连忙分辩说：“我只是想，你要想的事多，不吃好一点，身体弄坏了就麻烦了。”

毛泽东笑着说：“我这不是有蛮好的身体嘛！”

毛泽荣朝三哥再望了一眼，确实觉得他的身体是蛮好，红光满面。“这是贵人福相呢。”毛泽荣心里暗暗地说。

吃着饭，毛泽荣突然感到有什么不对，问道：“主席呀，江青嫂子到哪里去了？怎么冒看到吃饭呢？”

毛泽东告诉他，江青生病住院了。

“见得到不？”毛泽东 1925 年偕夫人杨开慧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住了半年，杨开慧的贤淑温柔，毛泽荣记忆犹新，因而他也想见一见这位嫂子。

“见得到。”毛泽东回答说。“只是你这眼睛，只怕到了嫂子跟前也看不太清哟。”

毛泽荣为眼病也确实为难，虽然来之前的几个月在湘潭城里也诊了一个阶段，但到底效果不是太显著。

第二天，毛泽东派秘书陪毛泽荣去北京同仁医院检查眼睛。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告诉他们，今天晚上一起去看江青嫂子。

到了医院，毛泽东把江青介绍给毛泽荣等。

“两位好”。江青点了点头，客气地说道，但她并没有起身。

回来的路上，毛泽荣一声不吭。江青不冷不热的态度，使他的情绪大大地受到损害，很有些扫兴。毛泽东似乎看出了毛泽荣的心思，轻声地说了一句：“逊五，她就是这个脾气，她到底也是毛家的媳妇嘛。”

毛泽荣要回韶山了，毛泽东特地派秘书带着裁缝到招待所给他量了身材，做了一身单衣、单裤、棉衣、棉裤和一件大衣。还送了一套棉被、蚊帐，一口棕色皮箱，另外还有 300 万元（旧

币)人民币。

毛泽荣欢天喜地地回到了韶山。

虽然在医院见江青的时候，毛泽荣有点不快，但感到她毕竟是主席三哥的夫人，自己的嫂嫂，还是应该尊敬的。而且，在北京，还见到了李敏、李讷这几个孩子，她们对这位“五叔”都很尊重。所以毛泽荣回到韶山以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信，除了按毛泽东的要求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和农民的情绪以外，还特别提到“江青嫂嫂”，表现了对她的十分关心和敬重。信里也提到了李敏、李讷两个晚辈。

于是，毛泽东写了回信。

(二) 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1954.6.24)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四日

毛泽东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他经常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出搞调查，甚至他身边的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时候，他往往也要交给他们调查研究的任务，这已经形成了传统。

毛泽东把和亲友们相见，看成是调查研究，了解社会实情的绝好机会。

所以几乎每次会见家乡来的亲友，他都特别注意听取他们对于政府工作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特别是批评方面的意见，他更是鼓励乡亲们畅所欲言。

对于生性耿直的毛泽荣，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时就反复嘱咐，要他回去后注意收集乡下农民对党的政策和政府工作方面的反映，及时向他报告。

毛泽荣牢记主席三哥的吩咐。1954年下半年，毛泽荣感到乡下缺粮问题严重，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面陈意见。

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收到毛泽荣的信后，立即写了回信。

(三) 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以助日用 (1954.12.18)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

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北〈此〉住一个月回家。

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以助日用。顺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1955年春节过后，毛泽荣和毛仙梅来到了北京，先后来北

京的还有文炳璋和陈国生，以及陈国生的女儿陈锋。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家乡客人。席上有一碗肥腻腻的红烧肉，毛泽东很喜欢吃。

毛泽荣见了笑道：“主席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弄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听毛泽荣这么一说，很有些得意，连声说：“那好，那好！”但略一停顿后便问：“你们现在的条件好些了吗？是不是能经常吃到肉了？”

这一问，满桌客人黯然，大家半天没有作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毛泽东也感到纳闷，刚才还谈笑有声，怎么一下子就锁嘴呢？

耿直的毛泽荣说：“莫说是吃肉，好多人家连饭都冒得吃，还在饿肚子哩！”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倏然消失了。关切地问道：“是真的吗？不是已经搞了互助合作社，又听说都增产增收了吗？解放也这么多年了，怎么连饭都冒得吃呢？！”

毛泽荣和毛仙梅告诉毛泽东，这几年，家乡人民搞互助合作，确实干得热火朝天，大多数的农户也确实增产增收了。但是，干部说，中央来了文件，为了保护什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保证国家的工业化的实行，粮食要实行统购统销，除每人每天的1斤定量粮外，其余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很多农户吃粮没有计划，所以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韶山总有三四成人没有饭吃。

听了毛泽荣和毛仙梅的介绍，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充满内疚地说：“让乡亲们受苦了，可我调查的结果没有这么严重，看来我还是个十足的官僚主义，只有你们才肯对我讲真话啊！”

毛泽东除了表示内疚和自责之外，立即让秘书打电话，把在

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找来，听取毛泽荣他们的乡情介绍。

没过多久时间，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宋庆龄、彭真等人都来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我家乡来的几位客人，今天特意请你们几位来，想让大家了解了解情况。”

入座后，自由式的谈话也就开始了。

周恩来似乎对毛泽荣的耿直话更感兴趣。他有些焦急地问：“毛泽荣你说说看，农村每人1斤，城市也是每人1斤，大体一样，农村如何就差了那么多的粮呢？”

“报告总理，农村每人1斤，一餐就吃掉了，怎么会不少呢，再则农村里干的是什活，城里人走的是什道，那是一马平川，不需要爬山费力。”毛泽荣侃侃地说。

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我们礼拜天，每人也只吃两顿饭。”

“吃不饱可就做不得事哟。我到北京来后每餐吃两碗饭，还要吃一个大馒头，还不够。城里就是不一样，还有副食买，当然也就够了，不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了。”

“好，好！泽荣你莫讲了，”毛泽东接过话头说：“这个事情，我们开会再研究。”

一直坐在一旁细心地听着他们讲话的刘少奇这时对毛泽荣说：“等过了两天，我想再找你们谈谈，你讲的都是实在的吗？”

毛泽荣十分肯定地点头说：“都是实话，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

在毛泽荣等乡亲和毛泽东的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询问教师、复员军人等的生活状况时，有人作了不实事求是的回答。毛泽荣在一边沉不住气了，他是个直肠子人，听不得渗水份的话，便赌气站了起来说：“主席，我还要来一次，我还有话要跟你

说。”

毛泽东自然知道毛泽荣话中有话，便爽快地说：“好。”

“三哥，你千万莫听恭维话呵，有些人只拣好听的说，这个要不得呀！”

毛泽东点了点头，鼓励毛泽荣继续说下去。

“就说农村教师、转业军人吧，他们也一样的困难，有些当教师的，脚上泥巴糊涂就进了教室。冒办法呀，要种点东西补助补助才能撑个半饱呀！”毛泽荣也不管三哥在听没听，按着自己的想法，一路说了下去。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问两句。后来，毛泽东就农村合作化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征求了毛泽荣的看法。兄弟二人谈话之间，中南海里已经华灯初上，他们这才抄近路往菊香书屋走去。

“五弟呀，”快进门时，毛泽东充满期望地说：“你是个直人子，说的都是老实话，你今后要多跟我讲些乡里的情况呵，你不会写信，你就请人写。我现在是高高在上，需要听一听来自乡下的意见和呼声呵。只是有一条，你反映的情况，必须是真话，这条记住了。”

毛泽荣感到了三哥的信任，从这次回去以后，毛泽荣将其“反映问题”的嘱托看得更重了，常常主动地请人代笔，为主席三哥反映农村的各种情况。

毛泽东和几位亲友的这次谈话，导致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完善。本来，统购统销政策是粮食形势非常严峻状况下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陈云在1953年的全国粮食会议上，曾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泽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统购统销的最大弊端就是农民失去了自主处理粮食的权力，这必然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个重大打击。但不实行统购统销，国家

控制不了粮食市场，粮价一波动，不但城里人吃饭大成问题，连物价也难以稳定。以国家和人民当时的经济实力，物价一波动，很难承受。两害相权取起轻，只有统购统销一途，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全国大局出发，人民对此是理解的。但实行统购统销的最初两年（1953、1954年），普遍出现了强迫征粮和征过头粮的现象，这就使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毛泽荣等反映的，正是这种现象。

这次谈话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5年3月3日发出《紧急指示》决定缩减55年度粮食征购数字，由930亿斤减为870亿斤，给农民多留些粮食。此外，又决定在全国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制度，在春耕开始前，确定一乡的粮食产量、定购数量，向农民宣布，使农民大体知道今年应卖给国家多少粮食，自己留下多少粮食，以稳定农民情绪。毛泽东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一般为实产的90—95%），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吃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要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三定”获得农民的拥护，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是农民放心也安定了。

因有了“三定”，统购统销实行30年，但没出大问题。

（四）顺祝健康（1956.4.20）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可以看到，这一天，毛泽东给韶山的三位亲戚写了信，即堂兄毛宇居（泽启）、堂弟毛华珠（泽田）和堂弟毛泽荣。

可见毛泽东是何等重视兄弟情义。

前面说过，毛泽东曾一再嘱托毛泽荣如实反映农民的要求、意见和农村的情况。毛泽荣不负重托，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1955年还和几个亲友一道应邀赴京，当面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农村情况。这次，当毛泽荣再次要求赴京面陈时，毛泽东怎不叫他去了呢？

这主要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毛泽东太忙了。

1956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一年，国际国内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夜以继日，忙着处理国家大事，实在没有工夫会见从家乡来的亲友。特别是象毛泽荣这样血缘关系较近的亲戚，一来北京，就不是住上一两天就走的。

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忙着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这一年，加速合作化群众运动的浪潮，象海啸一样席卷中国大地，合作化骤然完成。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达到高潮并急速完成。毛泽东忙于处理三大改造高潮的问题。

这一年春天，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不分黑天白昼，召集34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汇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各种矛盾。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即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听取汇报、研讨问题。经过紧张的研究思索，形成了一篇光辉的著作《论十大关系》，并于5月20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这是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力作。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大会。毛泽东拿出许多时间、精力去筹备这次代表大会。

三大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出现了一系列急需处理的问题，也需要毛泽东拿出许多时间和精力。

这一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开始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认真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是这期间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

这一年，由于长期矛盾的积累等原因，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激化，先后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大的动荡和思想混乱。

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事件和问题，毛泽东不能不占去很大精力。这一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两篇很有分量的长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二文中的观点，主要来自毛泽东。

仅举出上面这些大事，就知道毛泽东忙到何种程度。

从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信里为什么对毛泽荣说“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事实上，毛泽东在写此信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紧张地开会，集中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十种关系和《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1957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毛泽荣向上面反映的一些材料中，有的被认为是“替右派分子开脱罪责”的。这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毛泽荣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他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在政治上已被列入不可靠的那一类人里面去了。

这几年，因为毛泽荣在乡下讲公道话，吃了不少亏。

更让他百思不解的是，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韶山，请了那么多的人在松山宾馆吃饭、照相，就是没请他毛泽荣。

虽然出面阻拦他去见毛泽东的是韶山的地方政府，但毛泽东此时如何想？因为这次宴会，韶山公社没有让被划为富农的毛华珠（毛泽东堂弟）参加，毛泽东还生了气，特地派人把他找来参加宴会、照相。

毛泽荣以为是主席三哥怪罪他替“右派”说情而不愿见面了。

在“大跃进”中，主要由于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渡过难关，毛泽东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组织了几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这使得一度万马齐喑的局面有所变化，政治气候亦有所缓和。

于是，1962年冬天，毛泽荣又一次得到了进京看望毛泽东的机会。

当兄弟二人见面时，毛泽荣没有称呼“三哥”，而是恭恭敬敬地称了声“主席”。

毛泽东或许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仍然热情地将毛泽荣让进客厅，希望像前几次一样，再听听这位乡下农民亲戚的直言。

然而，此时的毛泽荣，讲话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他只是讲了自己的困难：“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又不大好，身边又无儿女，我实在有困难呵。”

听罢毛泽荣诉苦，毛泽东温和地说：“泽荣，你有困难，我是知道的。我理解，也同情。但是，我是党的主席，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

毛泽荣默然。

毛泽东继续说：“目前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过

紧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呵！”

毛泽东的心情显然沉重，他接着说：“过去，我们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对不起人民呵！但是，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毛泽荣只是默默地听着。他没有插言，也不想插言，也插不进言。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着这么多的困难，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同甘共苦，这个，你也不能例外呀！”

毛泽荣点了点头。

“苦日子苦到什么程度，我也知道，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地人民过得去，你也过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说到这里，毛泽东特别叮嘱道：“你是我的亲戚，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

毛泽荣听了，心里是不高兴的。但“主席”的话句句说在理上，又似乎无话可说。

在毛泽荣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叫秘书用自己的稿费为毛泽荣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另外，还送给了他 200 元钱。不过，毛泽东也让他给杨林公社带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后毛泽荣来京，要经过我的同意。”

这以后，毛泽荣一直在家种田。他几次提出过要去北京见主席，但均未获准。1968 年，毛泽荣去北京一次，也未见着毛泽东，只得怏怏不乐而返。这事在外人看来，好像毛泽东已彻底地把这位“五弟”给忘记了。

其实不然。因为自 1962 年以后兄弟虽然未见过面，但毛泽东总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毛泽荣寄钱，而且每次都在 200 元左右。毛泽荣在收到这些钱时，心情总是激动的。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了，这件让世界震惊的事件，同样也给毛泽东以深沉的打击和刺痛，老态明显增加了，而且病

魔不时地折磨着他。这以后，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有时甚至休克。

记得那一次严重休克被紧急抢救过来后，毛泽东自知来日无多，他将前去探视的李敏喊到跟前，饱含深情地对她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只得你们去做了，家里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今后要经常去看看他们。”

毛泽东似乎办完了一件大事，闭上眼睛，好像又是睡着了。过了一会，突然又睁开眼睛说：“他们想来看我，就让他们来吧！”

“他们”指谁？工作人员一时无法明白。但这中间肯定包括了杨开智、毛泽连和毛泽荣。

或者，兄弟之间心灵上有什么感应吧，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红墙外的毛泽荣正在公社恳求着负责人让他进京面见毛主席。

“你们还是让我去一次吧。”毛泽荣的声音已经很苍老了：“你看我已是75岁的年龄了，身体又不好，再则毛主席也是79岁的高龄了，也不知道身体状况怎么样，万一我们兄弟之间有一个三长两短，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公社负责人被这话感动了，他们理解毛泽荣的心情，终于开具了介绍信，让他去一趟北京。

这是兄弟俩最后一次会见。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心境和以前大不相同。自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5年了。那些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有的被打倒了，悲惨地死去，有的被放逐了，有的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支撑着危局，心力交瘁。而一度被他信任、倚重、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却背叛了他，阴谋发动政变，乃至败露，又仓皇出逃，机毁人亡，谁是可以信赖的呢？他感到的是人生的几许凄寒。“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文革”初期那种风雷激物凌云壮志，被一种被人敬而远之的冷落感所取代。“怎么连乡亲们都

不来看我了呢？”他多次问过自己，问过女儿李讷，问过秘书张玉凤，也问过护士孟锦云。

1966年，毛泽东第二次到了韶山，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像1959年那样，走到群众中去，而是冷清地呆在距韶山冲故居四五华里的滴水洞。他正在酝酿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

这以后，他就很少见到乡亲们了。

“文化大革命”中，堂弟毛泽连来过，毛泽东没有见他；堂弟媳张玉莲来过，毛泽东没有见她；“外甥女”陈国生、侄儿媳韩谨行来过，毛泽东都没有召见。就连几十年的密友、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1967年那次要求晋见，毛泽东都未予同意。是因为太忙吗？

建国初期也忙呀，为什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安排出了时间呢？是因为不愿让这些亲友们卷入到派系斗争中去吗（“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亲戚去北京大多是代表一级红卫兵组织送“材料”，连周世钊也是如此）？可自己不是要求这场运动要触及每个人的思想灵魂吗？谁都无法回答自己。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的《枯树赋》的吟咏，不止一次地诉出了毛泽东的暮年之慨。落叶归根呵，然而，家在何处，人在何处呢？

终于，毛泽荣来了。

毛泽东高兴呵！

会见是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宽阔的客厅里进行的。毛泽东在张玉凤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毛泽荣见状，忙走上去，将他扶在椅子上坐下。

“泽荣呀，你怎么这么久也不来看我呀？”毛泽东也许忘了当年他托带的那份给杨林公社的信，不无埋怨地对毛泽荣说。

毛泽荣没有说话，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这次他没有叫“主席”，而是满含深情地喊了一声“三哥”，然后坐在了毛泽东的身

边。他打量着他的三哥，发现他苍老多了，两鬓的白发也明显地增多，他说话的声音也不太连贯了。毛泽荣见此，心里十分为三哥的身体健康担忧。

“泽荣呵，还有泽连，怎么就这么多年来不来看我呢？”毛泽东又问了一句，眼角里噙着泪花。

“二哥，我们都想看你呢！我们都想来看你，但又怕打扰你的工作，就，就……”

“所以就不到我这里来了？”毛泽东接过了毛泽荣的话，“就连我也不看一下了？”

毛泽东几句带埋怨情绪的话，把毛泽荣以前心中的石块扫地以尽。毛泽东曾立下规矩，毛泽荣进京，需经他批准。为此十几年间，毛泽荣只能望着“主席三哥”居住的北京方向叹息，是什么隔绝了兄弟之情呢？现在，三哥一埋怨，毛泽荣顿感隔阂消除，他体会到的是兄弟间原来的亲情，终于心心相通。三哥毕竟是79岁的高龄了，艰难乏力的步态，滞暗的目光，令这位“逊五”弟感到阵阵心疼。

“1966年的6月，我又去过一次韶山，”毛泽东将头仰靠在沙发靠背上，侧着头对毛泽荣说：“因为不得空，我冒去看你们，冒去看乡亲们，也不晓得乡亲们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

“也是后来才晓得咯件事。”毛泽荣回答说：“不过，当时也听些河风，说是你来了韶山，住在吊须洞（滴水洞），有一个团的人为你站岗。但是这些话不敢公开议论，只在暗地里传播着。”

“为什么不敢公开议论呢？”毛泽东好奇地问。

毛泽荣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而转了一下角度说：“其实你来的当天，就有人看见你了，那是毛继生屋里的细妹子。那天，细妹子在东茅塘公路边的山上扒松毛屑子（指捡柴火），看见有一排车往吊须洞开，其中有一辆车上就坐着你。你当时正撩开窗帘往外张望。细妹子见你来了，高兴地赶回家，告诉家里人说，

毛主席回来了。这还是下午的事，晚上就有公安局的找上了门，说主席没有回来，不许乱讲。细妹子吓得再也不敢讲二话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他感到了一丝悲哀。是为“细妹子”的受吓内疚，还是为自己当年欠下的那份情自责，总之，毛泽东很久没有再作声。

医务人员走了进来，为毛泽东量了量血压，见血压有所变化，知道他心里有些激动，示意毛泽荣不要再提这些事。

毛泽东似乎从情绪的波动中回过神来，问道：“你怎么不说话了？”

“三哥，乡亲们还是希望你回去一转，都念着你呢！”毛泽荣选“好听的”话说，其实这也是真话。“1959年那一次你回去时，我虽然冒见到你，但后来听人讲。那真是韶山的节日呵，男女老少，比办喜事还高兴呢！”

“你告诉乡亲们，我毛泽东会回来的，这一次回来了，也就不走了，落叶还要归根呐！”毛泽东有些英雄气短地说，话语里透出几丝苍凉。

毛泽荣听了三哥的话，真不知该高兴还是不高兴的好。

会见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约定的时间。护士进来了，卫上也进来了，都劝主席休息。但毛泽东谈兴很浓，他跟毛泽荣谈到国内的形势，告诉他，不久就要召开四届人大，国家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都会有一些调整。他还讲到了国际形势，讲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甚至讲到了原子弹和中国的民兵师。最后，他的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现在，我们国家还有些困难，科学技术也还不发达，我们大家都要努力，要赶上才行啊！”

毛泽东一气谈了好久。看到他老人家如此好的谈兴，工作人员倒是没有再动员他去休息了。因为难得毛泽东有这么好的情绪，这么多的话题。今天见了他的五弟，毛泽东这般地放开了他

的心扉，可见他平时实在是太寂寞了……

5年之后，当毛泽荣再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毛泽东已经告别人世一周年了。在纪念堂那鲜花翠柏丛中，毛泽荣再一次见到了他的“主席三哥”。可是，他们之间再也不会再有那种推心置腹的交谈了。当泪眼朦胧的毛泽荣一步一步地移近到安卧着的毛泽东遗体面前时，他颤抖地喊了一声：“三哥，我是逊五啊，我看你来了！”

三哥无言，纪念堂无言，只有低沉的哀乐在纪念堂的大厅里回旋着……

1986年2月9日，毛泽荣老人在韶山杨林病逝，享年89岁。

四、你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 ——致毛华珠

(一) 1956.4.20

华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安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毛华珠，谱名泽田，字魁甲，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初三。家住韶山乡韶源村蔡家塘。

他的父亲毛福生（贻谋）和毛泽东的父亲往来密切。毛华珠的胞兄就是毛宇居，其次兄毛智珠是毛远翔的父亲。而且他自幼和毛泽东一起玩耍、劳动，又一起在毛宇居的私塾中读书，所以关系非同一般。

他小毛泽东2岁，故称毛泽东为“三哥”。

他事世苍桑，人生莫测，几十年中兄弟天各一方不通音讯。及至新中国诞生，二人的命运迥异。毛泽东作为一国主席，领导着执政的党，领导着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毛华珠以一介村民在土地改革中被划为富农，他的8亩水田也被分给穷人。

1952年毛宇居进京，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珠的情况，当得知他年老体弱，家无主劳力，生活十分困难时，毛泽东十分同

情，即托毛宇居捎去布料4丈为礼物。

农业合作化后，年近六旬的毛华珠也加入了合作社。

1956年4月，他的堂弟毛纯珠在胞弟毛荣珠（当时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的引荐下见到毛泽东。

当得知毛华珠也加入了合作社并诚实劳动养家糊口时，毛泽东感到欣慰，当即写了信，让毛纯珠带回。

信虽不长，但“主席三哥”的回信，使处境艰难的毛华珠，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分别32年以后，回到了韶山。

早在一个月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就给韶山打了招呼，对哪些人可以会见毛泽东，作了反复研究和安排。

尽管乡村干部知道毛泽东和毛华珠的关系，但因为他被划为富农，所以在安排和毛泽东会见的亲友名单中，把毛华珠划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韶山。

6月26日上午，毛华珠从蔡家塘赶来韶山冲，想进松山宾馆见见“主席三哥”，但被乡村干部拒绝。

毛泽东发现诸多亲友中，不见毛华珠，便问道：“怎么毛华珠没有来？”

乡村干部觉得不好回答，没有人作声。

毛泽东又连问两次：“怎么华珠没有来呢？”

乡村干部推脱不过，只好如实回答：“华珠划了富农了。”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

毛泽东生气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对于这位堂弟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他是非常了解的。

早在1921年，毛华珠就协助过从事地下工作的毛泽覃。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家乡开展农运，毛华珠也参加了农会，成为

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农会被迫解散，白色恐怖笼罩着韶山，毛华珠迫于家人的安宁去乡公所自首了。从此以后，他与党的组织脱离了联系，老老实实在家以作田谋生。

由于毛华珠为人精明，经营有方，加之十分勤劳，家中慢慢地积累了一笔资金，几年以后，便买了几亩田地，一家4口人，过着比较富裕的日子。毛华珠虽然富裕，但并非为富不仁，而是相当具有正义感。30年代，他曾与李漱清联名反对清溪乡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在乡中抓壮丁，受到群众的拥护。

可今天，竟因为他划了富农，兄弟之间就不能相见了，难怪毛泽东生气了。他喊来毛继生嘱咐道：“一定要把他找来！”

毛继生连忙点头答应。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在松山宾馆接见了堂弟毛华珠。

见了毛泽东，毛华珠喊了一声“主席”，又喊了一声“三哥”。

到底有几十年不相见了，毛泽东已无法回忆起32年前的形象，辨认了好久才问道：“你是谁？”

“我是老五华珠啊，主席！”

“你是五弟啊！”毛泽东深情地握着毛华珠的手说：“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哟，你已经瘦多了。”

毛华珠听到这些充满深情的话，眼眶一下就湿润了。

毛泽东又问：“当地对你怎么样？”

“很好。”毛华珠不敢乱说话，他很有几分客气地说：“他们没有把我当富农看。”

这话毛泽东当然听得出味来，如果真没有把他当富农看，是不会不安排他来松山相见的。毛泽东见华珠突然有些惶恐，便说：“你这富农可划可不划。”停了会他又问：“划了，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毛华珠回答说。

毛泽东理解地点了点头，说：“你也老了，身体也不太好；不要去劳动了。告诉你的后人，要听党的话，好好地工作。”

一滴眼泪从毛华珠的眼眶中落下。

中午，毛泽东特地留毛华珠在松山宾馆吃饭，饭后，又与其他乡亲一起合影。

毛华珠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

1973年底，毛泽东的这位“富农”堂弟病逝于蔡家塘，享年78岁。

从毛华珠在土改前的经济状况看，他的成份似不应划为富农。毛泽东说：“可划可不划，”绝不是对亲戚的偏袒。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加以纠正呢？

毛华珠带着富农的帽子在辛劳了一生以生，离开了人世，不能不是一件憾事。

五、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 ——致毛远悌

(一) 1950.5.12

远悌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远翔是否是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了，多请告我。

此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这是一封挂号信，是用的印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字样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书写着：“长沙蔡锷北路屈关祠工农印刷厂/毛远悌同志收/毛寄”。

按韶山毛氏家族的排行字辈，毛远悌称毛泽东为“三伯”。

从血缘关系看，毛远悌属于毛泽东的远房族亲。

但毛泽东和毛远悌的祖父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

毛远悌的祖父叫毛麓钟，族名毛貽训，与毛泽东的祖辈、父辈同住韶山东茅塘。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26岁的毛麓钟应科举考试，成为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府学秀才。后来，毛麓钟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游幕江南，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甲午战争之后，因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深为不满，愤然辞职回乡，关门谢客，隐踪山居，并取得别号为“韶山小隐人”。

由于受到戊戌思潮的影响，毛麓钟联合开明绅士在韶山开办中西合璧式的私塾。年方16岁的毛泽东在乌龟井塾师毛岱钟手下读了半年书后，因仰慕毛麓钟的声望和学识，特地背着书囊来到东茅塘，拜毛麓钟为师。

毛麓钟喜爱这个资质俊秀的后生，欣然接纳为弟子，并对他的学习特别关心，悉心地给他点读《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还为他讲授新学，介绍名山大川、世界风情，扩大他的视野。

由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对毛麓钟的学识比较敬佩，且两家关系较密切，比较容易接受毛麓钟的意见。因此，当毛泽东因不想去米店学徒而愿继续求学时，毛麓钟便坚决给予支持，并说服了毛顺生。

关于这件事，毛麓钟的夫人回忆道：

“有一次，因毛顺生要毛润之停学在家里记账和到银田寺镇上当商店学徒，毛润之表示反对，毛顺生便将毛润之从家里打跑了。毛润之跑到东茅塘找伯父毛麓钟来‘告状’。毛麓钟告诉他读书，并借书给他读。两人谈了一夜。第二天，毛麓钟送润之回家，与毛顺生交换了看法，先肯定读书是件好事，润之又会读书，应该让他读书深造。毛顺生同意了。这样，毛润之才得以（去湘乡县东山学校）继续读书。”

入学东山学校，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具有转折性的事，而这中间，就有毛麓钟的一份操心和功劳。

毛远悌的父亲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失败

后失踪。当时毛远悌才 13 岁，与母亲相依为命，苦熬岁月。后流浪乞讨至长沙。

1946 年，不满 20 岁的毛远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湖南解放前夕，他参加了长沙的“迎接解放学潮。”

长沙和平解放后，毛远悌到岳麓山进入湖南革命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他奉命参加接管印刷厂，任印刷厂经理。

由于过去读书少，毛远悌担任领导职务后，深感文化水平低的苦恼，渴望提高文化水平，于是连写两信给“主席三伯”，希望介绍到学校去学习。

于是，收到了毛泽东上面的回信。

信，是亲切的，告诉他“两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勉励他“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至于学习的事，毛泽东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再说”，现在“不要来北京”。

毛泽东的信，打消了毛远悌去北京学习的念头，他听从“主席三伯”的话，安心在长沙从事印刷厂的工作。

当时，毛泽东已准备派毛岸英回家乡看望乡亲，便嘱咐儿子，如见到毛远悌，可转达信中的意思，要他安心工作。在湖南省委交际处，毛岸英与毛远悌不期而遇。毛岸英即转达了父亲的口信。毛远悌其时已收到了毛泽东从邮局寄来的挂号信，今又听了岸英所转达的口信，很受鼓舞，感到“主席三伯”这么记挂着自己的这么一件小事，非常激动，他告诉毛岸英，请转告“三伯”：“我一定不辜负伯父的期望。”

六、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 ——致毛远翔

(一) 1950.5.12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都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求得工作，不要来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的进益，此复。

即问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你父亲的相片收到，请你代我问候他们。

毛远翔又名毛毅，字玄夫，是毛泽东的族侄。和毛泽东的血缘关系较远，是已经出了五服的侄辈。他1926年6月出生在韶山蔡家塘。

1949年，23岁的毛远翔在家乡组织力量，迎接解放。他在韶山毛震公祠办起“震东学校”，招收贫困子弟入学，自任校长兼教员，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当时，震东学校成了进步青年活动的场所。

长沙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四野第46军第138师到韶山打听

毛泽东亲属的下落，毛远翔是最早找到的3个人之一。

他代表韶山的乡亲们向驻扎在韶山的解放军致欢迎词。

1949年10月，毛远翔进入岳麓山的革命军政大学学习。他给毛泽东写信，介绍了学习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家世。

毛泽东很是高兴，于1949年11月24日给毛远翔回复一信：

远翔贤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这可能是毛泽东给亲友的信中最短的一封。原因很显然，一看时间便知：1949年11月14日。

国家新创，万机待理，毛泽东的繁忙操劳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毛远翔见信后仍然是十分激动的。要知道，这是“主席三叔”在百忙、千忙、万忙中写来的珍贵家书啊！说明三叔时刻惦记着家乡的亲人。

在“革大”湖南分校学习不久，毛远翔便分配到湖南省委交际处工作。出于工作的需要，毛远翔产生了学习的渴望，他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说出了自己想到北京学习和工作的想法，同时还寄去了自己父亲的照片。

收到毛远翔的来信，毛泽东感到在他的亲友中有一种不太好的意识在滋长。毛泽东思考了好久，在1951年5月12日这一天，他一连给亲友写了5封信，大都是拒绝他们要求介绍工作，安排学习的。如给文南松的信，便拒绝了文南松为文运昌介绍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给毛远悌的信也同样是拒绝：“不要来北京，学习的事将来有机会再说。”给老同学叶健农的信还是拒绝：“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

决，以在重庆为好。”基于同样的原因，毛泽东也给毛远翔写了上面的信。

毛泽东虽然写信拒绝了毛远翔的进京要求，但是对他还是十分关心的。在给毛远翔的信中，他让毛远翔“务请告我”毛远翔的“略历”。

毛远翔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即打消了去北京学习和工作的打算，安心地留在长沙工作。毛远翔具体办理过好多起毛家、文家亲友去北京看望的事。文运昌等人进京后谈到毛远翔时，毛泽东笑着说：“这位贤侄不错，学习上很有进步。”

1956年，毛远翔已由省委交际处调到长沙市协和裕织布厂工作，任该厂工商代表。同年11月，毛远翔受长沙市委委派，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公私合营工商代表大会，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来到北京开会，很想见见主席。

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代表们一起合影留念。照相时，毛泽东坐在前排正中，毛远翔就站在第二排主席身后。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毛远翔接进中南海。他激动地喊“主席三叔”，表达了家乡亲友对共和国主席的思念。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家乡亲友的生活、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到了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他说：“……中国革命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候真是艰难困苦呵。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下有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匪兵追堵，为什么我们会取得胜利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是站在希望抗日的大多数人一边。工人、农民、学生，这些人都支持我们。现在，解放了，进城了，生活条件好起来了。”说到这里，毛泽东加重语气说：“远翔啊，生活条件变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可不能丢呵，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和斗志不能丢呵，要时时记住，我们是代表人

民群众利益的，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啊！”

毛远翔认真地听着，默默地记着……

在以后的岁月里，毛远翔一直牢记着毛泽东主席的告诫，“我们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不幸去世，毛远翔悲痛万分。次年10月，他才获得去北京瞻仰主席遗容的机会。当他来到天安门，走入毛主席纪念堂，看到毛泽东主席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仍像过去一样和蔼、慈祥，他多么想再一次听听主席三叔的教诲呵。回到家中，他流着思念的眼泪写成了《浪淘沙》词一首，以表怀念：

汽笛划长空，一线沉沉，缅怀往事记忆新。此次重来酬宿愿，瞻仰遗容。

苦海闹翻身，笑语融融，故园怅望竹林清。忆昔屡屡聆教诲，热泪沾襟。

七、家中困难，应在生产中陆续解决 ——致毛照秋

(一) 1950.4.10

照秋贤侄：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

毛照秋生于1903年7月，出身贫苦。是毛泽东的族侄，属远字辈，族名毛远煌。他的父亲毛学梅（亦称毛旭梅）是毛新梅烈士的胞兄。

1925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在韶山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毛照秋的叔父毛新梅是支部成员，已22岁的毛照秋也参加了农民运动。

以后，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毛照秋向往广州的斗争生活，到广州找到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介绍下，毛照秋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发运“四·一二”政变，毛照秋被迫流亡，曾投入唐生智部当兵，任过排长。1930年回到故乡，以木匠手艺糊口。

1949年，毛照秋参加湘中纠察队，迎接解放。湖南解放后，湘中纠察队编入人民解放军，时毛照秋已46岁，因年纪太大，被劝退伍。

毛照秋回乡后，一时生活无着，十分苦闷，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当年在广州的经历，介绍了父亲的情况，也反映了自己目前的困难。

不久，毛照秋经中共湘潭县委介绍，在县第三区政府担任收发工作。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毛泽东的来信。毛照秋受到巨大鼓舞，更加努力工作，1951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1952年以后，他又因故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一直在乡下种田。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湘潭，在松山宾馆招待父老乡亲，毛照秋亦应邀参加。

宴毕，又合影留念

这张合照，成了毛照秋永久纪念，一直珍藏。

八、令兄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致毛爱桂

(一) 令兄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1950.5.26)

爱桂先生：

来信收到，令兄爱堂于一九二七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一面，以后从来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是为革命牺牲的，是光荣的。

此复，并候

合家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知道毛爱桂名字的人不多，但到过毛爱桂家门口的人必然以千百万计。

毛爱桂不是别人，他就是毛泽东故居西头挂有“邻居”字样的茅草屋的主人，有人称他为“天下第一邻居”。

毛爱桂谱名毛贻业，跟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同辈。他虽然出生于1914年8月，比毛泽东小21岁，但是因为他的辈份大毛泽东一辈，所以后来当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还尊乡下习俗称他“爱桂叔”。

说起来，毛爱桂成为毛泽东的邻居，也算是历史的“巧合”。

上屋场（现在的毛泽东故居在韶山习惯称“上屋场”）原来并非现在这个样子，是湖南中部地区常见的讲究对称的“一担柴”式的茅草房。

这组一担柴式的茅草房，原来住有两房人家。一户是毛爱桂的祖父毛祖富，就是今天挂着“邻居”字样的那部分房子的主人。一户住着毛正光，这组茅草房的其余部分都归他所有。

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是一位勤劳的农民。住在韶山东茅塘。有茅屋4间，水田10亩，旱田1亩，山林2块。及至两个儿子（毛恩农、毛恩普）成家后，人口渐多（毛恩农有3子3女，毛恩普有2女1子）。人多地少，住房拥挤。毛祖人52岁那年，下了决心，借银数百两，从毛正光手里买下了现在毛泽东故居上屋场的房屋和土地。

到1778年毛恩农、毛恩普分家时，毛祖人的家业已有房屋9间半（其中上屋场5间半），水田32亩。

因为都不愿离开东茅塘，所以采取抓阄的办法决定去留。结果毛恩农抓得东茅塘的4间茅屋和10亩水田，外加上屋场水田7亩。毛恩普抓得上屋场茅屋5间半和水田15亩，因为房屋多了一间半，所以田减少两亩。

这样，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和毛爱桂的祖父毛祖富便比邻而居。

后来，因为毛顺生经营有方，家境渐渐宽裕起来，便将房屋翻新，掀掉茅草盖成瓦屋，并增盖了一些房屋，形成现在人们看到的规模。

而毛爱桂家却依然故旧，还是今天看到的茅草屋。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毛爱桂的母亲经常帮助文七妹料理家务，还帮助照看文七妹的病。所以毛泽东是非常感激的。

1925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运，成立了“雪耻会”，建立了党支部。支部成员常在上屋场开会，有时，毛爱桂的大哥爱堂等积极分子也来参加。

毛爱桂当时才11岁。毛泽东见他虽小却很机灵，有意叫他做点事。便对他说：“爱桂，你能帮我完成一件事吗？”

毛爱桂很高兴：“什么事？”

“你站到山嘴上给我们望风，如果来了不相识的人，你就马上发信号：是吃饭的时候就喊吃饭，不是吃饭时，就打山歌。”

就这样，每当来了陌生人，毛爱桂便悄悄发出信号，唱起山歌。

听到山歌，毛泽东和开会的人便佯装打牌，等陌生一走，又继续开会。

毛爱桂的大哥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军。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跟着共产党继续革命，后来牺牲。反动派到韶山来捉人，毛爱桂的母亲只好带着毛爱桂流落他乡，过着沿门乞讨、露宿山林的生活。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毛爱桂染上了风寒和眼疾，最后几至失明。这对于一个还不到20岁的青年，该是多么不幸呵！

苦熬了20多年，终于盼来了解放。

听说从上屋场走出去的毛泽东已经作了国家主席，毛爱桂一家高兴得合不拢嘴。

毛爱桂思念当年和气的润之先生，也思念20多年音信皆无的爱堂大哥，便请了人给毛泽东写了信。

这边，毛泽东也没有忘却邻居一家。

1950年5月，他在派大儿子毛岸英回家省亲前夕，特地交待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邻居毛爱桂。在上屋场，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老人告诉毛岸英、毛爱桂已住到张旭冲去了。并说，他大哥毛爱堂参加了革命，不知人还在不在。

毛岸英来到了与上屋场一山之隔的张旭冲，看望了毛爱桂一家。当时，土改还没有开始，毛爱桂的眼睛又已近失明，一家生活十分困难。毛岸英揭开他家的锅盖，见吃的东西很差，心里十分难过，当时便掏出5万元钱（旧币）给毛爱桂，并安慰他说：“大家生活都很困难，土改分到田以后，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岸英还问道：“听周外婆讲，你有个大哥参加了革命，他现在在哪里？”

毛爱桂摇了摇头，难过地说：“大哥出去了，至今音讯全无，不知还在不在人世。”并希望岸英回去后帮助查找。

岸英很理解毛爱桂的心情，说：“我回去问问我父亲，请他帮助寻找。”还叫毛爱桂也写封信去，说明有关情况。

毛爱桂说：“前不久我写了封信，也不知你父亲收到没有。”

果然，毛岸英离开韶山不几天，毛泽东给毛爱桂的信就寄到了。

接到毛泽东主席的来信，毛爱桂家当然十分高兴，因为这证明毛泽东还记着他的一家。但这封信同时也带来了悲痛，因为从信中得知大哥毛爱堂已经牺牲了。不过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还是给了他们以尽可能的安慰，肯定毛爱堂“是为国家牺牲的，是光荣的。”毛爱桂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为国捐躯的兄长而感到自豪。

当时，由于毛爱桂眼睛不好，参加劳动有困难，而他老伴又有病，儿子毛泽林才14岁，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毛爱桂只好求助于毛泽东主席的关照了。他让外甥为他代笔，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毛泽东主席：

您老人家好！

您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为了穷人的翻身，您到处奔走，今天中国革命成功了，没有哪个不欢迎，不高兴。

主席，我是毛竹平之子毛爱桂，家里有六口人吃茶饭，就我一个人劳动。我眼睛又不好，只有一点亮，没有钱医治。其实，有钱治好的话，我还是可以参加劳动的，免得增加国家的负担。

主席，我有一个儿子，已有十四岁了，读过初小四年、高小二年。我想培养他出来为国家做点事情，可惜没有能力。感谢您老人家的关怀，如果有机会学习，您介绍他出去学习几年好吗？……

毛爱桂

一九五二年六月

信寄走后，毛爱桂一家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的一些至亲，要求毛泽东介绍工作都被婉拒，自己不过和主席同族、邻居而已，主席会理会此事吗？

再说，几十年前的恩情，还没报答呢，怎么又张口去麻烦人家呢？

几十年前的恩情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 1921 年的事。

那一年，毛爱桂的父亲去世了。丧事办完后，家里已是徒有四壁了。生活无依无靠，难以为继。这样，全家人商量，决定将茅草房变卖，以维持生计。大哥毛爱堂与毛泽民商量，决定房子卖给他家并签好契约。此时，恰逢毛泽东从长沙回到家中，在得知此事后，他极力劝说毛爱堂和大弟毛泽民废除房契，同时又给了毛爱桂一笔钱，帮助他家渡过了难关。

万万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毛泽东不但给毛爱桂回了信，而且破天荒地答应了毛爱桂所提的要求。

(二) 令郎要出来工作，可向当地机关申请 (1952.10.10)

毛爱桂先生：

你的来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要你儿子出来搞一点随时随意的工作，我亦十分高兴。可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

这封信，立即在韶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毛爱桂更是如获至宝。乡亲们，毛泽东的至亲们真是难以相信毛泽东会为毛爱桂的儿子安排介绍工作，都纷纷前来观看。结果，毛泽东的这封信很快在传看中磨破了。不久，毛爱桂的儿子毛泽林通过组织部门

介绍到株州糖烟酒公司参加了工作，尔后又调回韶山粮食局。现在工商银行韶山冲办事处工作。毛泽东在韶山有不少本家和外家亲友，他亲笔回信向当地政府推荐安排工作的，这是唯一的一例。

毛泽东对毛爱桂一直关怀备至。1954年，毛泽东托乡亲给毛爱桂带去衣料4丈，并请他来北京作客。

1955年4月，毛爱桂和大姐毛春秀来到北京。

1927年一别，转眼就是28年了。毛泽东已不是当年那个穿蓝布长衫瘦高个的青年了，而是一个发福了的满脸充溢着慈祥的长者和领袖。

一见面，毛泽东就拉着毛爱桂的手说：“快30年不见了，都认不出来了。”

“主席您还好吧，韶山人真想您呀！”毛爱桂激动地说。

“好啊，好啊，韶山的乡亲们都好吧？这些年来，你也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

“搭帮主席，我们现在分到了田地，翻了身，有了饭吃了。还好哩！”毛爱桂说着，昏花的眼睛里涌出了一行热泪，毛爱桂忙用那长满了老茧的大手去擦。

毛泽东注意他那双眼睛，问道：“你的眼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还看得见么？”

“看倒是看得见一点点，只是一到傍晚，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毛爱桂如实地说。“不过，托主席的福，如今算是好多了。”

原来，毛爱桂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地政府特地安排毛爱桂到长沙住院治疗了一年，尔后又回湘潭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眼

睛明显好转，由几乎失明恢复到 0.3 至 0.4 的视力，终于重见了光明。在住院期间，不论是在长沙还是在湘潭，政府干部都介绍说这是毛主席特别关心的病人。医生见他身份特殊，也就特别的热情周到。出院回家时，政府还为毛爱桂添置了一条棉被，照顾他 200 元钱和 200 斤大米。帮他渡过了生活难关。毛爱桂因之充满感激地说：“是托主席的福，搭帮主席治好了眼病的。”

毛泽东谦逊地说：“不是我替你治好的，是国家替你治好的。”

毛泽东又问：“生活过得好不好？”

“还过得去。”毛爱桂勉为其难地说。

毛泽东知道毛爱桂有难处，话又不好说出口，就帮他把话说了出来：“你回去后，如果生活有困难，就写信来。”

接着，毛泽东又关切地问了韶山其他一些老人的生活情况，毛爱桂都一一作了回答。

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看了很多地方，毛爱桂因记挂着家里的农事，要求尽快回去。毛泽东很理解他的心情，没有强留，离开北京时，毛泽东给了毛春秀 300 元钱，给了毛爱桂 200 元钱。

此后，毛泽东一直关心着他们一家。毛爱桂回家不久，毛泽东又让秘书给毛爱桂的大姐毛春秀寄来了 600 元钱，解决生活困难，并通过有关部门为他二姐毛淑元解决了住房困难问题。

此后，毛爱桂在乡下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并未去麻烦主席。

但有一件事，他曾写信给毛泽东。那是因长兄毛爱堂烈士的事。囿于当时的档案资料，民政部门未予登记。毛爱桂向毛泽东

写信，反映这一情况。

毛泽东在收阅这封信后，将信批转到湖南省委。省有关部门很快给毛爱桂复了信，其大意是：

毛爱桂同志：你寄给主席的信，现已批交我们办理。关于毛爱堂烈士的情况，望您能来函详细相告。既然毛主席来信证明，毛爱堂同志是烈士是不会有误的，应该发给烈士证，让其永垂不朽。

由于有毛泽东的亲笔证明，毛爱堂烈士的待遇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故乡韶山。毛爱桂得知了，万分欣喜，忙放下耕具，在渠沟里匆匆洗洗泥脚，便匆匆地往松山宾馆赶去。

毛爱桂的这幅模样，自然有保卫人员挡驾。

但毛爱桂不相信主席会不见他，便当场请人写了个条子，请乡村干部捎进去，转交主席。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收到这个条后，笑着说：“请他进来，我的爱桂叔来了，焉有不见之理。”

在松山宾馆，毛泽东宴请乡亲们。

毛爱桂、毛宇居、毛泽连等和毛泽东同桌进餐。毛爱桂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喜悦。

宴罢，毛泽东和毛爱桂等乡亲们合影留念，随着摄影师快门的按动，留下了毛爱桂终生难忘的瞬间。

九、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的事， 未便单独特殊照顾少数地方 ——致毛逸民

(一) 1950.5.8

逸民同志：

一月三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你替我问侯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

努力和进步。

此复，愿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毛逸民又叫毛贻柏，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父。建国初期在中共湘潭县三区区委工作。他在1950年初给毛泽东写信，主要谈到革命烈士家属的抚恤、照顾问题。韶山毛家是革命烈士较集中的地方，因此烈士家属的困难，就显得更为突出。毛逸民在区委工作，自然对这方面的接触较多，他感到有必要给中央写信，集中反映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的回信，再次表现了人民领袖以天下为己任，时刻把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伟大胸怀。信中说，烈属是要照顾的，但那是“全国范围内的事”，“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

十、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 ——致毛月秋

(一) 1953.10.4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

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唐家坵）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

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

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

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毛月秋名毛贻明，号湘圃，毛泽东的远房叔父。

1925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毛月秋当时已经40多岁，仍然积极参加。而且，他还是中共韶山支部的最早一批党员之一，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中共慈悦支部书记。建国后，已年逾70的毛月秋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做接待工作。1957年1月病逝。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0大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逢十的寿诞日。很多人主张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毛泽东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是如此，而且许多人都想亲自到北京参加祝寿活动。

毛月秋代表乡亲们的愿望，给毛泽东写了这封信。

回信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谦虚谨慎，“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毛泽东同意毛月秋等来京，一则为了见见家乡

父老亲人；再则，“为了了解乡间情况”。因此信中反复叮嘱，要毛月秋等将韶山、石城两处的情况及需要解决的困难，由当地乡、区政府写成书面材料带来。但这里毛泽东特别说明，带材料“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而是“作为参考之用”。

信中提到的毛翼臣，显然是毛锡臣的笔误。毛翼臣是毛泽东的祖父，早在1904年11月23日就病逝于韶山上屋场，葬于滴水洞附近之虎歇坪。

1986年12月，毛泽东祖父的墓碑被人们有幸发现。

墓碑高1米，宽30余厘米，厚约6厘米，质地为祁阳石，细腻滑润，类似汉白玉，碑文字迹清晰。右边一行是“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鏤”，中间一行是“显考毛翼臣老大人之墓”，左边是“内辛山外戌山”，落款是：

东
男 贻昌 孙 泽 铭 敬立
淋

泽铭即毛泽民，泽淋是毛泽覃的别名。

毛锡臣，又名毛恩望，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在毛泽东家书中提及的亲友中，是辈份最高的。

文东仙是毛泽东的表弟。

十一、你母年高，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 ——致周文楠

(一) 1950.5.12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周文楠是毛泽覃的第二个夫人。湖南长沙人，父亲周文彬，清朝曾任过知县、知州，在长沙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周家松桂园成为革命者经常聚会的地方，周文楠和母亲陈轩也受到革命的影响。

毛泽覃当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文楠积极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活动。

就在这时，毛泽覃与周文楠相爱。

1925年毛泽覃随兄去广州工作，周文楠和母亲也在次年同去广州。1926年7月，毛泽覃与周文楠结婚。

1927的4月15日，广州国民党右派随蒋介石之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毛泽覃和周文楠化装离开广州来到武汉。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毛泽覃去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周文楠有孕在身，回到长沙老家。不久在松桂园小巷的木楼上生下毛楚雄。

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春，周文楠被反动派逮捕，不到半岁的毛楚雄也随母亲押禁狱中。

周文楠的母亲通过关系接出毛楚雄，改姓周，负起了抚养外孙的责任。自此，周陈轩一直住在韶山上屋场，直到全国解放。

1930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周文楠获救，随部队前往湘赣苏区。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周文楠将毛楚雄、周陈轩送往韶山，自己则在长沙参加抗日活动。

毛泽东得知周文楠一家人的下落，很是高兴。便托人带信给她，并捎来20块银元，要她去延安工作。由于工作难以脱身，直到1940年，周文楠才经重庆随周恩来一起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她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1945年8月，周文楠奉党中央指示随西北局干部队前往东北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儿子毛楚雄也由人护送来到延安，但不幸于1946年被反动派杀害。

全国解放后，周文楠和母亲周陈轩取得联系。此时周陈轩已年近70岁，独自生活，无人照顾，很不方便。周文楠很想把母亲接来东北，但路途通远，时间、路费都成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得到主席的帮助。

毛泽东收到周文楠的来信后，即复了上面一信，信中对周文楠接母亲北上表示赞同。

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到，路费问题，周母年事已高路途上的“招扶”问题等等，都为她想到了。

周文楠接到毛泽东这封信后，即由沈阳启程来湖南。在路过北京时，她专程去了中南海面见毛泽东。

由于毛楚雄牺牲的情况周陈轩老人还一点都不知道，周文楠担心见面后老人会问到楚雄不好交待，如直言相告，怕刺伤了老人，因为毛楚雄毕竟是老人含辛茹苦一手抚养大的。

毛泽东沉吟良久后说：“你告诉外婆（从楚雄称）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周文楠点头答应。

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呵！”

周文楠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帮助下，把母亲接来东北。

1954年，周文楠任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周陈轩老人亦被邀为哈尔滨市政协委员。

周文楠虽然后来一直在北方，但她非常挂念韶山，想到韶山看看。1969年，她曾第二次回韶山。1984年7月，她以74岁的高龄再一次回到韶山。在上屋场旧屋里，看到里面所陈列的一切，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热泪双流。尔后，她又到了滴水洞，故地重游，百感交集。她挥笔作自由诗一首，以记心志。诗云：

瞻仰韶山冲，又看滴水洞。
怀念毛主席，难忘深海情。
亲人泽覃、楚雄，虽死犹生，
先烈遗志亦继承！

十二、减租土改等事，弟未便直接干与 ——致赵浦珠

(一) 1950.5.7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甚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夙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坨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赵浦珠与毛泽东的关系可谓“复杂”。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唐家坨外婆家度过的。在那里，毛泽东拜大舅父母为干父干母，深得他们的关怀和器重。大舅母义赵氏，忠厚善良，对毛泽东兄弟视若亲生，当作掌上明珠看待。毛泽东的这位可敬的大舅母就正是赵浦珠的亲姑妈。

另外，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的结发妻子赵先桂又是赵浦珠的堂姐。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毛泽东的信中称赵浦珠为“姻兄”。

毛泽东和赵浦珠的关系还有一层，那便是他们曾经还是“战

友”。

那还是 1911 年的事。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湖南便是第一个响应的。

就在埋葬清王朝的革命高潮中，在长沙学习的毛泽东和赵浦珠参加了湖南新军，都被编入第 25 混成协 50 标第 1 营。

后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民国建立。毛泽东和赵浦珠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退出军队，继续求学。

全国解放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赵浦珠被划为地主成份，被管制劳动，很想不通，便写信给毛泽东，希望他出面干预。

对于这类问题，毛泽东是不会直接干预的。于是，便给这位“姻兄”回了这封信。以后赵浦珠又多次写信给毛泽东，也不能改变毛泽东坚持正确原则的立场。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不放弃原则，但从亲戚的角度出发，毛泽东对赵浦珠一家的生活困难，还是尽力帮助解决的。

三年困难时期，赵浦珠再次致信毛泽东，反映自己家庭的困难。毛泽东并不因其地主成份而嫌弃他，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取了 300 元钱，让秘书寄给了赵浦珠。

十三、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 ——致贺晓秋

(一) 1950.4.19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贺晓秋，毛泽东的远房姑姑贺毛氏之了，算起来是毛泽东的表弟。

贺晓秋家也住在韶山，所以少时他是与毛泽东一起长大的，两人交谊甚深。毛泽东的亲姑姑无子，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过继给她为孙，所以两家亲戚关系亦近。

毛泽东 1925 年和 1927 年两次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贺晓秋一直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贺晓秋帮助毛泽东送文书，组织会议，自愿作为毛泽东的“保驾”护程人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贺晓秋家的家境在韶山算是上好的，家有 30 多亩田

地，可谓殷实。但是，贺晓秋同意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先有国，才有家。他积极参加毛泽东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为此，他家几十亩田地都荒芜了……

大革命失败，韶山笼罩在白色恐怖中，贺晓秋只好带着妻子儿女流落他乡，开始了艰苦的流浪生活。后来，在洞庭湖区开了片荒田，勉强度日。

解放了，贺晓秋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但是，由于刚刚解放，地方上各项工作缺陷颇多。他为了将地方上的这些情况反映给表兄毛泽东听，在1949年12月22日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回国后才读到贺晓秋这封信，同时也接到了贺晓秋之弟贺晓明的来信，于是毛泽东回复了上面的这封信。

收到毛泽东来信后，贺晓秋很受鼓舞，知道毛泽东没有忘记他。这以后，他将乡下和家中的情况真的“随时”信告毛泽东。

从贺晓秋的来信中，毛泽东掌握了不少乡政情况，也了解了贺晓秋的生活困难。特别是当他听说贺晓秋的儿子（贺风生）患较严重的骨髓炎时，即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贺晓秋汇去300万元人民币（旧币）。同时，秘书室还写了一封信：“贺晓秋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300万元钱，作为令郎治病用费……”以后，毛泽东又寄过100万元钱给贺晓秋，“以助家用”。

1960年，贺晓秋在岳阳病逝。

已过继给毛泽东的姑姑的贺风生，生性耿直，见到不合理的事，就要说一说。

贺晓秋临终前，嘱咐儿子一定要把“大跃进”以来下面发生的情况告诉毛主席，让毛主席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于是，贺风生拿着毛泽东1950年写给贺晓秋的信，去闯中

南海。凭着这封信，他进了新华门，见到了毛泽东。

贺凤生告诉毛泽东，父亲今年十月初八在岳阳贺林生哥家去世了，那时贺凤生还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责怪贺凤生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毛泽东早就不在世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眼里闪烁出晶亮亮的泪光。对于帮助过他的人，他是终生难忘的。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毛泽东接着问。

“收到了。一次300万元，一次100万元，那些钱是您私人的还是公家的？”不知怎么从贺凤生嘴里漏出这句话来。

“当然是我自己的喽！”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支持，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手表，贺凤生知道毛泽东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想着自己憋了一肚子话，忍不住冲毛泽东说道：“主席，您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晓得下面刮什么风吗？晓得现在有些干部作风多坏吗？您想不想听听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稍稍怔了一下，随即，他笑了，兴奋地说：“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

“你先回去好好回忆一下，下次专门找个时间听你谈一次，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毛泽东很高兴，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交给你一个任务，安排好贺凤生参观北京，调动他的积极性，好给我提意见。”

“这里的卫兵太威武了，我都吓出了一身冷汗。”第二次见到毛泽东，贺凤生一开头就说了句俏皮话。

“中央有中央的规矩，中央也有中央的难处，”毛泽东对贺凤生说：“这些担负着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青年军人，肩上的责任不比你贺凤生轻呢。”

“今天只我们俩人谈，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给你一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作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毛泽东和贺凤生了。

贺凤生掏出一大摞子大跃进集体食堂的油印餐票递给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

“好一个开头炮。”毛泽东诙谐地说，并催道：“讲下去，讲下去，我讲过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提，骂娘也可以讲给我听。”

“你怕没有骂娘？下面真有人骂娘呢。”贺凤生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解放以后，共产党派来了土改工作队，贫下中农分到田上，自己当家作主了，肃反运动、互助组、初级社、合作化、高级社，一年都有一个新名堂，农民劲头可大呢，干部情绪高，人民群众生活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都说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不要唱什么赞歌了。”毛泽东笑着说。

“才不呢！但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后，情况就变了。五风刮得不像话呢。”

“十二级台风？”毛泽东笑了笑。

“比台风还台风。”贺凤生说，数出了件件令人痛心的事实。

“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上砖墙要捣碎了沤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爹的哭爹，骂娘的骂娘。100户200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

“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只允许一个中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还没得饱饭吃，餐餐萝卜菜红烧，没得几个油花花，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

“饥荒起盗心。总不能睁着眼睛等死，一些人只好跑到集体田地扯萝卜菜吃。要是被值夜班的民兵抓到，一根麻绳子吊起来就是半夜。”“你这个生产队长呢？”毛泽东沉痛地问。

“生产队长还不也是个普通社员，如今只有司务长、伙头军不饿肚子，有饱饭吃我就不来找您了，反正食堂不解散我就住在这里不回去！”好像忘了在向毛泽东汇报，贺凤生越说火气越大。

“华容县上那么多人去围垦钱粮湖，几十万亩芦洲，要改成良田，想一口吃成胖子。”贺凤生说，“四周要担几十米宽的大堤，横直要开十几米宽的排洪沟，说是为华容人民创造财富挖金山，作法就不那么得人心。不论睛天下雨，白天黑夜，刮风下雪都要干，口号就叫‘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无雨，落雪当晴天，冰冻当好天’。俗话说，吃不得半斗米就莫来担堤。可这里偏偏是担堤的没得饱饭吃，一餐不到半斤米，还要先完成任务。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任务是十几方土，滑头点的完得成，老实人只着急，饿着肚子也要干。芦苇搭的工棚里又脏又潮湿，下雨漏雨，下雪漏雪，刮风进风。干部作风坏，冰天雪地时也要打赤膊干活才叫鼓了干劲，你说缺德不缺德？”

“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实际上是浮夸卫星。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田里的稻谷移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大骂娘。”

贺凤生讲不下去了，他在流泪。

不知不觉，3小时过去了。秘书第三次来催毛泽东休息时，才结束了这场难忘的会见。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后，贺凤生却有些过不惯这样舒适的生活了，他想家了，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过了年就回去。”

毛泽东鼓励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

接着，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贺凤生说：“你是一个生产队长，大小也是一个带长字号的人物。生产队长也要管几百人穿衣吃饭、生老病死，不容易呢，担子不轻啦。不管是部长、县长、还是生产队长，都要首先想到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要真正不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管什么长，首先要像家庭那样带好一个班。”说着，毛泽东又亲切地问贺凤生，“你年轻时受了伤，身体发育不好，干基层工作吃得消吗？”

“农民过得，我也过得。”贺凤生说。

“那我给你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毛泽东高兴地说，“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丢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夜饭，尽拣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想，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那么，食堂散不散呢？”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还是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毛泽东很难过地说：“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粮湖围垦，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冰，落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太好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表我向他们道个歉。”

毛泽东的亲友中，如此直率、激烈地批评“三面红旗”错误的，贺凤生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贺凤生反映的情况很令毛泽东震惊。难怪毛泽东如此感慨：“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脱离群众的严重性。“三十吃年夜饭，尽拣的好搬”，他已经深感下情不能上这的弊病已很沉重了。于是，毛泽东发出了“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的号召。他自己也派出3个工作组，分赴湖南等省份调查实情。其结果，是形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大跃进”中，毛泽东对公共食堂曾情有独钟。尽管农民中一片反对声，毛泽东迟迟下不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心。1960年初，饥荒已很严重了，毛泽东还把公共食堂当作社会主义阵地来坚守。贺凤生对公共食堂的批评，令毛泽东猛醒，才下了“食堂是肯定要散的”决心。

5年后，贺凤生又去北京了。

1966年国庆节后的第二天，贺凤生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去找毛泽东去告状。

真幸运，10月7日，毛泽东又接见了她。贺凤生气鼓鼓地，头一句就问：“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红卫兵放的，这不对，是毛泽东搞的。”

冷汗直冒，造反派还哈哈大笑！”说到这里，贺风生拳头捏得出了水。

“你没夸大吧？”毛泽东问道，这回没有笑。

“还怕我说假话！当官的挨整，不当官的也跑不脱呢。隆庆大队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个贫下中农的根子，前些年，他有吃有穿，有了老婆孩子小家庭，他逢人就说是托您的福。不知哪里兴个规矩，家家要贴毛主席像，他跑到街上请购了一张好大的像贴在堂室当中，那晓得被大风刮破了，于是，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红卫兵从那个社员床上拉下凉席，卷起来做个好高的高帽子，一根麻绳捆起来游村。家家户户做宝书台，供上毛泽东选集，五保户、瞎子家里也要供宝书，人人都要活学活用。”

“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一没做宝书台，二没有买石膏像，宝书倒发了一套，没看过几回，好多字认不出来。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语录牌我倒很喜欢，一直戴在身上。”

谈了很久，也很投机，毛泽东频频点头。

最后，毛泽东告诉贺风生：“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是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党犯了错误也应该纠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贺风生，怕也没人敢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了。”

十四、先生仍以现地工作为好 ——致周起鹗

(一) 1950.5.16

起鹗先生：

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惬意，犹胜于失职（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此复，即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六日

周起鹗属毛泽东的侄辈，关系不远。他的父亲周自娱是周文楠的哥哥，即毛泽覃的妻兄。

周起鹗 1906 年 7 月生于长沙，比毛泽东小 13 岁。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积极投入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曾在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 6 军任中尉书记官，随程潜转战湘、赣、皖、苏等省。

大革命失败后，解甲归田。

1949 年湖南和平解放。周起鹗进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湖南省农业厅工作。

周起鹗感到用非所长，同时也为了打听姑母周文楠的消息，便向毛泽东写信。

对于这位“侄辈”，毛泽东虽然没有什么接触，但对于他的父亲周自娱，毛泽东是非常崇敬的。1938年，周自娱与后母周陈轩、外甥毛楚雄由长沙搬到韶山居住时，毛泽东曾从延安写信给堂兄毛宇居，向周先生表示问候，并说“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可见毛泽东对周自娱先生的尊敬。但是，当周先生的儿子周起鹗写信来要求调动工作时，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要求，说服他安心从事现在的工作，克服“不惬意”的情绪，并在今后慢慢“改进”。在信中，毛泽东也告诉了周起鹗关于周文楠的现况及供职单位。毛泽东的复信是亲切的，也是以理服人的。

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周起鹗打消了去北方工作的念头。当年，他即由省农业厅调往洞庭湖农场，任农场总务股长。

1960年，周起鹗由长沙迁往哈尔滨，在该市园林处工作。不幸的是，周起鹗在迁至哈尔滨的第二年病逝，享年55岁。

十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京 ——致陈国生

(一) 1950.5.7

国生贤甥青览：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此间近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陈国生是毛泽建的养女，毛泽建是毛泽东的继妹，所以陈国生是毛泽东的外甥女。

这是有一番来历的。

陈国生的父亲叫梁泽南，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南特委特派员，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群众性武装斗争，组建赤色游击队。1928年，听到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带领游击队前往会合，中途遭敌伏击被捕，不久被敌人杀害。

母亲叫陈淑元，是毛泽建丈夫陈芬的胞姐。

陈国生幼时寄养在外祖母家，与外祖母相依为命，深得舅舅陈芬和舅母毛泽建的喜欢。

后来，陈芬、毛泽建和陈淑元都不幸被害。

陈国生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嫁给了一个旧军人宋毅刚。宋曾

任国民党军队排长，但为人正直善良。一次国民党军队抓了，他见抓来的是个小孩子，就放了，因此被营长赶回家乡。

后宋毅刚在国民党湘乡县警察局任督导员。1949年1月，率300人枪脱离国民党，编入湘中纠察队，先后任中队长、大队长。湖南和平解放，湘中纠察队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时，宋毅刚被淘汰。

陈国生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希望能进京看望舅舅，并要求舅舅出面为她找一份工作。

于是，毛泽东写了上面的回信，用双挂号直寄“湖南湘乡县鹤厚乡二保三甲宋家湾”，要她“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

1951年5月，毛泽东邀陈国生进京相见。

陈国生欣喜万分。

一见面，毛泽东风趣地说：“外甥第一次来看舅舅，带来什么东西？”

这一下可把陈国生给问楞了。是啊，第一次见舅舅，总不应该空手而来呀，陈国生红着脸歉意地说：“三舅，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您需要些什么呢？”

毛泽东欢畅地说：“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呀、报告呀一类的东西没有。”

解放初期进京看望主席的人很多，都是毛泽东邀请来的，但均邀请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者是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份乡亲的书信来京，以便了解乡间情况。

陈国生明白了主席话中的意思，忙说：“我带材料来了，哎，只是放在招待所里了。”

毛泽东用乡里话说：“你这是床上早，被窝里晏，搞了半天还是冒带来。不过不要紧，我派人去取来。”

毛泽东谈笑风生，中午又备了酒饭招待客人。

饭后，继续交谈。

毛泽东显然知道陈国生丈夫的一些情况，关切地问：“你爱人过去做些什么？”

陈国生随口说道：“当过警察局长。”其实，宋毅刚也不过是警察局的督导员，陈国生将事夸大了一点。

毛泽东问：“有血债吗？”

“没有，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头。”陈国生见主席如此关切，便认真起来。

“他民愤大吗？”

“没有民愤。他家本来也很穷，他是抓壮丁出去的，又是因为放跑了壮丁而被人赶了回来，回来后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毛泽东站起身来，在屋内走了半圈，像是思考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的，对于象陈国生的丈夫宋毅刚这样的人，按当时的政策，是属于严控的对象。毛泽东有些不放心，对陈国生叮嘱道：“如果你丈夫有民愤、有血债，你就不要回去了，留在北京，并把小孩接来。如果没有血债，民愤又不大，你就马上回去，叫你的丈夫好好地改造。”

陈国生眼睛都红了，她点了点头，从内心深处感谢毛泽东对她一家的关怀。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也不要吧国民党的人全部斩尽杀绝，而是只杀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对那些没有血债，民愤又不大的人，我们要把他们好好地争取过来，改造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国生释然了，在北京没住多久，她便回到了长沙，将毛泽东嘱咐的“叫你丈夫好好改造”的话告诉了宋毅刚。宋毅刚听后，很受感动，这以后，他时刻将毛泽东主席的话放在心上，勉励自己，辛勤劳动，也精心地教育子女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时间转眼过去了5年。1955年4月中下旬，陈国生和丈夫宋毅刚先后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看望主席。5月下旬，一

封寄自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挂号信寄至陈国生手中：

陈国生同志：

你和宋同志先后寄给毛主席的两封信都已收到了，并送给主席看过。主席要我们告诉你，他同意你一人于本月底来北京一次，住一两个星期即回去，除你以外，其他人都不要到北京来。此复。

即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一九五五年五月廿一日

中办秘书室的来信已写得再明白不过了。陈国生便准备按毛泽东的要求一人独自进京。9岁的女儿陈锋听说妈妈又要到北京主席外公那里去，非跟着妈妈一起去北京见见外公不可。陈国生只好携她一起启程。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表侄文炳璋、还有毛新梅烈士的弟弟毛仙梅等也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了北京。

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会客厅，毛泽东接见了这几位家乡来的客人。

这时，在游泳池水边玩耍的小陈锋跑到毛泽东身边，拉着他的衣，嚷嚷道：“外公、外公，我要你跟我买一辆单车好吗？”

毛泽东慈祥地笑着说：“要你妈妈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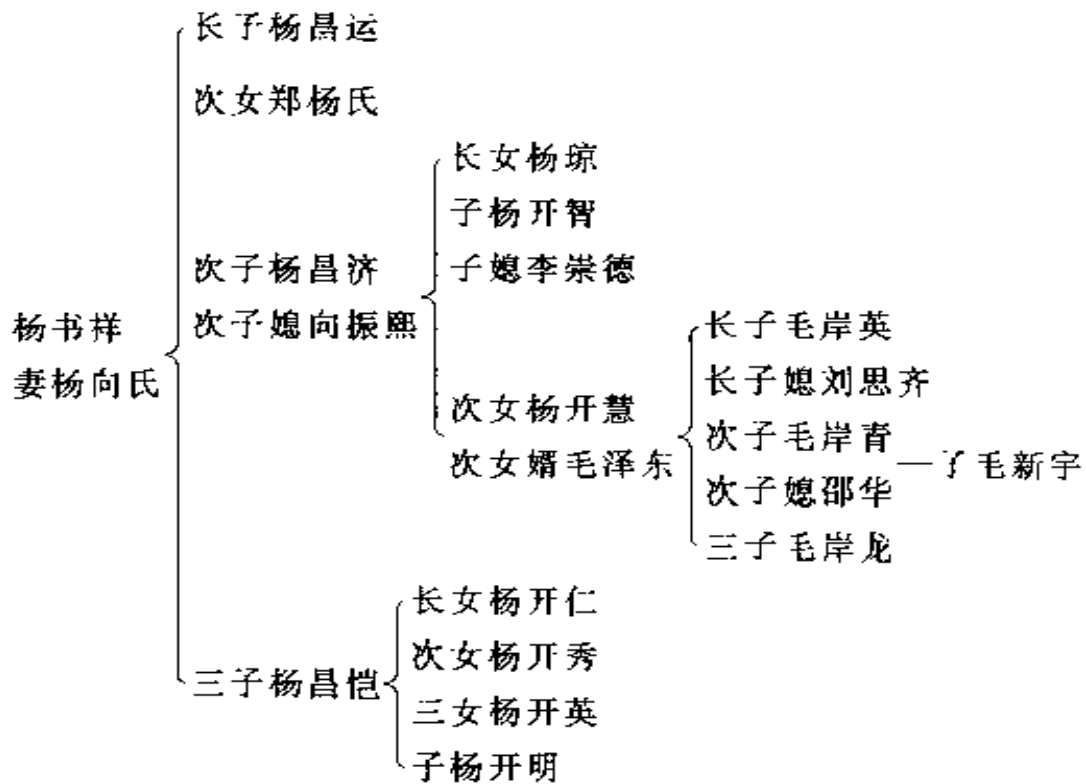
“妈妈没有钱。”

“我给你妈妈钱，你妈妈不就能买了吗？”毛泽东逗着小陈锋笑着说。

没过几天，毛泽东果真派秘书送了280元钱到陈国生所住的招待所，并嘱咐道：“这钱是主席给小孩子买单车的。”

陈国生接过这叠钱，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只有小陈锋，那高兴劲是无法形容的，在房子里跑着圈儿乐。这以后，毛泽东还多次接济过陈国生。现在，陈国生已退休，女儿陈锋在深圳工作。

杨书祥（杨开慧祖父） 直系亲属世系图



一、欣逢八十大寿，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 ——致向振熙

(一) 托朱小姐前来看望你们 (1949.9.11)

杨老太太：

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杨老太太，即向振熙老人，湖南平江人，1870年生。杨开慧之母，毛泽东的岳母。她出生在诗书世家，有大家闺秀的风范。

1888年，和比她小一岁的杨昌济结婚。她生过3个孩子，大女儿杨琼，出生不久夭折。儿子杨开智，生于1898年。次女杨开慧，生于1901年。

1920年，不到50岁的杨昌济病逝，留下的家资不丰，向振熙靠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供一双儿女上学。

这一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向振熙曾有所资助。

192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向振熙和他们一起住在清

水塘，掩护他们做地下工作。

1930年11月，杨开慧被捕牺牲。十几天后，保姆陈玉英带着岸英出狱，来到长沙县的板仓杨家，向振熙待陈玉英如亲生女儿，和她一起照看3个外孙。

国民党反动派认为陈玉英“死不悔改”，又要来抓她，向振熙忍痛劝她离开。自此，抚育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的重担就担在老人的肩上。

不久，由于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向振熙和儿媳李崇德扮成走亲戚的模样，护送岸英3兄弟到上海。

返回湖南后，她与3个外孙断了联系，毛泽东也音讯不通。向振熙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悲哀，苦熬了18年，直到全国解放。

长沙解放，杨开智当即给毛泽东写信，告以向振熙老人健在。毛泽东接到妻兄来信，非常高兴，立即回电庆贺：

来函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

1949年9月初，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要回湖南省亲。毛泽东得知了，便托她带去了礼物和上面的信。

1950年，杨老太太80大寿，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祝寿并看望各家父老乡亲。临行，毛泽东写信一封，要毛岸英交给外婆。

(二) 奉人参、鹿茸、衣料等以表祝贺

(1950.4.13)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

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
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青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与江青以夫妇名义写信，这在毛泽东的书信中是不多见的，在家书中也仅此一封。同一天写给杨开智、李崇德夫妇的信，毛泽东只是以他一个人的名义。这封联名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老人的慈孝之心。毛泽东从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处得知，老太太很关心毛泽东的妻室，内心十分感念。所以写信也署上江青的名字，以慰老夫人重念之意。

1950年5月下旬，毛岸英带着父亲的重托来到长沙。看望外婆一家并为外婆祝寿。杨老太太得知送来的两棵人参是别人送给毛主席进补身体的，非常激动地对岸英说：“这如何要得，你父亲的身体比我重要呀！”

毛岸英笑着说：“我父亲说，您比他更需要进补，吃了人参，祝您老活100岁。”

毛岸英的到来，使向老太太十分高兴。她对岸英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哩。过去我常给他做好吃的，现在不能做给他吃了！”

1951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天年。全国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每月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一直瞻养到老人去世。

1960年，杨老太太90高寿，毛泽东听说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老家祝寿，托她带去200元，并嘱咐开英“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200元寄去。”

1962年，毛泽东惊悉岳母逝世，心情十分哀痛。他给在长沙工作的杨开智发去电报，表达了沉痛悼念的心情。

毛泽东对向老太太的关怀，寄托了他对老师杨昌济的尊敬和孝心，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

这是以充满亲情之恋的伟人的胸怀，充分表现了毛泽东色彩斑斓的感情世界。

二、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 不能只顾少数 ——致向明卿

(一) 1950.4.19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十月十二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此复，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向明卿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毛泽东的妻舅。
毛泽东给向明卿这封信的背景是：

新中国诞生，向明卿写信给毛泽东，打听侄子向钧的下落，并提出如向钧已为国捐躯，希望政府能尽快予以抚恤，以慰死者和生者。

但此时毛泽东已赴苏联访问，向明卿久等不见回音，便又给毛岸英去了一信，同时嘱他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向三立也给毛岸英写信，提出同一要求。

毛岸英收到表舅向三立和舅老爷向明卿的信后，于1949年10月24日给向三立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前半部分就杨开智提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提出严肃的批评，后半部分是关于烈士家属的抚恤问题：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致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表问候他。”

毛岸英的回信，很有分寸，很有原则性。

毛泽东在苏联访问了两个多月，直到1950年2月才回到国内。4月19日，给向明卿回了上信。

信中提到的向钧烈士，是杨开慧的姨表弟。大革命时期，他

在湖南衡山地区组织农运，曾直接受毛泽东的领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钧先后负责湖南省委组织工作，担任湘潭一带工农武装的领导工作，和反动地主武装进行斗争。年底，在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战斗中不幸被捕牺牲。

向钧牺牲的消息不久传到井冈山。毛泽东非常悲痛，在记忆里留下深刻的痕迹。

所以，在给向明卿的信中，能相当准确地回忆起向钧牺牲的时间。

毛泽东没有答应向明卿的要求，直接干预关于向钧家属的抚恤事，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不关心烈士家属的抚恤问题。对于烈士遗属的抚恤问题，不光是现在，就是几十年前，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但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家庭的问题，需要全盘安排，统筹解决，所以毛泽东说要“统一行之”。

毛泽东这封信对烈士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说他是“忠实能干的同志”，但对向明卿的比较急切的要求作了委婉的拒绝和劝慰。不久，湖南省委组织部落实了烈士待遇问题。

三、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致杨开智

(一) 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 (1949.8.10)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杨开智是杨开慧的胞兄，字了珍，生于1898年，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

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他委托族兄杨秀生出面，办理棺木，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次年，他辗转接到毛泽民的手书，要求

把毛岸英兄弟三人送到上海。杨开智夫人李崇德和母亲向振熙冒着风险，扮成走亲戚的样子，几经周折，将三个孩子送到毛泽民、钱希钧夫妇的身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此时，尚在长沙的杨开智立即向毛泽东写信，告之家中情况，并打听女儿杨展的下落。

毛泽东接函后，立即写了上面这封信。为尽快与杨开智取得联系，该信用电报发出。

信中，毛泽东首先对“老夫人的健在”表示“祝贺”，也回答了关于“展儿”的下落的情况。

杨展是杨开智的女儿。1920年生于长沙，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才17岁。1938年，她就读的周南女中建立中共支部，她为支部书记。

毛泽东写信给她，鼓励她去延安，于是她于1938年底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9年秋，中共号召青年学生“到敌人后方去”，杨展随大批青年越过黄河、同蒲路进入晋察冀边区。

1941年秋，日寇对晋察冀进行大“扫荡”，在一次紧急转移中，杨展不幸捐躯。

在写信给毛泽东的同时，杨开智还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毛岸英于1949年8月17日回了一封信。毛岸英的回信全文是：

舅父并转外婆：

看到舅父的来函，悲喜交加，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终然是个有高度感情的动物）。离别已经二十年了，对于人生来讲，这不是一个短小的时间。

你们都好吗？二十年的苦头终于熬过来了，长沙也解放

了，全中国的解放就在眼前。数十年，一直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被残害的中国人民胜利地站起来了！你们也站起来了！让我们首先向你们祝贺这一伟大事变吧！

一九二一年与外婆分别后，去上海过了五年流浪生活，一九三六年底到苏联（可惜没学一门技术），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延安，学了一个时期中文，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现在北平中央机关里工作。岸青也于一九四七年回国，现在尚未正式参加工作，他的耳朵有些毛病，但不很要紧。我的身体很好。勿念。

我们都很想来看你们，只要有可能，我想，我是一定要到长沙来的。回国后，我曾给你们写过好几封信，大概都没收到（这封信我想你们一定能收到了）。

来函中说外婆（健康非常），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谨祝舅父，舅母及其他亲人安好。

你们的情况望多告诉我，来信请寄北平邮政信箱五十四号即可。

写此 致
革命敬礼

岸英叩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

父亲身体很好，他给你们的电报，谅已收到了。又及。

建国初期，杨开智给毛泽东写信，希望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或在湖南得到厅长“位置”的安排。毛泽东在接到杨开智的来信后，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为了说服杨开智，毛泽东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以及

杨开智各写了一封信，并用电报发往长沙。给王首道的信是：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

所谓“另电”，即给杨开智的信，全文如下：

(二)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949.10.9)

长沙上营盘街三十号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毛泽东办事，向来公私分明。即便至爱亲朋，也决不以私废公。毛泽东可以自己出钱解决亲友的困难，几十年间，数量巨

人。但想要毛泽东使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私利，那只能是幻想。“做事以做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私交论情。”“力只可以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用于私人之交谊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毛泽东最反对旧社会中的那种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此，对于他的亲友中可能滋长的这种情绪苗头，他是很注意的，也是看得很重的。所以，当杨开智提出了这些要求后，毛泽东严肃地予以拒绝了。

1950年，杨开智被安排在省政府工作。因为他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根据他的专业和特长，让他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杨开智先后担任过湖南省农业厅技师兼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并出任过湖南省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4月13日，是向振熙的80大寿。

这一天，毛泽东除亲自向岳母写信祝寿外，还派毛岸英带着珍贵的礼物来到杨老太太身边当面致贺。

同时，也给在长沙工作的妻兄杨开智、妻嫂李崇德写了贺信，并特别嘱托，指导他们的亲外甥毛岸英。

(三) 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1950.4.13)

子珍
同志：
崇德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

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此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子珍是杨开智的字。

1950年和1952年，杨开智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两次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其中1950年那一次，夫人李崇德同行。

(四) 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1956.12.13)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杨开智寄来的全家照之后，给他的回信。

这短短的一封家书，再次表现了毛泽东对岳母关怀。从收入本书的家书中可见，毛泽东几乎每信必要问及岳母的身体起居状况。毛泽东对杨家的印象太深了，从《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骄杨”之喻，到“我的亲爱的夫人”那极具深情的称谓，毛

泽东对爱妻开慧、对岳母向老太太的真情，真可谓淋漓尽致了。

(五) 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 (1958.2.11)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在得知杨开智身感不适之后写来的慰问信。信里所说的“两位老太太”，指毛泽东的岳母向振熙和她的姐姐。两位老人这时都已年近90，身体仍很健康，毛泽东非常高兴。在问候杨开智和夫人李崇德的同时，也顺便对两位老人带去了衷心的祝福。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在长沙接见了杨开智，询问其工作和家庭情况，表现了对亲友的极大关怀。

1962年，杨老太太病逝，毛泽东即给杨开智夫妇发来悼念的电报：

(六) 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 (1962.11.15)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奉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封电报，字字真情，是研究毛泽东情感世界的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杨开智极不放心，专程赴北京。其时要见毛泽东已极其困难，他只好让毛泽东身边的人递进一张近照和一封短信。不想毛泽东看后一眼就认了出来，当即要身边的人打电话把杨开智请进来相见。医务人员认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宜见客，只好把杨开智的信放在一级待办柜内，准备病情好转后立即召见。

然而，毛泽东的身体从此即再无好转，杨开智想见一见病中毛泽东的愿望，也终成遗憾。

四、寄上一点钱，以为医药之用 ——致杨开英

(一) 如有所需，尚望告我 (1956.12.16)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杨开英是杨昌济之弟杨昌恺的三女，杨开慧的堂妹。毛泽东写此信时，她在大连市育英中学工作。

信中提到的毛世美，现名毛臻，是毛泽东的远房侄孙。他的祖父毛泽先（智珠）是毛宁居的胞兄。其家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将大儿子毛远耀（即毛世美之

父)、二儿子毛远翥送到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前夕又支持三儿子毛远翔参加地下活动。1951年，毛泽先曾前往北京，在毛泽东那里作客近一个月之久。

因为毛泽耀 1937 年即去延安，所以毛泽东对他甚为熟悉。前面族亲篇中毛泽东致毛宇居的信中谈到“远耀等在此甚好”就是例证。

1949 年，毛远耀曾任衡阳市长、市委书记，后调北京，任化工部办公厅主任。

其子毛世美亦成为毛泽东家的常客。

对于板仓杨家，毛泽东一直有一种负疚心情。关于这一点，权延赤的《掌上千秋》一书写道：

“她（杨开慧）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夫人。”毛泽东曾这样对身边的卫士谈杨开慧：“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我们从毛泽东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给杨家诸亲友中表现了超乎寻常的深情。

1960 年 4 月 13 日，是毛泽东岳母杨老太太九秩大寿。毛泽东听说杨开英要回长沙祝寿，便给她写了一信。

(二) 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

(1958.2.20)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

了，为你祝贺。好象是在一九五六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

友妹指杨开英。胡觉民，毛远耀的妻子，毛泽东的堂侄媳。李同志指李辉、杨开英的丈夫。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在那样繁重的公务中，能清楚地记得两年前曾给杨开英写信和寄钱那样的琐细小事，足见他对杨家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三) 杨老太太九十寿辰，寄上二百元 (1960.4.25)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接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为开慧的母亲 80 大寿准备的寿礼是由毛岸英送去并代为祝寿的，90 大寿的寿礼请杨开英“送去”，反映了毛泽东对于杨开英的看重和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五、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现很坚决，
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
——致陈玉英**

**(一) 有困难，告诉我，给你一些帮助
(1951.12.23)**

陈玉英同志：

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如果你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陈玉英并非毛泽东的直系或旁系亲属，她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的保姆。但由于她的特殊的经历，这里对于毛泽东给她以及她的女儿孙燕的信，都作为“家书”对待。

陈玉英是湖南宁乡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讨

米要饭，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由于家境贫寒，十多岁就外出帮工，后来又长沙作佣人，先后在包括赵恒惕这样的一些人家里当佣帮工，生活过得十分凄苦。

1926年12月的一天，陈玉英幸运地被人推荐到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杨开慧当即表示，今后不要分什么彼此，人家一样做事，不是谁服侍谁，人家是一家人。

从这以后，陈玉英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度过了4年不平凡的岁月。由长沙望丽园到武汉都府堤41号，后来随开慧被捕入狱，再到出狱后回到板仓，这期间历尽了坎坷，甚至生死别离。

1930年10月14日，陈玉英和杨开慧、毛岸英被反动派逮捕。

杨开慧在狱中受尽苦刑仍坚定不屈的行为教育了陈玉英。当敌人撬不开杨开慧的嘴而对陈玉英严刑拷打时，她坚定地回答：“你们要杀就杀我，留着开慧回去带小孩。”

杨开慧被枪杀后，陈玉英带着毛岸英仍在狱中住了18天，经革命同志营救，反动派才把陈玉英和毛岸英放出。

陈玉英将岸英带回长沙县板仓，和杨老太太一起，支撑着抚育3个孩子的艰辛日子。

陈玉英在板仓住了4个多月。1931年2月下旬的一天，好心人紧张地跑来送信：“国民党说你还在帮‘匪属’做事，死不悔改，又来抓你了，你赶快跑吧！”

杨老太太含着泪对陈玉英说：“开慧已经死了，你就是我的女儿。本来想从今以后大家在一起吃点稀饭，就这么过下去，可他们又要来抓你了。我死了一个女儿，不能又死第二个女儿。我不能看着你落入虎口，你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就这样，陈玉英含泪离开了板仓，离开了岸英三兄弟，离开了“妈妈”杨老太太。

从1931—1949年的18年间，陈玉英生活极其困苦，丈夫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她靠打零工度日，零工打不着，就只好去讨饭。极度贫穷，夺走了她6个孩子的生命，只有一个成活，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和她通信的孙配偶——孙燕。

1949年夏，解放大军打到湖南，在乡村打零工的陈玉英听人们纷纷传说：“毛泽东的队伍来了”，欣喜异常，想去找“毛润之先生”。她的两个哥哥担心兵荒马乱不安全。陈玉英找毛泽东心切，又心里没底，就去庙里占卦，结果得了“上去东行遇贵人”的上上签。陈玉英不再犹豫了。她把可怜的一点“家产”（只有一间破茅屋）留给哥哥，便头也不回地上路了。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通电起义。

几十万市民拥上街头，庆祝自己的翻身解放。

陈玉英也上街了，她打着标语，喊着红军，早出晚归。这时候，她多么希望在游行队伍里发现毛泽东家的亲人们呵！

有一天，陈玉英见几个有文化模样的女人在街上谈论，其中有一句“我们去找杨开英”。杨开英是杨开慧的堂妹，陈玉英在给杨开慧当保姆时就见过。

陈玉英急于要打听到毛主席家的亲人们，便走近那一群议论着的女人们说：“如果杨开英来了，麻烦你们几位告诉她，就说孙嫂住在文运街的8号。”

过了些天，杨开英真的来到文运街8号。见了陈玉英，双方好不感慨。杨开英说：

“这次我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关心你，多次询问到你的情况，并且托我来长沙，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你。”

于是，她们一起朝杨开智的家走去。杨开智、李崇德夫妇还有杨老太太都住在希圣园1号。杨开英告诉她，明年5月，是杨老太太的80大寿，到时候，岸英会来为外婆拜寿的。

第二年的5月下旬，岸英来到长沙。

陈玉英一见毛岸英，两人便抱头大哭起来。

毛岸英怎能忘记陈玉英的那一段母爱呵。在狱中，在出狱以后的板仓，是她以其慈爱和常人不具备的坚毅和勇气，支撑了那个被国民党拆散了的家。

岸英说：“我这次回湖南有三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找到你，这是父亲反复交待了的，同时要安排好你的生活。”

陈玉英听了，非常感动。她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只有一个女儿，她父亲也死了，现在放在乡下她伯伯处，我放心不下。”

毛岸英当即给了陈玉英10万元钱（旧币），让她作为盘缠，去乡下接女儿来长沙。

陈玉英第二天就下乡了，将女儿孙燕接了来，住在毛岸英的外婆家里。

1951年12月18日，陈玉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对毛主席百忙中的关怀表示感谢，同时也表达了要到北京看看主席的愿望。

毛泽东在收到信后，立即给陈玉英写了复信（见上信）。信中对陈玉英“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作了肯定和赞扬，并告诉她“为了节省，不要来京”，如工作和生活中“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帮助解决。

这以后，陈玉英再也没有去信打扰主席。但毛泽东深知陈玉英渴望相见的心情，于1957年6月将陈玉英接来北京，两次在中南海接见，临别还赠送亲笔签名的照片，又在陈玉英的笔记本

上写上“毛泽东”三个大字。

以后，陈玉英和女儿在生活中遇到了实际问题，陈玉英叫女儿孙燕代笔，给毛泽东写了几封信。

毛泽东接信后，于1958年春节将陈玉英的女儿孙燕（佩君）接到北京住了些日子。临行，毛泽东写信一封，交孙燕带回。

（二）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 (1958.2.11)

玉英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此次看见配君，她说暂时不做工作，继续补习，将来再讲工作问题。我看这个主意不错，故让她回长沙。她还年轻，目前学习一时期有益。

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陈玉英接到毛泽东带来的信和钱后，心里十分感动，又看到女儿这次在北京，毛泽东还为她添置了新衣服，更是感到亲切、幸福。

说到“钱”的问题，这里还有个小插曲。

刚解放时，政府为了落实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有功人员的待遇，给每一位有功人员以每月 20 万元（旧币）的补助。领了几个月以后，陈玉英不去领了，认为应该自食其力，不能给政府增加负担。1954 年，陈玉英突然大病一场，连床都不能起，生活一时无着，只好又重新去领取这份待遇。

50 年代后期，陈玉英已是六旬老人，体弱多病，没有生活来源，光靠每月 20 万元的政府补助，生活难以为继，况且还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毛泽东知道陈玉英的困难，经常让秘书代他寄钱来，每次都在 200 元以上。1962 年，毛泽东的岳母杨老太太逝世，毛泽东在给杨老太太家“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的同时，也给陈玉英寄去 500 元钱。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因为工作忙，便寄了一笔钱给他的老朋友、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让周世钊代他接济亲友的困难。1975 年，周世钊按毛泽东的吩咐送来 300 元钱，这是陈玉英最后一次收到毛泽东的救济款。

1976 年 9 月 9 日，已年届 80 的陈玉英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泪水止不住往下掉。她嘱咐女儿女婿，一定不要忘记毛主席对孙家的关心，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1978 年 9 月，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玉英出席了这次盛会。会间，邓颖超同志向康克清同志介绍道：“这位就是和杨开慧一起坐牢，并且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坚贞不屈的陈玉英同志。”

1981 年 12 月 13 日，陈玉英在长沙去世，享年 85 岁。

陈玉英是一位极普通的农村女性，但在敌人面前能如此坚贞不屈，保护革命家的后代，表现了纯朴劳动者善良的本性。她又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女性。她有幸和毛泽东结识，并被毛泽东视为

亲人，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又是幸运的女性。

一位伟人和一位普通劳动妇女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为人间留下一段佳话。

六、升学的事，我不宜向学校写信 ——致孙燕

(一) 你们想到北京来看一看，是可以的
(1955.8.3)

配君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很高兴。

你们想到北京看一看，是可以的；但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罢。你母亲在何处工作，情况如何？如有困难，可告之。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孙燕又叫孙配君，是陈玉英的女儿。

她刚生下来时，孙家去抽了个签，说这娃命好，是配君的福，就取了这个名字。毛泽东写信给她有时也写成“佩君”。

毛泽东给她写这封信时，她还是个小姑娘，不到13岁。

1950年，孙燕到了上学的年龄。恰好这时毛岸英来湖南省亲，见到了陈玉英母女，决定小孙燕入保育院学习，但毛岸英未及办好入学手续，就匆匆北归。

毛岸英回北京后，分别给陈玉英和杨开智、李崇德写信，要她们出面找有关部门联系，解决入学问题。

在毛岸英的关心下，小孙燕进了保育院学习。

转眼到了1955年暑期，学校放假了，孙燕便给毛泽东写信，想进北京，于是毛泽东回了上面的信。

虽然北京暂时未去成，但小小的孙燕第一次收到他人的来信，而且是全国人民崇敬与热爱的毛主席的来信，她的高兴，真无法形容。而且毛主席已说明“明年再说”，看来明年进北京见毛主席大有希望，小孙燕怎能不满怀喜悦呢？

1957年，孙燕初中毕业了，她喜欢音乐，想去投考音乐专科学校，但她不懂得具体手续，于是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很稚气的信，要毛主席替她了解一下考试的一些具体内容、要求及规定等。

当时她只是想，她不知道的事，毛主席肯定都知道。这封信充分反映了小孙燕的天真和幼稚。

但出乎意料，毛泽东居然回了信。

(二) 升学的事，我不宜向学校写信 (1957.6.8)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退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

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接到毛泽东主席的信后，孙燕格外激动，她下定决心，温习功课，考出好成绩，为关心自己的人民领袖争气。她一边温习课，一边在一所学校里代课。

可是这一年下半年，长沙市规定：（一）户口不在长沙的要下放；（二）家庭生活无来源的要下放；（三）本人一时无法找到工作的要下放。当时有人根据三条规定，要孙燕回乡农村去，自食其力。其时，孙燕已在一所学校里当代课教师，而且还获得了模范教师的好评。想到就此下乡了，母亲无人照顾，自己也前途莫测，忧急之中，她又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寄出不久，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寄“长沙市文新桥三号孙配君同志”。

（三）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1957.12.17）

配君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

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问你母亲和你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几十年来给亲友的信中，直接“表态”解决问题的，只有两次。

这无疑是两个特例。前者是毛泽东的隔墙邻居，又是烈士的亲属；后者是过去自己家里保姆的女儿，其母也是为革命坐过牢，吃过苦的。可以说，毛泽东把毛爱桂一家和陈玉英一家视作亲人，是完全放在“革命前提”之下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爱，是无产阶级利益的爱，是博大的爱。

虽然是两次明确表态，但毛泽东仍很注意分寸。1952年10月给毛爱桂的信说：“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给孙燕的信说：“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为使孙燕不下放农村更有理由，毛泽东在信末又特嘱“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连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可见毛泽东对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人是何等无微不至的关怀！

“向当地所属机关申请”，“此事应由党决定”，表现了毛泽东

不直接插手地方党政工作的正确态度。

其实，孙燕收到毛泽东主席的这封信后，并没有去省委找谁，因为就在她给北京的信寄出才二天，户籍民警便来到她们家，说明孙燕不属下放对象。所以，毛泽东的这封回信，孙燕没有给任何人看。

1958年2月，毛泽东派人将孙燕接到北京，留她在那里过春节，前后住了近半个月。

2月3日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这位小“配君同志”。

“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书信通了几年，今天才见到你，还是这么个娃娃呀。”毛泽东慈祥地拉着孙燕的手，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就是上次来的陈老太太的女儿，叫配君，是个很苦的孩子。”

像久别重逢的父女一样，毛泽东和孙燕谈了许多。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陈玉英的身体、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嘱咐孙燕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的生活。还询问了小孙燕将来的打算，孙燕都一一作答。毛泽东还派人为孙燕添置衣服，安排他在北京各名胜古迹游览。

在北京住了10多天，要去的地方，要看的地方，都去了，也都看了，孙燕想要回家了。2月11日，孙燕穿着那身毛泽东为她新买的绿呢衣服，前来辞行。

“呵呀，好精神呀！”毛泽东拉着孙燕的手，好一阵打量，十分喜悦。

这年8月，孙燕考入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她立即写信，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毛泽东。

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

会议期间，孙燕在洪山宾馆遇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因为毛泽东给孙燕买衣服是由高智领着孙燕去商店办的，所以一见面，就互相认了出来，都很惊喜。

高智说毛主席就在这里，要带她去见见。孙燕想不到竟有这么天大好事，将信将疑地跟着高智走进去。

一进屋，孙燕所熟悉的形象出现了。

“毛主席！”不期而遇，孙燕十分惊喜，她向前一步拉住毛泽东的手。或是因为太突然，或者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想到在这么一个会议期间会见到孙燕，他一时怔住了，竟没有认得出来。

“主席，这是佩君，就是上次到您家，您让我去买新衣服的孙佩君。”高智连忙向毛泽东介绍说。

毛泽东记起来了，笑着问：“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读书。”

“读什么学校？”

“我读中南音专。”

“呵”毛泽东顿了一下。“怎么呀？考了学校就不告诉我了？”

“您没有收到我的信吗？”孙燕感到有几分奇怪地问道。

此刻正是午休时间。毛泽东把孙燕请到房里，谈了20多分钟，详细地询问了她和她母亲陈玉英的生活情况。因为下午还要继续开会，毛泽东只好请高智代他陪客讲话，尔后送离宾馆。

1960年，孙燕快毕业了，她想利用在校期间的最后一个假期再去北京看望毛泽东一次。同时，陈玉英也写了同样要求的信。

不久，一件信封上写着“湖南艺术学院李帮先生转孙燕收”的信，送到了正在武汉钢铁公司搞创作演出的孙燕手中。

这是毛泽东寄来的信。

(四) 望你们好，有困难告诉我 (1960.12.29)

孙佩君同志：

你妈妈的信和你的信，都收到了，感到高兴。望你们好，有困难告诉我。不要来京，我很忙的。

问你妈妈好，祝她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显得草意很浓，可见出毛泽东的匆忙。“我很忙的”——这是他不让她们“来京”的原因。其时，毛泽东正在准备主持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这么个时候孙燕她们来北京，显然是不适宜的。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刻，毛泽东虽然因为忙没有答应孙燕母女来京的要求，但他体谅她们的困难，写信的同时，又给孙燕寄去100元钱。

1961年7月2日，孙燕由中南音专毕业，她并没有利用与毛泽东主席的那种特殊的关系要求照顾，而是凭着学校的一纸介绍信回到长沙，到市文化馆报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燕

在长沙市图书馆工作，到 1980 年调到市艺术馆，一直工作至今。

毛泽东逝世后，孙燕写了《怀念毛主席，恩情誓不忘》一文，表达了对一代伟人的亲切怀念。

主要参考书目

- | | |
|----------------------|----------|
| 《毛泽东书信选集》 | 人民出版社 |
| 《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 西苑出版社 |
| 《毛泽东生平实录》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毛泽东生活实录》 | 江苏文艺出版社 |
| 《毛泽东轶事》 | 昆仑出版社 |
| 《贺子珍的路》 | 作家出版社 |
| 《江青传》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 《共和国第一家》 | 警官教育出版社 |
| 《毛泽东的亲情·乡情·友情》 | 辽宁大学出版社 |
| 《毛泽东的亲友们》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 《毛泽东的人际世界》 | 红旗出版社 |
| 《毛泽东的儿女们》 |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
| 《毛泽东的感情世界》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红星照耀中国》 | 河北人民出版社 |
| 《中国共产党英烈小传》 | 甘肃人民出版社 |
| 《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韶山导游》 | 湖南地图出版社 |
| 《岳麓枫红——长沙市七十年党史党情简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 |